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18 年第 9 期 (总第 171 期)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毛昭晰

主 任 叶 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 主 编 刘晓清(常务) 邓咏秋 潘杏梅 赵继海

陈益君

编辑部

主 任 朱小燕

编 辑 李 芳 郑秀花 王晓琳

编 务 茅珍艳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浙江国广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9-10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18年第9期(总第171期)

本期责编 郑秀花

■ 学术论坛

- 图书馆与开放获取期刊运营模式创新 廖 迅 5
- 空间·人文·技术——论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下一代图书馆建筑 姚春美 12
- 乙丑读书社及其对中共台州党组织建设的贡献* 凌冬梅 17
- 农民工政府信息需求及获取渠道调查研究 任 婕 22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国内外知识创新模式研究述评 赵浚吟 柴 雯 杨 华 27
-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比较研究 周满英 付 禄 34
- 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鲍永庆 38
- 美国可汗学院数据平台功能与数据分析框架研究及启示
孟冰纹 肖玉敏 唐婷婷 谢 蓉 41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调查与分析*
龚花萍 余建兵 胡 媛 48
- 厦门市图书馆飞鸽传书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黄海燕 林少杰 54

基于TIM在线办公平台的云端共享选书模式实践初探 王玉萍 58

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助力社区“文化养老”的创新实践 朱逸琳 62

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实践和思考 季彤曦 65

■ 阅读文化 -----

基于图书馆APP2.0的阅读推广模型探究 蔡豪源 68

读图时代的光影立体阅读：“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实践 刘紫丹 74

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阅读行为比较与解读
——以浙江图书馆为例 宓永迪 77

■ 文献学研究 -----

贾谊《新书》结集及版本考述 陈功文 81

刘承幹刻单疏本《春秋正义》所附《校勘记》得失考述 樊宁 谷玲玲 88

舟山古籍现状调查及研究* 许魁义 93

浙江省藏国家珍贵古籍撷萃 封二 封三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9 2018 (Serial No.171) Monthly

Librari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Operation Mode	Liao Xun	5
Space & Humanity & Technology: Analysis on the Next-generation Architecture of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Yao Chunmei	12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Chou Reading Club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TaiZhou	Ling Dongmei	17
Research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mand and Access Channels of Migrant Workers	Ren Jie	22
Research Review on the Patter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Zhao Junyin, Chai Wen, Yang Hua	27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Data Curation Lifecycle Models	Zhou Manying, Fu Lu	34
On the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Dormant Data	Bao Yongqing	38
Study and Enlightenment of Khan Academy's Data Platform Function and Data Analysis Framework to University Library's Data based Service Improvement	Meng Bingwen, Xiao Yumin, Tang Tingting, Xie Rong	4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Universities Library Extension Services Based on Double First-rate	Gong Huaping, Yu Jianbing, Hu Yuan	48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IP Messenger Services in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	Huang Haiyan, Lin Shaojie	54
Practice of Cloud Sharing Book Acquisition Based on TIM Online Office Platform	Wang Yuping	58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Public Library Boosting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in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Zhu Yilin	62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Ji Tongxi	65
Study on Library APP 2.0 Based Reading Extension Model	Cai Haoyuan	68
Light and Shadow Stereo Reading in the Era of Reading Pictures: the Practice of "Xinyu Juvenile Film Academy"	Liu Zidan	74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xternal and Local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Taking Zhejia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Mi Yongdi	77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s and Versions of Jia Yi's Xin Shu	Chen Gongwen	81
Review on the Gains and Loses of Collating Notes Attached to the Edition of the Single Copy of Annotation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Carved by Liu Chenggan	Fan Ning, Gu Lingling	88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cient Books in Zhoushan	Xu Kuiyi	93

· 学术论坛 ·

图书馆与开放获取期刊运营模式创新

廖 迅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 要: 开放获取(Open Access)出版传播模式应包含3个方面,即OA出版活动、OA典藏行为、OA技术支持。一般认为图书馆在后两方面的优势和成果较为明显。事实上,图书馆在OA出版活动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文章在考察OA期刊常见运营模式及其问题的基础上,以多样化的案例揭示图书馆在创新OA期刊运营模式的行动路径,从而为我国图书馆推动开放获取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 开放获取期刊; 图书馆; 运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Librari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Operation Mode

Abstract The open access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model should include three aspects: OA publishing activities, OA collection behaviors and OA technical suppor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advantages and achievements of libraries in the latter two aspects are obvious. In fact, the role of libraries in OA publishing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On the basis of examining the common operation modes and problems of OA journal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library's action path for the innovation of OA journals' operation mode with diversified cas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xperiences for libraries in our country to promote open access.

Key words open access journals; library; operation mode

开放获取(Open Access,以下简称OA)出版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由商业出版社统治的期刊出版市场一方面基于严谨高质的论文出版所需要的资金成本,一方面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长期持续上涨期刊订阅费用。许多科研机构无法负担快速增加的订购费用。价格持续大幅度的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教育科研机构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阻碍了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利用,这就是期刊危机(serials crisis)。此外,纸本学术期刊出版时滞及其使用上的局限,也影响了学术传播效果。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电子期刊的出现,学术界、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共同提出了OA出版模式。作为数字出版类型之一的开放获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绿色OA,即研究机构或作者将学术研究成果存档在OA知识库中供学术交流;另一种是金色OA,即出版OA期刊。随着开放获取的发展,OA知识库和OA期刊的

数量不断增多。截至2016年10月30日,“开放获取期刊名录”(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收录的金色OA期刊达9 156种,收录经同行评审的论文2 322 691篇^[1]。

1 OA 的运营模式

OA期刊运营模式包括运营主体、生产模式、收入模式、营销模式等主要内容。不同运营主体的OA期刊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大同小异,但在收入模式选择上却有较大区别。OA期刊的不同运营主体决定了其不同的收入模式,而OA期刊的收入能否弥补其运营成本问题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1.1 OA 期刊的运营主体

根据OA期刊的运营主体及其自我定位,OA期刊可分为非商业性OA期刊、商业性OA期刊、半商业性学

会OA期刊。

(1) 非商业性OA期刊。20世纪90年代后期涌现了一批非商业性OA期刊。这类期刊往往由在大学从教的研究人员、博士生或研究机构内部的秘书无偿完成编辑工作。由于没有传统期刊纸张、印刷、装订、发行成本的压力以及较为低廉的管理成本,因而此类期刊启动门槛较低。然而,随着文章数量的增加及随之产生的工作量的增加,仅靠少数人在正职工作之余的无偿劳动很难完成编辑工作,如何找到自愿无偿工作的后备力量也成为问题。同时,文章数量的增加导致稿件管理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加,期刊管理系统运营的资金投入以及随之产生的长期人力投入导致总体运营成本大幅提升。入不敷出是其面临的巨大挑战,其可持续性与可拓展性都因资金不足而成为难题。

(2) 商业性OA期刊。商业性OA期刊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文章处理费(APC)。商业性OA出版商普遍认为,APC是唯一可以支持OA出版可持续运营的收入模式,如BMC(BioMed Central,英国伦敦生物医学中心)成立伊始便以向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用为主要营利渠道,同时探索多样化的营利途径。根据2017年BMC网站报价,旗下期刊文章处理费约为每篇一两千美元。最贵的是BMC的核心刊物*Breast Cancer Research*,平均处理费达2 910美元^[2]。

(3) 半商业性学会OA期刊。学会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类期刊的半商业性是由其自我定位与现实情况综合决定的。比如美国化学学会运营期刊的方式是商业性的,但其定位是非营利机构。

当前许多传统学会期刊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对开放获取运动持积极态度并有意探索向OA转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基于会员的意向不统一而难于迅速推进OA转型,因为会员每年支付的会费是其重大的资金来源,同时维系会员与学会的纽带关系是其重要职责。因而一些学会在保留原有传统期刊的同时,创建了新的OA期刊。如2014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了其首个OA期刊《皇家学会开放科学》(*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1.2 OA期刊的收入模式

尽管OA期刊甫一问世便被打上了“免费”的标签,但事实上这种针对读者的免费是通过其他收费或筹资模式进行补偿才得以实现的。因此,OA期刊的

资金来源能否弥补其运营成本问题是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常见的OA期刊筹资模式包括以下几种^[3]:

(1) 文章处理费。作者或其所在机构承担文章发表的费用。这是OA期刊最常见的资金来源。但研究表明,这一筹资模式主要存在于混合型期刊中。文章处理费主要包括提交费、版面费、插图费、彩印费等。不同期刊的文章处理费差别较大,文章处理费与期刊的学术领域、知名度都有关系。“开放获取期刊名录”当前收录的期刊中,文章处理费可低至10美元,也可高达几千美元。

(2) 广告费。期刊出售其官网主页或论文中的广告位以赚取广告费。如广告收入是BMC营利的重点。BMC提供网站广告、邮件广告等不同形式的广告。网站广告包括旗帜广告、视频广告、Flash广告等,根据其所占空间大小、位置显著程度收取不同的费用。如网站首页横幅广告,每获得1 000次有效点击收费55美元。

(3) 捐助与会费。期刊通过吸引长期的或一次性的外部资金支持来维持运营。如期刊*Esoterica*设立了专门的捐助网页“捐给*Esoterica*”,捐助款项通过其出版社的捐赠处进行收集。有的杂志如*Other Voices*则通过支付平台Paypal收取捐助。作为回报,捐助者会得到受助期刊的允诺,其所捐款项将会用于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与研究工作。会费与捐助不无相似之处。如美国期刊《美国流行文化杂志》等多数期刊会将捐助者自动列为会员。

(4) 出售纸本杂志。在线开放获取的成本通过出售印刷本的收入来弥补。学会杂志在发行印刷本、收取订阅费的同时,也会推出开放获取版本,如瑞士的《心理分析杂志》。这样既满足了学会会员对印刷本的需求,又实现了开放获取。

(5) 增值收费。这种收费模式即freemium,是free(免费)和premium(收费)两种模式的结合。OA期刊的“免费+收费”模式即在所有期刊以网页形式免费开放获取的同时,针对其中一部分期刊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提供PDF和e-Pub格式的全文下载)并就此收取订购费。

(6) 第三方资金。科研机构或科研资助机构为期刊提供部分或全额资助。这类机构包括研究所、大学、高校图书馆、基金会等。这一资金来源的可持

续性难以保证。一些研究所和大学虽然有大型的出版项目,但准入门槛较高。基金会则倾向于提供新建OA期刊的启动资金或帮助传统期刊向OA期刊转型的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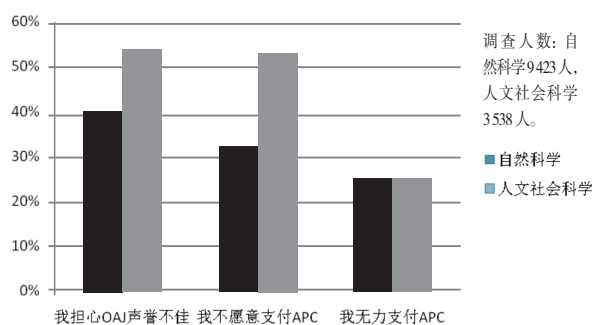
(7) 非货币收入。即人们在期刊生产过程中提供的无偿服务。一般来说,所有期刊都会利用无偿服务。无偿服务的提供者可以是作者、同行评议者或编辑。一方面,他们付出劳动以换取非货币报酬,如学术圈的认可、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扩大学术社交网络等。另一方面,他们所服务的期刊也获得了收益。但这种“自我剥削”式的收入模式持续性较差,无法单独或主要依赖此模式保持期刊正常运营。

1.3 OA期刊收入模式的争议与问题

OA期刊运营者必须认识到:OA是一种让使用者便捷获取文献的方式,而不是商业增值模式或牟取利润的手段。促进学术传播始终是OA期刊的最终目标。如何在保持OA期刊运营的可持续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学术交流,收入模式的选择与创新尤为重要。目前常见的收入模式都潜藏着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引起两种危机:期刊无法可持续运营或者学术独立性受损。而这两者都将不利于扩大学术传播的最终目标。

事实上,多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OA期刊的总体评价不高,对在OA期刊发表论文仍然持有疑虑。根据自然出版集团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共同发布的《2014年作者洞察调查》(Author Insights Survey 2014),只有3%的作者会只选择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在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里大约有一分之一的作者选择OA期刊发表文章,其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个期刊只有开放获取这一种出版模式。

学者对支付论文处理费普遍存在的抵触情绪,是导致其不选择OA期刊发表文章的重要原因。根据上述调查,作者不选择在OA期刊发表文章的首要原因是,许多作者对OA期刊的声誉表示担忧,担心由此影响人们对文章质量的判断。此外,位列二、三的原因都与论文处理费有关。许多作者表示,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因为开放获取文章每篇收费往往高达3 000美元,即便对于有科研经费的科研人员来说,这笔费用也相当之高(见图1)。



数据来源: https://figshare.com/articles/MSS_Author_Insights_2014/1204999

图1 学者不选择开放获取期刊发表文章的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获取高额论文处理费的确成了某些“掠夺式”OA期刊(predatory open-access journals)的敛财之道。2013年《科学》杂志揭露的“钓鱼行动”中,一些学者将造假论文投给300多家开放获取期刊,其中竟有半数获得录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部分开放获取期刊确实自身质量堪忧。这些期刊往往运营不透明、掩饰财务情况、组建非正规的编委会、不进行同行评审。致力于学术传播的相关从业人员都必须认识到,开放获取的宗旨绝不是降低质量。从业人员亟需探索新方法优化OA期刊运营模式,提高期刊质量,挽救OA期刊出版模式的声誉。

2 图书馆推动开放获取运营模式创新

图书馆在OA出版活动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以多种方法探索和推动着开放获取期刊运营模式的创新。从各自为营到结成联盟与出版商进行谈判,从单独资助到平台资助,从资助出版到独立出版,图书馆在传统的作者—出版商—图书馆的学术传播三角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发生转变,逐渐从学术传递链的末端走向前端。

2.1 创新运营主体:从传递利润到传播知识

2008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一项研究显示,44%的成员图书馆(80家美加地区的研究图书馆)已经开展学术出版服务,出版形式主要是开放获取期刊。之后,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在《2012年学术图书馆十大趋势》中指出,学术图书馆作为学术传播的重要机构,必须积极参与到出版服务中来,否则将会被淘汰。2014年,美国图书馆学会的调查显示,共有35家成员图书馆提供OA出版。如今,学术图书馆开展

OA出版已成为全球趋势。

图书馆出版OA期刊主要有两种方式,即与出版社合作出版、自建出版社出版。高校图书馆与和本校或其他高校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是当前最常见的出版方式。图书馆与出版社的跨界合作作为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图书馆可以把出版流程中的某些环节(如编审、排版、营销等)交给出版社负责,从而更高效地利用时间和人力去创办更多的期刊。自建出版社的图书馆则全程参与包括同行评议、论文评阅及编辑、期刊编辑排版及发布等一系列过程。

(1)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北美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是图书馆界开展开放获取出版的先锋力量。根据图书馆出版联盟(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简称LPC)于2017年发布的第四版《图书馆出版名录》,参与调查的118所大学图书馆纷纷将开放获取期刊出版作为支持开放存取运动的重要内容,许多图书馆都将新增或扩大OA期刊出版作为本年度的首要任务。这些图书馆都与本校或其他高校的出版社合作出版。《图书馆出版名录》显示,高校图书馆开展OA出版服务的资金来源非常多样化。图书馆的业务预算是主要来源,此外还有文献经费预算、补助、捐赠、销售收入、授权许可收入等多种资金来源^[4](见表1)。

表1 2017年北美部分高校图书馆OA期刊出版情况

高校图书馆	期刊数量/种	资金来源	高校图书馆	期刊数量/种	资金来源
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	36	业务预算	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图书馆	10	业务预算
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系统	35	业务预算	杜克大学图书馆	10	业务预算
圭尔夫大学图书馆	19	业务预算	布鲁克大学詹姆斯吉布森图书馆	6	业务预算、文献经费预算
麦吉尔大学图书馆	14	业务预算、补助	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	4	业务预算、捐赠、销售收入
印第安那大学图书馆	14	业务预算、文献经费预算、捐赠	克莱蒙特学院图书馆	4	业务预算
波士顿学院图书馆	12	业务预算	天普大学图书馆	1	业务预算
女皇大学图书馆	10	业务预算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	1	业务预算、授权许可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各大学图书馆网站公布数据统计

(2)图书馆自建出版社。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大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出版规模更大、体系更完善。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通过机构知识库或

自建出版社的方式成为开放获取出版的主力。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已有33所大学的图书馆参与出版了144种开放获取期刊,占其大学总数的85%。其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是自建出版社的典范,该图书馆建立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是澳洲最早进行OA出版、出版规模最大的研究图书馆出版社。该社的运营优势十分明显:成本低,每年只需大学提供约53万澳元资助;员工少,全职员工仅有4.5人^[5];效率高,生产流程清晰,技术先进,运转灵活;服务全,其出版的所有学术作品均提供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多种格式的电子版本都能以开放的方式、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轻松免费获取。

与传统的OA期刊出版商相比,图书馆出版开放获取期刊有如下优势和特点:图书馆出版OA期刊的经费来源有保障,一般都有图书馆的业务预算兜底;无论是出于扩大知识传播的目的还是拓展自身服务的需要,图书馆出版OA期刊,都不以营利为目的,出版收益都会用于业务运营及拓展;图书馆出版OA期刊为特色馆藏资源的开发与研究提供展示平台,促进特色化学术成果的即时传播和共享。

2.2 创新付费模式:从双重付费到一次付费

国际粒子物理开放出版资助联盟(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Particle Physics, SCOAP3)是图书馆联合其他机构共同创新开放获取运营模式的成功案例。来自47个国家的3 000多个图书馆、图书馆联盟、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成为SCOAP3的合作伙伴。SCOAP3的基本做法是由上述机构联合出资,向出版高能物理期刊的出版商购买开放出版服务,作者无需支付论文处理费;论文通过出版商网站在出版时立即开放,同时论文自动分发到SCOAP3联盟知识库和作者所在的机构知识库进行长期保存和开放获取;所有原订购这些期刊或数据库的机构不再支付或减少支付订阅费。

SCOAP3采用计划招标的形式,以三年为一期,每三年重新招标。每一期开始前,在对每年文章发表量进行预估的基础上,SCOAP3和出版商商定每年一次性付费的最高限。每一期结束时,SCOAP3根据实际文章发表量支付费用,平均每篇文章的服务费约为1 000欧元,远低于当前研究图书馆为每篇文章实际支付的价格,也低于大部分OA期刊收取的文章处理费。根据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发布的报告,当前全球

学术图书馆每年支付约760亿美元的期刊订阅费以获取1 500~2 000万篇新发表的论文,即每篇论文的获取价格在3 800~5 000美元之间^[6]。SCOAP3实质上是将出版前的论文处理费与出版后的文献采购费合并为一次性支付的“开放出版服务费”,将原来图书馆单独采购期刊或数据库转变为联合谈判开放出版服务条款,同时有效实现学术论文向所有人的立即开放、可灵活复用和长期保存。

SCOAP3不仅是图书馆推动开放获取的重要组织,也是图书馆创新付费模式的有益实践。在SCOAP3模式下,文献采购变成了支持开放出版,本地馆藏变成了开放资源,这表面上挑战了图书馆原有的信息资源建设体系,事实上则通过遏制双重付费、持续涨价等现象帮助图书馆实现其知识获取能力最大化、知识利用能力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图书馆在实现促进开放获取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服务方式的新突破。此外,图书馆联合学术界结成联盟进行招标,从原来被动接受报价转变到通过竞争采购服务而占据了主动,并争取到了更大利益。

2.3 创新资助方式:从单独资助到联合资助

研究显示,论文作者对支付论文处理费的接受度与其所在学科有极大关系。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AHS)领域研究者普遍认为,论文处理费是“具有重大缺陷的模式”,因为与科学、技术与医学(STM)领域相比,AHS学者较少受到资助,高额的论文处理费对该领域学术交流的负面影响较大。成立于2013年的人文科学开放图书馆(Open Library of Humanities,简称OLH)推出的图书馆合作资助系统,是图书馆界应对这一难题的一大创新。

OLH是目前最为成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图书馆联合资助出版平台,是学术导向的、无需作者支付费用的金色开放获取出版平台。作者可以向平台资助的OA期刊投稿,也可以向平台直接投稿。平台的启动资金来自于Andrew W. Mellon基金会,成员图书馆每年向平台一次性支付OA期刊资助费构成图书馆合作补助(Library Partnership Subsidy),用以支付OA期刊出版费用。同时,所有出资图书馆都在OLH的图书馆董事会占有一席,参与管理平台事务。目前,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189家图书馆联合出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大学图书馆。

作为股东的图书馆的出资目的在于促进学术交

流而非获取利润,因而OLH可以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保持非营利运营。而且,基于规模效应,在发表相同数量论文的前提下,参与资助的图书馆数量越多,则每家图书馆每年所需支付金额越少,每家图书馆为每篇论文实际支付的费用越低。事实上,以OLH现有的规模,每家图书馆为每篇论文实际支付的费用仅为个位数(美元),远远低于通常情况下图书馆支付的订阅费与文献采购费。如以每年发表250篇论文为例,参与图书馆数量、图书馆资助金额、论文出版费三者的数量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OLH系统图书馆数量、图书馆资助金额、论文出版费三者的数量关系

参与图书馆数量/个	每家图书馆每年资助金额/美元	每家图书馆为每篇论文支付的费用/美元
100	1 850	7.40
120	1 541	6.16
140	1 321	5.28
160	1 156	4.62
180	1 027	4.10
200	925	3.70
250	740	2.96
300	616	2.46
350	528	2.11
400	462	1.84

数据来源: <https://about.openlibhums.org/wp-content/uploads/2013/01/2015-Summary-of-OLH.pdf>

这种图书馆联合资助模式一方面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了图书馆的资助成本,提高了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了论文出版的数量和速度;另一方面平台形成了作者与图书馆之间的第三方力量,独立承担资助对象筛选工作,使图书馆免于组织专家评审、资格审核、资助经费管理等工作,减轻了图书馆的负担。

2.4 创新生产模式:从单、双盲同行评议到开放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的质量是期刊出版质量的重要保障之一。区别于传统的单盲评议或双盲评议,在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 Review)机制中,作者和审稿人互知道对方的身份。而且,评议者的审稿意见以及作者的回复连同最终论文一同发表。

一批倡导彻底的开放理念的图书馆人视透明的开放同行评议为开放获取出版不可分割的机制内核,因而共同创办了采用开放式同行评议的开放获取杂志 *In the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和 *Code4Lib Journal*。前者创刊于2008年,致力于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开放同行评价机制以践行图书馆人的开放理念。其开放同行评议的过程始于文章主题的形成过程,该期刊的开放同行评议步骤见表3。

表3 *In the Library with the Lead Pipe*
开放同行评议步骤

序号	时间	步骤	参与人员	具体内容
1	至少发表前六周	形成主题	编委、作者	编委通过 ListServ 互相分享与初审潜在作者提交的选题报告,通过提问丰富选题内涵。编委通知入选作者。
2	至少发表前五周	提交论文	作者、外部评审、编委、内部评审、出版编辑	作者指定至少一名外部评审,也可委托编委会选定至少一名外部评审。一般来说,外部评审应与作者无长期私人关系,亦不在同一机构任职。同时,编委会指定一名编委作为内部评审,指定一名编委作为出版编辑。作者将论文以 Google Doc 格式分享给上述人员。
3	至少发表前四周	评议论文	作者、外部评审、编委、内部评审、出版编辑	评审通过 Google Doc 对论文的内容和结构进行评论和提问,作者可以针对意见进行辩解、答复、追问。不同评审的意见可能一致,也可能出现分歧。内部评审还要对文章的写作风格、排版、拼写错误等进行检查。出版编辑负责编辑和协调评议活动。作者、评审、编辑都可以相互对话。编辑也可将文章分享给其他编委以听取意见。
4	至少发表前一周	修改论文	作者	作者根据一致的评审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和完善。互相冲突的评审意见可以启发作者进一步思考,并作出如何修改的选择。如果评审对第二次提交的修改稿仍不满意,可以要求再次修改。
5	发表及以后	发表论文	编辑、作者、读者	在经过充分讨论和评议以后,编辑根据期刊要求作出最终决定。每篇文章都将保留所有记录,包括审稿意见、作者答复、作者的原始投稿和修改稿等。评议者的审稿意见以及作者的回复连同最终论文一同发表。发表后,读者可以继续进行评论以及和作者进行讨论。

资料来源: <http://www.inthelibrarywiththeleadpipe.org/2012/open-ethos-publishing/>

这种互动、透明、累进式的同行评议模式实现了作者、专家、读者之间的学术对话,促成了学术交流氛围的形成;帮助编辑追踪评议与修改过程,根据意见

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后续处理做好准备;构成了更为严格的评审过程,促进了稿件质量的提高;缩短了开放获取出版的过程,使之更为迅速地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提高了学术交流的效率;肯定了评审和编辑的智识劳动对形成论文、创造思想的贡献。研究表明,开放同行评议质量并不低于传统评议模式,而且经开放同行评议的文章被引频率更高^[8]。

2.5 创新营销模式:从粗放营销到精细营销

一般来说,传统期刊和OA期刊都会利用报纸、期刊、网络、新媒体等媒介,采用刊登征订与征稿启事、推送下期预告、组织读者作者见面会等线下活动、举办征文比赛等方式来进行推广。由于OA期刊不向读者收取订阅费,因而其营销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提高销量来获取利润,而在于扩大期刊的读者群和影响力,吸引更多优质投稿,继而提升影响因子。传统粗放式营销往往局限于宣传办刊主旨、主要栏目、特色稿件,缺乏对期刊整体资源的整理与揭示,同时并不擅长与读者进行即时互动交流,具有信息不全面、不完整、静态性、单向性等特点,营销效果并不理想。

相比之下,图书馆可以在营销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发挥更大的创造力,进行互动式、个性化、精细化的深度营销。就广度而言,图书馆可以通过网页宣传、手册介绍、用户培训、在线问答、馆员博客、文献利用课程、专题讲座等多样化形式推广OA期刊;就深度而言,图书馆擅长搜集、整理、描述、评价OA期刊资源,深入揭示这些资源的学习研究价值,并根据大数据进行用户行为分析,以个性化的方式将其推送给有需求的用户,同时追踪利用效果。其初衷虽然旨在帮助读者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但事实上却更有针对性地扩大了期刊的读者群。

一些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利用LibGuides平台将OA期刊资源融入学科服务中,实现OA期刊资源引导与共享。比如美国丹佛大学图书馆为哲学专业创建的LibGuides中设立了“经同行评议的开放获取期刊”版块,收录了影响因子较高的15种OA期刊以及“开放获取期刊名录”中哲学类OA期刊的合集^[9]。读者点击页面中期刊名称,便可获得期刊的目次链接、投稿指南及官方地址,方便读者获取学术热点动态信息。页面左栏是对话框,读者输入姓名等相关信息后便可与哲学专业的学科馆员进行对话。页面右栏是该学科馆员的档案,包括照片、服务学科、提供读者服务

的联系信息等。这些信息都便于读者和学科馆员进行即时沟通,同时建立长期交流,图书馆从而得以互动式、个性化、精准化地推广OA期刊的资源特色。

3 结语

综上所述,图书馆通过创新OA期刊的运营主体、付费模式、资助方式、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为解决传统OA期刊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案。其中,针对商业性OA期刊收取过高的文章处理费,图书馆通过对付费模式的创新,遏制了双重付费、持续涨价等现象;通过对资助方式的创新,提高了资助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充分性,这两者都最终有利于提高论文发表的速度和学术传播的效率。针对某些OA期刊质量堪忧、声誉不佳的问题,图书馆通过对同行评议方式的创新,采用互动、透明、开放的同行评议模式,事实上构成了更为严格的评审过程,促进了稿件质量的提高;通过对营销模式的创新,扩大

了期刊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优质投稿,继而提升影响因子。而图书馆对OA期刊运营主体的创新,开展出版OA期刊的服务,则是图书馆把促进开放获取发展和拓展图书馆职能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图书馆利用自有预算资金,挖掘特色馆藏资源和研究力量,规避了传统OA期刊收入模式潜藏的问题,如能再灵活采用上述图书馆擅长的开放同行评议和精准推广模式,必将推动学术成果传播效能最大化的实现。

同时,开放获取出版也为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是图书馆提高自身在学术交流生态圈中的可见性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开放获取出版过程中,期刊选择与评价、期刊资助、自主开放出版、长期保存和开放利用、建立集成检索利用机制等复杂工作都需要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力量予以支持。图书馆凭借其在信息传播中的专业知识以及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位,正是履行这个职责的最佳机构。这是对图书馆传统职能的丰富和深化,是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新探索和新转变,值得中国图书馆人予以关注、学习与推进。

参考文献:

- [1] Open Access Directory.OA by the Numbers[EB/OL].[2018-02-01].http://oad.simmons.edu/oadwiki/OA_by_the_numbers.
- [2] BMC.How Much is BioMed Central Charging[EB/OL].[2018-02-01].<https://www.biomedcentral.com/getpublished/article-processing-charges/biomedcentral-prices>.
- [3] 何莉娜,郑建程.开放获取期刊的运营模式探析[J].图书馆杂志,2012(9):34-35.
- [4] 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 2017[EB/OL].[2017-09-12].<https://librarypublishing.org/resources/directory>.
- [5] 王雅菲,范军.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的开放获取出版新模式[J].现代出版,2015(9):74.
- [6] 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Disrupting the Subscription Journal's Business Model for the Necessary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to Open Access[R/OL].[2017-09-12].<http://pubman.mpg.de/pubman/faces/viewItemOverviewPage.jsp?itemId=escidoc:2148961>.
- [7] SCOAP3-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Particle Physics.SCOAP3 Tendering Process is Complete[EB/OL].[2017-09-12].<https://scoap3.org/news94/>.
- [8] BORNMANN L,NEUHAUS C,DANIEL H D.The Effect of A Two-stage Publication Process on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A Case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Open Access Journ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J/OL].Scientometrics,2011(1):93-97.
- [9] University Libraries.Philosophy:Open Access Peer-Reviewed Journals[EB/OL].[2017-09-12].<http://libguides.du.edu/c.php?g=131579&p=2774089>.

作者简介: 廖迅(1984—),女,中国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事业、公共政策,已发表论文5篇。

收稿日期: 2018-02-22

· 学术论坛 ·

空间·人文·技术——论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下一代图书馆建筑

姚春美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和追求出现新变,现代图书馆面临新发展与转型。生态美学立足于人与环境的整体,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高度和谐与统一,在此视野中的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体现出空间性、人文性和技术性,也彰显着生态美学特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平衡与共生,注重主体与客体潜能的自由和谐发展,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图书馆建筑;空间性;人文性;技术性

中图分类号: G258.91 **文献标识码:** A

Space & Humanity & Technology: Analysis on the Next-generation Architecture of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new changes have arisen from the people's cultural needs and pursuit, which induces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braries. Based on the entirety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attaches attention to the high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 next-generation architecture of libraries has not only spacial, humanistic and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emphasis on the balance and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emphasis on the fre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ubjects and the objects, the pursuit of the final care for the human beings.

Key words library architecture; spatiality;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在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大会中,与图书馆建筑设计有关的国际卫星会议总是备受关注,这缘于图书馆新馆设计方案往往最能体现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际图书馆论坛也都密切讨论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发展动态。2013年在丹麦奥胡斯举办了“下一代图书馆论坛”(Next Library Conference),其会议录《建设明天的图书馆》(*Building Libraries for Tomorrow*)明确指出,图书馆建筑从为藏书、设备以及相关物理设施而设计,转向更加注重为人、社群成效、经验以及创新而设计,这种转移是一个国际性趋势^[1]。在国内,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以藏书为主要的传统图书馆也正面临着与人性化服务之间的矛盾

和转型。图书馆建筑设计该走向何方?在实践中,有一种理念呼之欲出: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将拥有更多知识交流共同体的功能设计与空间布局。以生态美学视野观测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其必然为图情、空间、人文、新型智库、前沿技术等集合体,其空间性、人文性和技术性将彰显生态美学特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平衡与共生,注重主体与客体潜能的自由和谐发展,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

1 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与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生态语境和后现代生态文

化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它是从美学视野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进行的一种学理反思与内省。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建构是以诗性思维对人类普遍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它思考的重点是人类存在与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立足人与环境的整体,生态美学对人类的生存境界进行“诗意地展望”,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的高度和谐与统一,立意实现主体与客体潜能的自由和谐发展,并最终指向对人的终极关怀。从图书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以生态美学视域研究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将是一个新的趋势。其实,生态美学与建筑学不无关联。在我国,早在1991年初,台北学者杨英风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的未来》一文中就提及了“生态美学”一词,他主要是从中国古代传统智慧中的生活美学谈中国建筑未来发展的风格和方向^[2]。因此,建筑与生态美学存在学理依据。事实上,时代的发展也要求对传统图书馆建筑与现代读者需求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和谐现象进行反思与内省。认知下一代图书馆建筑的发展趋势,事实上是对现存的读者与文化环境冲突的反拨与调和。

Sasaki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兼建筑师Bryan Irwin称下一代图书馆为“第三代学术图书馆”。根据他的归纳总结,第一代学术图书馆重在书籍保护;第二代学术图书馆的主要功能融入了新兴技术;第三代学术图书馆由用户多元化的学习空间需求以及图书馆员工的复合型职责共同决定其整体规划^[3]。由此他强调下一代图书馆别样的功能与特征:注重功能设计与空间布局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分享。

2 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之空间性

2.1 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

生态美学立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旨在美化和优化人类的生存境界。因此,下一代图书馆建筑的生态性不止于绿色生态、节能环保、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而是高层次的追求,即空间生态与读者需求的平衡。场所精神、学习共享空间、空间建设、空间再造、空间服务等将是对读者借阅生态提出的新要求,图书馆整个空间生态需呈现出科学性、合理性、和谐性和舒适性。

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已成为图书馆研究的关键性和前沿性问题。如何利用图书馆现有馆舍,通过引进、改造等方式提升读者到馆量,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服务,让读者喜欢到图书馆进行学习和交流,最大程度地发挥图书馆空间服务的水平等问题都备受业界热议。例如,为深入探讨和交流图书馆空间服务及下一代图书馆系统技术及应用经验,由广东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承办、北京森图华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空间服务与下一代图书馆管理系统”专题研讨会于2015年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2016年10月,以“二十一世纪新型高校图书馆空间建设”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昆山市昆山杜克大学召开,来自美国、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地区的130余名图书馆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规划设计和空间建设问题进行研讨。

国内积极探索者、实施者也不在少数。在公共图书馆界,杭州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率先开展空间再造探索。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是目前高校图书馆空间再造项目中较成功的案例。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之所以会成为炙热的问题和信息时代图书馆的发展息息相关。建筑评论家赛维认为,空间是建筑的主角^[4]。图书馆建筑的外形特征是特定社会文化与精神审美的物质反映,而图书馆建筑的空间布局则直接反映了服务制度和用户需求,也就是说,由图书馆建筑空间布局可看到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双方变化。

2.2 群体需求推动图书馆空间变革

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的出现,最终归结于群体需求的推动。近几年,随着民众休闲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众对休闲生活格调和品味追求的不断提高,国内公共图书馆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拓展了文化休闲功能。一些公共图书馆除了具备传统的文化功能外,还通过内部增设音乐厅、咖啡厅、商店、展览厅、餐厅、清吧、静吧、氧吧等空间提供新式的文化休闲服务,使公共图书馆成为人们释放各种压力和缓解心理疲惫的场所。无独有偶,面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现状,国内高校图书馆也在适时作出相应调整和变革。近几年,高校图书馆接待读者的情况发生如下变化:读者的借书量不断下降,但进馆人数逐年递增或保持平稳。这说明,高校图书馆的读者对图书馆空间的需求

并未下降,但他们对图书馆功能的需求改变了。图书馆由单一功能走向众多综合功能的信息服务中心,成为读者获取多方面咨询服务以及学习、科研、交流的机构与场所,这种蜕变对图书馆的建筑功能、空间以及设计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6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图书馆作为场所,促进不同年级、专业、校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分享是其一大优势^[5]。因此,下一代图书馆建筑的各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应尽可能满足读者各方面的需求,进而呈现出读者与图书馆和谐相处的空间生态场。

对图书馆空间的变革,不仅局限于图书馆内部空间,在社会大环境中,界内学者也提出了新命题,认为图书馆是作为第三空间的存在。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在《绝好的地方》一书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把家庭居所归为第一空间,工作单位归为第二空间,酒吧、咖啡店、图书馆、公园等公共空间归为第三空间。“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成为了2009年国际图书馆界年会的命题。在中国,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最早提出了图书馆是第三空间的观点。他认为第三空间就是人们交流的社会空间,像休闲的咖啡厅、聚集丰富文献资源的图书馆、文化内涵深厚的博物馆等。为突显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社会空间,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需要有知识共享功能,从而确立了图书馆第三空间概念,使得图书馆活动的空间更大了。图书馆可以更好地利用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发展图书馆的数字化,提供图书馆泛在化服务,也可以提供多元的文化服务,让更多读者在图书馆参与体验和开展面对面的交流^[6]。这样图书馆就成为任何人都可以走进的城市第三空间^[7]。

3 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之人文性

3.1 读者服务:体现以人为本

生态美学的终极目标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关怀彰显着人文性。图书馆“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的一切,为了一切读者”,经历了“以书为本”——“以馆为本”——“以人为本”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图书馆服务的重心经历了“藏书”——“合理特色的馆藏建设”——“读者”的变化过程,以读者为中心就是

要为其提供人性化服务模式,方便其获取信息,满足其需求。下一代图书馆,不论是整体造型、外部空间场地的景观规划、场地设计,还是内部空间环境,都要营造出一种人文关怀的场所氛围,去让人们品味和感受。

图书馆建筑良好的内外外部环境,就读者的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物质效应对精神效应的积极作用,能有效激发读者的美感情趣^[8]。图书馆建筑美观的造型,能让人赏心悦目,能给人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因而成为吸引读者并提高图书馆利用率的重要手段^[9]。建筑设计强调对人的关注,建筑造型令人赏心悦目,我国公共图书馆中不乏成功的范例,如庭院式的浙江图书馆、园林式的苏州图书馆、休闲式的常州图书馆等。其建筑形象与建筑风格,给予读者的远不止清幽、舒适的心理感受,更是一种主客体相互的自由空间体验,这种体验使人愉悦,能使人体味到空间的感召力,能使人清晰、具体地感知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因而充分体现出建筑对人的关注,营造出一种使读者感到亲切从而吸引读者的文化氛围。

3.2 建筑风格:彰显场所精神的人文价值

著名建筑师沙里宁曾说过“建筑是寓于空间中的空间艺术”^[10],每一座图书馆建筑在社会环境空间中都有各自的风格,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应尽可能彰显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的人文价值。“场所精神”一词最初源于古罗马人的信仰,认为每个独立的本体都有其灵魂,其灵魂赋予其生命并决定其特性与本质。建筑的场所精神不仅要满足其基本功能,更需要反映出场所环境的特性,其创造的空间能容纳人们活动并具有强烈的人文气氛。林徽因认为,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有建筑意,“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11]。建筑意与场所精神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场所精神是场所的象征和灵魂,不仅能使人区别场所之间的差异,还能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不止于场所,更在于场所精神。挪威著名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提出了两种场所精神:定向感(或导向感)和认同感,定向主要是空间性,认同则与文化有关^[12]。据此笔者认为,关于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场所精神的人文价值应得以彰显。图书馆场所

精神的人文价值在于:当个体置身其中,提取知识、人文思想和一切文明时,既能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识到自己与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又能永葆对人生真谛“真、善、美”追求的赤子之心。

3.3 文化空间:人文思想交融之所

要使图书馆兼具人本型、节能型、环保型、智能型、开放型等诸多特点,必须在其建筑设计的功能划分和平面布局上充分考虑综合布线的适应性^[13]。下一代图书馆的馆舍布局,不应仅具备藏书、借书、阅览等功能,还应当成为颇具人性化的场所,融合人文思想而成为读者受教育与文化娱乐的中心,包括拥有展览、讲座、培训、沙龙、放映、演出等交流场地和空间,图书馆应向读者提供接触各种表演艺术、文化展示的机会。

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朱强指出:“未来的大学图书馆将逐渐进入到‘海量信息的科技体验和美妙空间的艺术体验融为一体’的新阶段……读者在图书馆的任何地方,都能随手取悦书刊、操作屏幕,欣赏名画和艺术品,沉浸于信息、科技和艺术营造的文化空间。”^[14]

4 下一代图书馆建筑之技术性

4.1 技术不再是目的

下一代图书馆建筑追求的是生态技术的合理应用,探索的是技术和建筑完美结合的生态美学,所以技术不再是目的。因为生态美学的追求与呈现不依靠技术的大量堆积,也不依靠高科技的炫耀。下一代图书馆建筑的技术运用,必须综合考虑其社会性、经济性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多标准的综合判断,要以更宽广、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生态建筑这个主题,体现合理性和适切性,因而要尽可能地避免局部的、单层次与单领域的、生态一方而又危害另一方的所谓“生态建筑”。下一代图书馆建筑需让技术谦和地与建筑语言相结合,从而形成新世纪的生态美学。正如吴建中所述,第三代图书馆超越书、超越传统图书馆,注重生态环境,并将生态技术有机地融合进各种服务功能之中^[7]。

4.2 “互联网+”与图书馆建筑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此后“互联网+”不仅渗

透到了社会各个行业,而且催生了许多新业态,成为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新动力。简单理解,“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创造新的发展生态^[15]。“互联网+图书馆”就是将互联网与图书馆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深度融合突破图书馆行业的发展瓶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理念,从而推进这一行业的创新、转型与提升。“互联网+”倒逼图书馆的转型发展,下一代图书馆必然要体现科技化与智能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建筑应拥有更多知识交流共同体的功能设计与空间布局。知识交流共同体是下一代图书馆建筑设计要构建的一个目标,它是“参与的、分享的、学习的”,由一定的人(读者)在一定的空间通过沟通、交流、分享知识所组成,为知识交流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38-2015》规定:“图书馆应设置综合布线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宜与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通信自动化等设施统一设计”“设置局域无线网络,增加了信息点,可以作为有线网络的补充和后备,给读者及工作人员创造更为便利的上网条件”^[16]。“互联网+”时代,图书馆应设计能够进行计算机网络大屏幕演示的建筑并配备相关设备,图书馆内部设立主机房,各功能用房设立必备的专用机房。此外,一些图书馆的家具设计也应该加入网络布线、计算机及现代通信设施、电源插座等配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张甲曾在主题演讲中深入阐述了“图书馆科技、家具和空间规划的转变”,聚焦如何在图书馆空间和家具设计中融入移动学习、在线学习、多媒体设备等新兴科技^[17]。

总之,在“互联网+”时代规划设计图书馆建筑时,应当做好图书馆仍会不断改变的准备,未来随时都有可能针对用户的最新需求变化,对图书馆建筑设计进行重新构想与重新规划。

5 结语

生态美学视野中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呈现出的新特征,包括突破传统的文化服务,注重空间再造和空间服务;注重设计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建筑造型和突显

图书馆的场所精神——人文价值,以及设置各种类型的文化空间;与“互联网+”融合实现智能化和科技化等,都是呼应了当今人们文化需求和追求的新变。这些新变与生态美学理念一致,强调人—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共生,朝向对人的终极关怀。在这种理念下建

设充满科学性、合理性、和谐性、舒适性的下一代图书馆的整个建筑环境生态场,必将有助于实现现代读者主体潜能的自由发展、各种强大功能的叠加和相辅相成的新兴技术融合,下一代图书馆建筑将会呈现舒适、高效而又富有活力的面貌。

参考文献:

- [1] LAERKES J, MANOLIS P. Building Libraries for Tomorrow: INELI Cohort 1 Collaborative Project[R]. Aarhus: Next Library Conference, 2013.
- [2] 杨英风. 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的未来[J]. 建筑学报, 1991(1): 42.
- [3] 下一代高校图书馆: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空间需求与设计[EB/OL]. [2017-10-28]. <https://dukekunshan.edu.cn/zh/events/international-lib-symposium/presenters>.
- [4] 赛维. 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M]. 张似赞,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8.
- [5] MALENFANT K. ACRL Report Shows Compelling Evidence of Library Contributions to Student Learning and Success[EB/OL]. [2018-04-27]. <http://www.ala.org/news/member-news/2016/04/acrl-report-shows-compelling-evidence-library-contributions-student-learning-and>.
- [6] 吴建中: 建设第三空间 强化社会参与[EB/OL]. (2012-01-16)[2017-11-22]. <http://fwwh.net/Zhaiyao.aspx?id=243690>.
- [7] 吴建中. 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 图书馆杂志, 2016(6): 4-9.
- [8] 谢萱. 环境设计在图书馆建筑空间上的美育效应[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08(4): 16-18.
- [9] 刘星. 图书馆建筑中的人性化设计构想[J]. 图书馆学刊, 2008(3): 57-59.
- [10] 冯楚珩. 岭南园林庭园空间的处理和魅力[J]. 南方建筑, 2001(9): 15.
- [11] 梁思成, 林徽因. 平郊建筑杂录[J]. 北京: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2(4): 12.
- [12] 诺伯舒兹.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20.
- [13] 吴庆珍. 论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发展趋势[J]. 图书馆论坛, 2011(1): 38-40.
- [14] 王莲, 刘霞. 对大学图书馆空间艺术化的思考[J].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14(4): 87-90.
- [15] “互联网+”就是这么简单[EB/OL]. [2017-10-20]. <http://www.wtoutiao.com/p/uceShk.html>.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38-2015[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 [17] 空间作为服务——图书馆科技、设备和空间规划的转变[EB/OL]. [2017-10-28]. <https://dukekunshan.edu.cn/zh/events/international-lib-symposium/program>.

作者简介: 姚春美(1983—), 女, 硕士, 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8-06-08

· 学术论坛 ·

乙丑读书社及其对中共台州党组织建设的贡献*

凌冬梅

(嘉兴学院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乙丑读书社是20世纪上半叶浙江台州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越的读书社团,由进步青年组织,经历消夏社时期、正式创立、快速发展及被迫解体4个发展阶段,为中共临海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进行了思想启蒙,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人才准备,其主要成员积极参与了台州多地党组织的恢复及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共台州党组织建设。

关键词:乙丑读书社;台州;读书会;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G252.1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Chou Reading Club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TaiZhou

Abstract YiChou Reading Club, organized by the progressive youth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successful reading community in Taizhou,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community goes through four developmental stages: Xiao Xia club, formal establishment, rapid development and forced collapse which offers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inhai CP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also provides talents pool for CPC in Linhai, whose leading member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CPC in Taizhou,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of the CPC in TaiZhou.

Key words YiChou Reading Club; Taizhou; book club; The Communist Party

近代读书会是一种以阅读交流与阅读分享为中心的社团组织(亦有读书社、读书互助团、读书研究会之称),具有自助、合作、交流、共享、民主、非正规、灵活性等特点,在中国革命史上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建党前,毛泽东就曾发表《读书会的商榷》,号召成立读书会以共享好书、交流阅读,从而推广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团结各阶层群众^[1];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革命先驱都十分重视且运用读书会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理论、推进革命活动的工具。可以说,进步读书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的重要途径,是团结进步群众、培养

发展党员的有效渠道,助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乙丑读书社就是早期进步读书会之典型,是20世纪上半叶浙江台州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越的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社团,通过组织读书活动、出版进步刊物、开展宣传及教育活动,为中共临海党组织的建立进行了思想启蒙,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人才准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读书社主要成员还积极参与了台州多地党组织的恢复及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台州党组织建设。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调研,梳理了读书社发展脉络及主要活动方式,探究了其对于临海乃至台州党组织建设的贡献。

*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读书会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YJC870010);嘉兴学院2017—2018年人文社会科学类自设研究课题“中共创建时期的进步读书会研究”(项目编号:70118001)的成果之一。

1 乙丑读书社的发展历程

1.1 消夏社时期

20世纪初的浙江临海处于贫困、落后、封建、动乱之态，时“地主、豪绅、官僚互相勾结，横行乡里，封建反动统治势力较为强大”^[2]。五四运动后，在外求学的临海籍青年率先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思想进步，他们认为“负有新文化运动底责任的学生子，应当利用假期，尽力做点事业，才对得起‘学生’二字”^[3]，鼓动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改造家乡，从而能给“一向醉卧于沈寂空气中的台州，灌进一些活气”^[4]。在此背景下，临海旅沪学生会发起以“利用暑期补习功课、服务社会”^[5]为宗旨的临海旅沪学生消夏社（以下简称“消夏社”），并于1924年7月10日在临海召开成立大会，主要领导者有林炯（1900—1937年）、李敬永（生卒年不详）、陈韶奏（1903—1991年）、陈学西（1904—1934年）、林迪生（1903—1997年），社址在临海私立回浦学校内（今回浦路西端的孔庙）。消夏社即乙丑读书社前身，是一个集“暑期学校，同时是个完全小学和中学；革命团体；平民学校；学生们自行组织的读书会；消暑共乐的俱乐部；强健身体的运动场”^[4]为一体的群众性团体。消夏社已有较完整的组织架构，设有总务部、补习部（办暑期学校）、平民教育部（办理平民学校及平民教育运动）、演讲部、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编辑部6部。这是临海当时唯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众团体，吸引和团结了一批要求上进的青年学生。例如，浙江黄岩籍社员管启韵在消夏社中“大大开阔了眼界，听到许多新文化、新知识”^[6]，为她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岩第一位女党员进行了思想启蒙，而在入社以前，她已准备辍学从事女红；蒋婉仙、朱舜芝等女社员在灵江游泳的举动轰动了临海全城，推动了临海破除封建束缚的步伐。消夏社在工人和城郊农民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使他们学到了基础文化知识，还“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拯救贫困落后、封建意识严重的旧中国”^{[7][1]}。消夏社为读书社的正式成立打下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以及社员基础。

1.2 正式成立

林炯、李敬永、陈韶奏等消夏社社员深觉当时

社会环境过于恶劣，“内受军阀的蹂躏，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再有反动的教育，麻醉青年，使他们成为奴隶式的顺民，或做统治阶级的爪牙”^[8]，励志要通过“引导读书”来帮助青年摆脱恶环境、走向光明之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读的书和所过的生活，就是造成我们自己的模型”^[8]。而如何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念、如何读正确的书、如何正确读书，都亟需引导。1925年1月，林炯、李敬永、陈韶奏邀集同乡在上海大夏大学芝兰室草拟了读书社章程和社旗。经过前期消夏社的活动、舆论宣传及社员基础，读书社正式创建时机亦已成熟。是年9月14日，读书社成立大会在临海城内敬一小学校召开，与会人员40余人，通过了读书社章程、宗旨和社旗，选举林炯、陈学西、陈韶奏、李敬永、林迪生、张伯炘、卢经武、蒋一谦等22人为常委^①。因时值乙丑年而定名为“乙丑读书社”，社址设于临海城内节孝桥（城区回浦路西端友兰巷口），以“勉励求学，改造社会”^[9]为宗旨，以红青白三色旗为社旗（“红”象征革命，“青”代表青年，“白”表示心底诚实坦白），大门口贴有“革命青年请进来，投机分子滚出去”的对联。9月17日，乙丑读书社常委会在敬一小学校召开，讨论读书社的组织机构。乙丑读书社仿照共青团模式，设有中央委员会（由9人组成），委员由常委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最基层为支部，3人以上可成立支部，3支以上可成立区委；下设工运、农运、妇运、青运4部。

1.3 快速发展

乙丑读书社以青年及学生为吸收对象，有较严格的人社制度和较高的会员要求，凡入社成员需“心地纯洁，愿遵守本社章程，得社员三人介绍，经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通过，并报告全体社员，在二十日内无四分之一反对者，然后令其填具入社愿书、给与社证”^[9]，假如社员犯“不按期缴费、不奉行议决案、无故缺席、毁坏读书社名誉及其他不利于读书社之行为”^[9]等社禁会被开除社籍。乙丑读书社深受青年、学生的拥护，仅数月间社员便达200人左右，遍及台州、上海、杭州等地，诸多社员先后加入共青团或共产党。另有女社员17人，分别为徐明清、蒋婉仙、郭凤韶、包玉珍、张云青、李镜冰、王宝莲、李仙娥、朱舜兰、朱舜庄、冯仙凤、何年秋、项碧琦、朱舜苑、章秋季、袁定贞、许佩。随着乙丑读书社的不断发展，不仅在临海的中高等学校内均设有乙丑读书社之分支

读书小组,在天台等地还建有乙丑读书社分社,由齐幼民、袁定贞等负责,对外名曰“天台醒社”。1926年12月,张崇文、张伯忻和陈赓平3位社员(均为共产党员)在上级组织安排下在临海发起成立了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张崇文任特别支部负责人。特别支部成立后,先是把乙丑读书社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在1927年2月建立了共青团临海县委员会,之后乙丑读书社成员又陆续成立了几十个支部^{[7][12]},如蒋婉仙、徐一冰组织的台属县立女子师范(简称“女师”)支部,叶宝鉴、胡文光组织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简称“六中”)支部,沈寿华、何元本组织的振华中学支部,冯广大、刘子耕组织的宁海中学支部等。至此,乙丑读书社的活动开展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

1.4 被迫解体

早在1926年,乙丑读书社就引起了以陆翰文、王亚平、何兆瑞、陈启忠、包寿眉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反对,陆翰文将读书社社员比作白蚁,说:

“读书社的白蚁已蛀到我们的门槛了”^[10],但碍于国共第一次合作而未敢明目张胆破坏,行一些诸如拒绝借校舍给读书社使用等阻挠。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白色恐怖笼罩临海,5月始进行“清党”,临海革命力量遭受挫折。乙丑读书社成员中,当时在外地的林炯、李敬永等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苏联学习,一部分转入地下工作,一部分仍在临海继续坚持活动。临海国民党反动派为彻底清除乙丑读书社,在一个月对读书社社员展开了3次大搜捕。1927年5月,反动派突袭节孝桥社址,所藏进步书刊、科学丛书等书报刊被洗劫一空,甚至藏在寿材(生前预做的棺材)里的一批进步书刊都未能幸免,社址被查封,3名社员被逮捕。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留在临海城内的社员在小龙须巷另辟临时社址。6月6日下午3时许,伪警突袭小龙须巷社址,所藏图书刊物再度被劫,徐则枋、刘守恒、许君璋被捕。所幸因藏在床上木柜里的通讯密件未被搜走,被捕3人在关押三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6月16日,临海全城戒严,国民党反动派对浙江省立第六师范(简称“六师”)、六中、六师附小、振华中学等学校,及周形巷的乙丑读书社骨干宿舍分别包围搜捕,逮捕社员40余人^[2],其中刘耕、叶宝鉴、胡文光、柳崇希、何元本、冯卓、王旭升、娄明文8人被押解至杭州,关押了4个多月后才释放(王旭升除外)^[11]。8月11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发出秘字第9984

号通令,缉捕苏玉衡、陈韶奏、林炯、李敬永、崔苍、林迪生、刘修、卢经武等社员(均为党员)。在恶劣的环境下,小部分意志不坚的社员背叛了读书社,一部分社员因心灰意冷或隐姓埋名或远走他乡,但有部分社员仍坚持初心,如郭凤韶面对他人劝说退社时坚决地说:“革命是我第一生命,我决不退社”^[12]。但社员已无法立足临海县城,只能在党组织安排下转向外地进行革命活动。其中卢经训、叶宝鉴、胡文光、陈育中等社员转入宁海县亭旁区,组织发动了有名的亭旁农民起义暴动。起义失败后,梅其彬在海门被捕而惨死杭州陆军监狱,梅其广在上海被捕而惨死苏州监狱;林迪生在仙居发动农民开展地下活动,不久留学日本,回国后赴延安;何元本、朱渭滨等在大石朱岙等地活动;郭凤韶、徐明清、包玉珍等在南京、上海等地继续发扬“努力读书、改造社会”的革命精神,等等。虽然仍有上述社员不改初心继续革命,但乙丑读书社组织已无形解体,《临海青年》《X光》等刊物也被迫停刊。

2 乙丑读书社的主要活动方式

从消夏社提出的“利用暑期补习功课、服务社会”,到乙丑读书社明确了以“勉励求学,改造社会”为宗旨,其不间断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和紧密联系群众的实践,主要通过以下活动来开展。

2.1 组织读书活动

组织读书活动是乙丑读书社最基本的活动。乙丑读书社从筹备之时就明确了读书的目的为“改造社会”并写入了《乙丑读书社宣言》,批判了只为满足个人虚荣与财富为目的的个人主义者和不问世事的“死”读书法,提倡联合起来集体读好书,从而能“反对个人主义的读书;反对奴隶式的反动教育;适应环境的需要,努力求学;参加实际的工作,使学痛与经验互相增长;养成团体的意识,发展互助的本能,养成纯正的人格,帮助青年同志努力上进”^[8]。为达上述目的,乙丑读书社在第一次常委会时便规定:《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为社员所必读,支部每周召开一次会议,每人要联系实际,交流读书心得,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促进社员读好书,乙丑读书社在节孝桥社址开设图书室,购置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中国妇女》《左派幼稚

病》《资本论》《二十四史》等书籍几千册。读书社下设的读书小组亦每周开会一次，每人轮流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书刊，并汇报读后心得。

2.2 出版进步刊物

为提倡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舆论宣传阵地，社员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主编出版了内部刊物《X光》，内容与党内通讯相似；乙丑读书社领导下的台州旅沪学生会和临海旅沪学生会在上海分别出版了《新台州》和《临海青年》两种刊物。其中《临海青年》编辑室设在震旦大学，由张伯炘等社员主持，是临海第一种在外地出版的进步刊物，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唤起民众觉醒为宗旨，如1926年5月张伯炘（笔名张白坚）在《临海青年》上发表《对五月的感想并告临海青年》，呼吁青年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与强权高压”，号召青年要“观察大势，认清目的，联络农工，消除意见，力谋合作”^[13]。

2.3 开展宣传活动

一是开展演讲活动。从消夏社时期就设有演讲部（分社内演讲和社外演讲），专门举办“临海学生消夏社公开讲座”，每次演讲前在台州各报纸上进行广泛宣传，林炯、陈学西、林迪生等都作过专题报告。乙丑读书社正式成立后，演讲成为读书社常规活动，在各类宣传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开展革命纪念日专题宣传。每逢革命纪念日，组织社员手执标语、高举三色旗，集会游行，批驳非无产阶级思想，宣传反帝反封建。如1926年5月30日，时值“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乙丑读书社领导群众在道司里集会和游行示威，崔士俊等社员登台演说。三是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在青年中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多次组织社员上街游行，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借传播教义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四是宣传妇女解放。据社员回忆，乙丑读书社专门组建有妇女宣传队，包玉珍等社员经常下乡宣传有关妇女要学文化、要独立、要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要走向社会等道理。

2.4 开展教育活动

开展教育活动主要有开展平民教育和举办补习班两种。早在消夏社时期就设立了平民教育部，制定了《平民教育之计划》，时设三男一女平民学校总计4所。平民学校校址商借在各学校或公共场所，教师由社员担任并完全义务担任，教授内容有《平民千字

课》、珠算、习字、常识等。每校经费大约需大洋20元，经费由社员自由捐助或向各界募捐。学员为年满8岁且不识字者（男女均可），入学后可选4月毕业（每日读1小时）或2月毕业（每日读2小时），但均需考试，及格者方可毕业并发给国民识字文凭。乙丑读书社正式成立后，原消夏社之教育活动仍继续，如在临海资阳宫开办的平民夜校，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讲解识字课本，对工农大众持续进行了两年多的扫盲活动；1926年7月中旬，徐明清等女社员在大田溪边开办妇女识字班，动员妇女读书，号召妇女反封建，提倡妇女平等，宣传革命道理。补习班主要指暑期补习班，为有志补习功课及想报考上海、宁波等地学校的学生而设，为其补习功课并指导升学，设国文、英文及数理等课程，教员为大学毕业或肄业之社员。上述活动均推动了青年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

3 乙丑读书社对中共台州党组织建设的贡献

3.1 促进了进步思想在台州的广泛传播

临海历来是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0年代初便建有回浦中学、六师、六中、六师附小、振华中学、女子师范等学校，台州各县许多青年求学于此。五四运动后临海籍求学于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青年受新思想洗礼后，通过写信、发表进步文章、传递进步书刊等方式向家乡介绍和传播进步思想，但限于个人单独行为而效果不甚明显。乙丑读书社的成立，先是凝聚了临海旅外进步青年的力量，整合了大批临海及台州各地在临海求学的青年学生力量，并随着社员的不断发展，逐渐凝聚了黄岩、天台、仙居、宁海、杭州、上海、南京等地进步青年的力量，使进步思想的传播成为了集体行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进步书刊的集体阅读交流，结合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平民教育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进步思想在临海及台州的传播，为中共临海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

3.2 促进了临海乃至台州党组织的建设

台州第一个共产党小组诞生于1924年3月，是年下半年吴先清在杭州加入共产党，临海才有了第一位党员，而在乙丑读书社成立及各种活动开展后，临海党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

（1）大部分社员先后加入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作为主要领导者建立了中共临海党组织、共青团组织。

如1926年张伯炘在震旦大学加入共产党,11月回临海开展活动,12月与张崇文、陈赓平一起组建了中共临海县特别支部,时张崇文任书记,张伯炘、陈赓平任委员,并在工人中发展了张月升、施玉镛、许仲仁为第一批党员。1927年2月,共青团临海县委员会成立,卢经武任书记,六中、六师、振华中学、女师等都建立了团支部。“四一二”政变后,临海党组织一度遭受挫折,至是年9月,中共临海县委成立,张伯炘任书记,梅其彬、叶宝鉴、朱月升任委员,临海党组织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基层党支部亦得以恢复和发展。

(2)乙丑读书社党员社员在台州多地开展恢复党组织活动。“四一二”政变后,台州各县党组织均被破坏,部分原读书社党员积极参与了恢复活动,促进

了台州多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仅以1927—1928年两年为例,1927年5月,林迪生受组织委派到宁海负责党的工作,不久宁海党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至翌年3月,中共宁海县委正式成立,卢经训任县委书记,卢经武等7人任常委。1928年1月,林迪生化名俞若山到仙居开辟工作;3月,中共仙居小组成立,林迪生任组长;5月,仙居城区党员发展至20余名,中共仙居支部建立,林迪生任委员;6月,中共仙居中心支部建立,林迪生、王炳章、马锦梅等任委员。1927年11月,林迪生和蒋如琮在天台先后发展陈康祚、袁定贞、余锡廷等党员,建立中共天台特别支部,直属浙江省委领导;至1928年3月,中共天台县委成立;至是年9月下旬,浙南特委在天台成立,卢经训等任委员。

注释:

①据《临海县志》记载选举常委14人,但社员徐明清回忆为22人,现存《乙丑读书社第一届常委》照片中亦有22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90.
- [2] 陈鹤亭.临海革命青年的摇篮——乙丑读书社[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19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147-159.
- [3] 林炯.利用假期[M]//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海地方史:1924—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4.
- [4] 徐文台.临海学生消夏社底旨趣及其现状[N].民国日报·觉悟,1924-08-05(14).
- [5] 临海旅沪学生消夏社草章[M]//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古城街头的红色足迹:临海城区革命斗争史话.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69.
- [6] 管启蕴.回忆郭风韶烈士:郭风韶烈士的少年时期[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临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临海文史资料特辑第一辑郭风韶烈士史料.1984:3-5.
- [7] 徐明清.明清岁月:徐明清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 [8] 乙丑读书社宣言[N].民国日报·觉悟,1926-01-04(03-05).
- [9] 乙丑读书社章程[N].民国日报·觉悟,1926-01-04(05-06).
- [10] 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海党史资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44.
- [11] 丁凤星.临海市城西中学校志[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169-170.
- [12] 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海地方史:1924—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97.
- [13] 张白坚.对五月的感想并告临海青年[M]//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海党史资料:1919—1949.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139-144.

作者简介:凌冬梅(1984—),女,嘉兴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

收稿日期:2018-06-28

农民工政府信息需求及获取渠道调查研究

任 婕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文章从农民工的政府信息需求和获取渠道两方面入手,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深入了解其信息需求和获取政府信息的现状。对政府发布信息的渠道及信息内容进行归纳整理, 分析农民工有效获取和利用政府信息的规律, 提出了面向农民工特殊群体传播政府信息的渠道和内容建议, 有助于解决农民工有效信息缺口问题。

关键词: 农民工; 政府信息; 信息需求; 获取渠道

中图分类号: G253.1; G252.0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mand and Access Channels of Migrant Workers

Abstract Starting from investigating of the demands fo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from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obtaining channels, this paper makes a thorough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demands and their ways to obtai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fter categorizing and concluding the ways and content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e author provides suggestions that special group of migrant workers should be targeted when transmitt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problem of absence of useful information can be settled.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needs; access channels.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对于政府信息的定义“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政府信息主要包括: 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 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 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这些政府信息用于引导、指导和扶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1]。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 在本地从事非农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在信息发达的城市中生活, 对关乎自身生存发展的政府信息的需求也变得日益迫切。有效地获取非保密性政府信息, 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公众的基本权利, 也是农民工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认识和了解农民工获取政府信息的基本情况, 有助于提高政府信息服务质量, 切实

落实惠民政策。

本文从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和获取信息渠道两个方面入手,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 深入分析其获取政府信息的现状, 统计政府针对农民工发布的信息内容和途径, 探讨政府发布的信息能否满足农民工的信息需求, 以及获取渠道的相关问题。

1 农民工获取政府信息现状调查

1.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主体部分由农民工政府信息需求、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获取信息时所遇到的困难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多选题的形式, 从政府发布的全部信息中提取出与公众息息相关的各类信息。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显示,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上网的比例为85.7%, 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2.7小时; 而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中,这两个指标均高达91.3%和3.3小时^[2],上网比例非常高,所以在对第二部分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进行调查之后,笔者又进一步对获取渠道中的网络渠道进行了细分,包括PC端和UC端里下载量高、有代表性的获取资讯类软件,以及政府电子政务公共系统,以多选题的形式,对农民工使用网络渠道的具体情况进行调研。为保证正式问卷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正式调研前首先进行了两次预调研,每次预调研搜集50份调查问卷,对测量指标及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整,最终的调查问卷条款及选项如表1所示。

表1 问卷调查设计

条款	选项
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工资收入、从业类别、接触网络时间、上网频率、未来发展意向
农民工政府信息需求(多选)	A、时事新闻 B、交通 C、医疗/健康信息 D、个人理财信息 E、促进就业信息 F、子女教育 G、老人养老 H、住房 I、权益保护
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多选)	A、询问亲朋好友 B、报纸 C、电脑上网查询 D、手机上网查询 E、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 F、去相关部门办公场所咨询 G、到公共图书馆查询 H、其他印刷媒体(海报、传单)
网络渠道获取政府信息时常使用的是(多选)	A、微信 B、新浪微博 C、腾讯新闻 D、百度(知道、贴吧) E、今日头条 F、搜狐新闻 G、政府电子政务公共系统 H、其他软件 I、从不使用
获取信息时所遇到的困难(多选)	A、没有足够时间去查寻信息 B、不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 C、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但自己无法使用该渠道 D、付费高于自己所能接受范围 E、信息太多,无从下手 F、找到的信息不足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1.2 数据收集及基本情况

从2018年1月18日开始,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在火车站、工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实地发放问卷并指导填写,同时在网上小范围发放来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打工的18~48岁人群。历时一个月,共收集218份问卷。经过问卷筛选,最终保留206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4.50%。

有效问卷中,男性占104人,女性占102人,男女比例均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8~48岁,为79人次,占总人数的38.35%。参与调查人群学历小学及以下的10人,初中47人,高中或中专66人,大专28人,本科及以上55人。从业类别有建筑业(建筑工地的普通工人、技术工人等)18人、制造业(制造类企业

的流水线工人、技术工人等)58人、服务业(餐饮业、运输业、旅社、美容等行业的服务类工作人员)64人、个体批发零售业14人、其他行业52人。此外,本次调查人群中,上网超过5年的占63.59%,他们对网络有一定的了解,上网3~5年的占17.48%,上网1~3年的占12.13%,上网不到1年的占6.8%。在薪酬方面,有41.3%的人在2 000~4 000元,25%的人在4 000~6 000元,8.8%的人在6 000~8 000元,4.9%的人在8 000元以上,还有20%的人在2 000元以下。建筑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调查人群的平均月收入基本符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3 485元^[2]。从调查人群的男女比例、年龄段、学历及所在行业等方面上看,具有代表性,因此样本具备初步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1.3 信息需求内容

对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可以看出农民工关注的信息类别主要集中在时事新闻、医疗/健康信息、子女教育等,所占百分比如表2所示。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51.94%的人关注时事新闻,50.49%的人关注医疗/健康信息,49.51%的人关注子女教育,这说明农民工最关心的是在城市立足所需的基本生存保障信息。老人养老(34.47%)、权益保护(33.98%)、个人理财信息(33.98%)、住房(30.58%)、促进就业信息(29.13%)也受到相当一部分被调查农民工的关注,表明农民工在首选生存信息之外,也需要考虑未来发展有关信息。只有24.76%的人关注交通信息。调查反映出农民工信息需求涉及的种类广泛,政府应满足农民工不同类型的信息需求。

表2 农民工关注的信息类别

信息类别	数量/份	占比/%
A、时事新闻	107	51.94
B、交通	51	24.76
C、医疗/健康保障信息	104	50.49
D、个人理财信息	70	33.98
E、促进就业信息	60	29.13
F、子女教育	102	49.51
G、老人养老	71	34.47
H、住房	63	30.58
I、权益保护	70	33.98

1.4 信息获取途径

农民工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手机上网查询是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首选途径,有79.61%的人选择该项,远远超过其他的途径,

经过访谈得知,没有选择手机上网获取信息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或者年龄较大,接触移动互联网时间短,不会熟练使用手机上网。46.12%的人会询问亲朋好友或熟人,说明人际渠道在农民工获取信息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比重。44.17%的人选择电脑上网查询政府信息,28.16%的人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17.48%的人去相关部门办公场所咨询。到图书馆查寻、报纸、其他印刷媒体(海报、传单)都只有5%左右的人选择,大多数被访谈的人认为这几种方式会花费相对较多的时间成本且不易获得。

表 3 获取政府信息途径

获取途径	数量 / 份	占比 / %
A、询问亲朋好友或熟人	95	46.12
B、报纸	11	5.34
C、电脑上网查询	91	44.17
D、手机上网查询	164	79.61
E、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	58	28.16
F、去相关部门办公场所咨询	36	17.48
G、到公共图书馆查寻	12	5.83
H、其他印刷媒体(海报、传单)	10	4.85

笔者进一步对网络渠道获取信息进行探究,农民工获取信息时使用资讯类客户端的情况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在接受调查的206人中,有135人会使用微信获取信息,110人使用百度(知道、贴吧),98人使用腾讯新闻,这3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途径的使用者更多一些。有63人使用今日头条,50人使用新浪微博,25人使用搜狐新闻。使用人数最少的网络渠道是政府电子政务公开系统,仅有19人使用,这与近年来大量政府电子政务系统上线的情况形成鲜明反差。经过访谈,笔者发现农民工对政府电子政务系统所知甚少,甚至不少被调查者表示从未听说。

表 4 网络渠道获取信息时使用的客户端

客户端	数量 / 份	占比 / %
A、微信	135	65.53
B、新浪微博	50	24.27
C、腾讯新闻	98	47.57
D、百度(知道、贴吧)	110	53.4
E、今日头条	63	30.58
F、搜狐新闻	25	12.14
G、政府电子政务公共系统	19	9.22
H、其他软件	18	8.74
I、从不使用	6	2.91

1.5 信息获取现状

为了了解农民工获取政府信息所遇困难,笔者设置了多选题进行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有45.63%的人

认为找到的信息不足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即目前使用渠道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并不令人满意。还有41.26%的人不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这反映出政府的信息发布渠道在农民工群体未实现全面推广。37.86%的人认为信息太多,无从下手;还有36.41%的人认为没有足够时间去查寻信息,这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中,农民工所使用的获取信息渠道的信息整合度和关联度差,获取效率低。24.76%的人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但自己无法使用该渠道,16.5%的人认为付费高于自己所能接受范围是目前获取信息时的困难,比如由于使用某渠道需要付出的物质成本或时间成本高于预期从而放弃该渠道。

表 5 获取政府信息时遇到的困难

困难类型	数量 / 份	占比 / %
A、没有足够时间去查寻信息	75	36.41
B、不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	85	41.26
C、知道去哪里查寻信息,但自己无法使用该渠道	51	24.76
D、付费高于自己所能接受范围	34	16.5
E、信息太多,无从下手	78	37.86
F、找到的信息不足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94	45.63

2 针对农民工的政府信息内容及发布渠道分析

2.1 针对农民工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

政府信息传播渠道主要是指政府信息在社会系统中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从传播主体的性质来看,可以将政府信息的传播渠道分为三类:政府主导的官方渠道、企业主导的市场渠道与非营利组织主导的公益渠道。三种不同的渠道功能各异,对于社会公众政府信息获取行为的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3]。政府主导的官方渠道除了新兴的政府网站(电子政务公开系统)、政务微博等网络渠道,还有报刊、广播电台、电视、相关部门办公场所等;企业主导的市场渠道有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新闻手机客户端和各类营利性信息咨询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档案馆等。

(1) 政府网站/政务微博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规定,各级政府要在2018年底完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全部上线,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4]。这一举措将打破目前“数据孤岛”的局面,各个

政府部门资源整合共享,政府网站上的个人办事大厅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站式”服务。政府网站主要有发布信息、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交流互动四项功能^[5],信息更新及时,对政策有详细解读,有些政府网站还开设了“流动人口绿色通道”,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极大便利,是农民工获取政府信息最准确、最便捷、最全面的方式。

此外,政务微博也是政府网上公布信息的重要渠道,截止到2017年底,经过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73 569个^[6],政务微博的规模继续稳定增长。打开微博“热搜”,就可以看到时下热点新闻,每分钟更新一次,可以实现“快阅读”。通过政务微博,可以随时随地评论转发,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信息传播。但对于一些政府出台的政策,政务微博只能起到宣传作用,无法说明具体操作细节。

(2) 公共图书馆/档案馆

政府会将印制的宣传材料放于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用于职业培训指导、权益维护等信息宣传,但效果并不佳。首先是因为农民工群体接触图书馆、档案馆的机会少,其次就是大量发放宣传材料,虽然散播出去的多,但是农民工很少能仔细阅读宣传材料上的内容。

从信息发布方式来看,政府信息发布渠道又可分为公开发布渠道和推送渠道^[2]。公开发布渠道需要农民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查询获取信息;推送渠道是政府逐级地把信息传达到农民工,属于被动的获取信息。

政府的推送渠道是经由市、区或县、街道或乡镇、社区或村等行政体系,下发至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企事业单位,通过农民工房东或者雇主,由他们直接向农民工传递政府信息。这种渠道接收利用信息的效果最好,可以直接落实到农民工,但成本高,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政府部门一般会通过推送途径向农民工群体传递诸如计划生育、通报疫情、防范火灾、人口登记、十九大召开、响应国家号召等管理类信息。

2.2 针对农民工的政府信息内容

政府针对农民工群体发布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管理类信息和民生类信息。

(1) 管理类信息

管理类信息包括人口调查、计划生育知识宣传,

护林防火、以及让社区中的每位租户签署安全责任书等。这类信息一般都是政府部门硬性要求的,有专人负责,每家每户走访,确保信息落实到位。

管理类信息与政绩联系紧密,政府经常发布此类信息并组织宣传,但农民工群体并不关注此类信息。

(2) 民生类信息

民生类信息即农民工最关心的关乎他们切身利益和发展的信息,主要包括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就业政策、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异地就医政策、住房等相关信息。

民生信息的发布途径为政府官方渠道和各类新闻客户端,需要农民工群体自主浏览信息获取。根据前文的调查结果,农民工最常用的信息获取渠道是手机上的新闻客户端,然而许多新闻客户端中的政务信息,只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没有详细的办理手续说明。除此之外,对于民生信息,政府很少进行追踪,通常只发布出去而已,并不关注农民工获取利用情况。

3 启示与建议

3.1 融合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和政府信息发布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获取的信息大多数来源于手机上网,确切地说是通过微信,其次是熟人朋友交谈。微信上的信息一般来自于各种公众号,经过转发,传达到农民工手上,但是微信平台上传播的信息大部分是面向中间阶层,很少有针对农民工群体的信息,即使有也是一些政府宏观政策,无法真正满足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当农民工无法通过上网查询到想要的信息时,就会询问熟人朋友,借鉴他们的经验,把大家所说的信息汇集拼凑,再去相关部门办理,这种方法耗费时间长,且信息通过人际关系层层传播之后准确率会降低。

电子政务平台是政府信息最主要的发布渠道,虽然农民工经常使用手机上网获取信息,但很少浏览政府网站,这就出现政府信息主要发布渠道和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的错位。想要避免这种错位,就需要结合农民工获取信息时渠道选择规律,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改进:(1)利用农民工熟悉的信息渠道,对政府网站进行宣传推广。比如开设政府官方微信号,在其他微信公众号里附送政务平台的链接,在各类新闻客户端里宣传当地政府门户网站,在村委会、居委会和农

民工聚集场所对电子政务平台进行宣传。(2) 农民工群体中手机上网用户远远超过电脑上网用户, 政府应推出电子政务的手机客户端, 让人们利用手机就可以全面掌握信息甚至办理业务。

3.2 对接农民工信息需求和政府信息内容

除时事新闻外, 农民工最关心的, 是医疗健康保障、子女教育等在城市立足所需的基本生存保障信息, 这些信息发布在政府网站和大众传播平台上, 需要由农民工通过自主搜寻或不经意浏览获得。从大众传播平台或亲朋好友等常用渠道那里获取的信息, 有45.63%的人认为找到的信息不足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经常使用“碰钉子法”——到政府部门办公场所, 听工作人员说需要什么证明、盖章, 再去下一个部门, 来回奔波, 有时还会遇到政府部门休假。这种方法效率低、波折多, 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办事难”的想法。

与需要自主寻求的生存保障信息相比, 政府主动推送到户到人的, 是农民工并不迫切需要的管理类信息, 像人口普查、群租房检查之类的管理工作, 或者两会召开、安全知识等宣传工作。行政工作人员每家每户走访, 将传单海报张贴在住房门口, 还要拍照记录, 有时会有上级领导检查, 确保将信息传达到每位农民工。

政府应该从农民工信息需求角度出发, 将农民工真正需要的信息, 以“接地气”的形式传递到农民工

手里, 而不仅仅是将信息公布出来。官方公布的民生信息对农民工群体来说不容易理解, 政府可以联合社区、街道, 将文字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式, 比如漫画、视频, 传播到农民工群体中。民生信息也应该跟随上级硬性要求入户的管理宣传信息一起, 直接推送到农民工手上, 由专人为农民工讲解具体操作流程。

3.3 优化政府信息传播环境

正常情况下, 农民工有了信息需求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可是在实际中, 由于农民工缺乏自己的工会组织、社会组织的支持, 再加上人际网络、信息素养等局限性, 政府信息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传播效力很有限。要想真正打破政府信息与农民工“最后一公里”的隔阂, 就要加强社会组织上传下达的作用, 调动社会组织帮扶农民工这类“边缘化群体”的积极性。(1) 结合志愿者服务机制, 在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和街道进行公益信息服务, 面对面给农民工讲解惠民政策, 手把手教他们使用电子政务系统。(2) 开设“家庭文化室”, 定期举行信息交流活动和信息获取培训会; 图书馆和档案馆应该让知识与信息“走出去”, 对信息弱势群体进行结对帮扶。(3) 提升农民工群体的信息素养, 从提高文化素养、增强自主获取信息的意识和加强获取信息的技能三方面对农民工进行培养, 使其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 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信息, 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的信息。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J].司法业务文选,2007(20):3-9.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经济日报,2018-03-01(005).
- [3] 华珩晖.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人才资源开发,2015(22):119-120.
- [4] 蒋冠.政府信息公共获取影响因素探析[J].情报资料工作,2010(2):53-57.
- [5] 杨绚.针对农民工的政府信息的传播渠道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
- [6]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J].成组技术与生产现代化,2015,32(3):51-58.

作者简介: 任婕(1995—), 女,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收稿日期: 2018-07-03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国内外知识创新模式研究述评

赵浚吟¹ 柴雯² 杨华²

(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1121)

(2.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山西太原 030000)

摘要: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灵魂。对知识创新过程的研究,也就是对知识创新模式的研究。为此,针对知识创新模式问题,文章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角度梳理文献进行综述,得出目前对知识创新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缺少知识创新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针对知识创新的细分对象较多,涉及本身全部功能和活动的研究较少;缺少整体知识活动的模式构建。

关键词:知识创新;模式;知识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Patter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bstract Knowledge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study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cess is the study of the patter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ree problems after reviewing both hom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lack of basic system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 more subdivision object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are, the less research involves itself in all functions and activities; lack of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knowledge activities.

Key words knowledge innovation; pattern; knowledge activity

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灵魂。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发生着改变,而知识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最早,知识创新的概念起源于经济管理领域。自约瑟夫·熊彼特(J·Schumpeter)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加以经济学阐释以来,学者们分别从技术、产业、制度、管理、文化等角度尝试探究创新的本质。美国麻省Enotovation国际咨询公司总裁、著名战略专家艾米顿(Debra M. Amidon)在1993年首次提出“知识创新”的概念,她在《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Innovation Strategy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一书中指出:知识创新是通过创造、交流等方式将新思想与经济服务等活动融合以促进企业获得成果、国家进步、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和过程^[1]。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开始关注知识创新的过程,强调信息技术与工具和组织与管理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关于知识创新的

研究从实体走向过程,从静态走向动态^[2]。

“模式”这一概念起源于建筑学领域,最初用以表示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方案,包括在一定环境中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后来这一概念逐渐应用到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用以表示抽象的解决问题的理论。在知识创新领域,知识创新模式一般指可以实现知识创新的一套方法、流程或者理论。知识创新的概念兴起于实业发展,因此知识创新模式的探讨在知识创新理论研究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理论,不同的分析角度与思路衍生出了不同的知识创新模式理论与应用。本文将依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别探讨国内外知识创新模式研究现状、问题与解决方案。

1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知识创新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

成果也更为丰富。国外关于知识创新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1 企业/组织知识创新活动研究

知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最早源于企业这一知识主体。国外学者探索企业或组织知识创新模式的时间并没有很长,总体来说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才开始相关研究。国外学者从知识创新活动的认识开始,通过了解其机理和运作方式,最终将企业或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创新体系来研究。

早期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研究的有Wiig、Boisot、Nonaka、Szulanski等学者。他们主要从知识创造的路径出发,研究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Nonaka和Takeuchi依据日本企业知识类型和转化机制提出的知识创新模式。

1995年,Nonaka和Takeuchi在分析日本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后,指出组织知识的创造来自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不断的连续动态互动,这些互动由不同的知识转化模式所驱动,即SECI模型和四种“场(Ba)”,通过不断积累,使得知识呈螺旋式增长。这四种模式指: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部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组合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内部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四种场分别为创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练习场。在SECI模型的四个知识转化阶段中前后会经历四种场所(Ba),在这四个场所中,会分别进行特定的知识转化程序,使得知识创新过程得以进展。在完成四个场所的知识转化程序之后,知识形成螺旋化演进,形成知识增量,实现知识的增长和创新^[3]。

SECI模型是对知识本身不断转化、增长和增值的一种机理的研究。野中郁次郎所提出的“场”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说明,企业知识创新需要在一定的知识交流环境中进行,良好的组织环境有利于组织成员进行知识的沟通 and 交流,共同激发灵感和思维,促进知识创新。Nonaka、Konno和Toyama等认为,为了建立良好的环境,企业必须探究“场”的位置、元素、环境等因素,并对其加以强化和优化。如对标新立异的鼓励、对员工的关怀和信任、构建良好的组织氛围、对知识贡献者予以奖励等,都可以促进知识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4]。

Wiig在知识创新活动模型的构建研究领域,有着深刻且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知识创造的过程受三个

关键支柱影响,经过创造、显性化、应用和扩散,知识达成创新应用,需要经历三个重要环节:创造出新知识,即通过探究、分析、调查、组织等创造新知识;评估知识价值,即对知识和相关活动进行评估,确认其价值;控制和应用,即控制整个知识创新过程,并将最终结果投入使用^[5]。

Boisot提出知识在立体空间中移动图,指出知识在立体空间中移动,形成知识的创造与扩散机制^[6]。Leonard Barton提出核心能力与知识创新体系,探究知识创新活动如何为企业增长核心竞争力^[7]。Szulanski则构建了四阶段的知识创新模型:知识启动阶段模型、知识实现阶段模型、知识提升阶段模型和知识整合阶段模型,并通过这一模型证明了组织内部的粘滞性决定了知识转移能否顺利进行^[8]。Alavi则对企业员工的知识创新行为进行了描述,将其划分为创造与开发、索引、集成和内外互联以及知识的应用^[9]。

除了研究传统企业活动中的知识创新过程外,还有学者在新技术的背景下研究了这一问题。Liebowitz等人指出,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技术,如数据挖掘、专家系统、神经网络等都可以应用到知识创新领域^[10]。

1.2 基于知识共享与转化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在知识创新活动的探索与研究之后,SECI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在于这一模式肯定并分析了隐性知识的共享和转化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性及作用机制。由此促使更多的学者们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SECI模式是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类及相互转化的理论上建立的。因此,从不同的角度,许多学者提出不同的拓展模式。

一方面,基于不同的知识分类观点。Scharmer通过论述隐性知识可以继续细分为物化的隐性知识和自我超越的知识,在原有的经典的SECI模型基础上,提出了SECI的扩展模型:第一部分是SECI1,包括显性知识的物化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第二部分是SECI2,指显性知识和自我超越的知识的相互转化。这三种知识相互转化,分别构成企业知识创新的两个螺旋,实现企业技术创新^[11]。Hall和Andriani也提出,知识的划分需要遵从更为复杂和细致的依据,企业的知识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复合体,纯粹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是很少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构成百分比可以用“知识谱”的形式来表示^[12]。

另一方面,从转化机制来看。美国知识研究所

(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e)提出了知识创新的演化过程模型^[13],该演化模型指出,知识的相互转化不仅发生在类型变化中,还发生在层次变化中,在企业中,个体知识尤其指隐性知识可以通过不断的演化推进,成为企业的程序化知识。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构成了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Von Krogh和Grand则根据各类知识转化模型,提出知识转化模型中的必然矛盾,即新知识与原有规范标准尤其是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受此矛盾影响,新知识可能不被接受^[14]。

1.3 基于环境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知识创新需要在一定的场所或者环境中来进行,知识创新的过程依赖各种环境因素。在野中郁次郎提出的“场”的理论的基础上, Malin Brannback对其进行了拓展研究。该研究指出,不论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场所”,为知识转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些场所独有的方式和文化,场所间的相互衔接是促进知识共享和转化的重要支撑^[15]。

其他相关研究如Mireille Merx-Chermin和Wim J.Nijhof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知识创新影响的框架模型,该模型探究了知识创新的影响因素,包括预期价值、组织氛围、组织结构等,由此指出,组织应该依据这些影响因素构建适当的环境来促进创新^[16]。

此外,还有学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知识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基于电子邮件、BBS、虚拟组织等交流方式提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创新模型^[17]。

1.4 基于组织协作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基于组织协作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有两条发展脉络:

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研究产业、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创新协作研究。费里曼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是技术创新的经典形式,强调在国家的范围内,各主体相互合作,促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形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在这一模式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各种资源、条件和服务,大学主要进行人才与知识的提供,企业则是创新发展的主体^[18]。

二是以企业为主体,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探究基于企业上下游合作的知识创新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合作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供应链的存在与发展,是基于合作的价值增长。作为价值增长的根本途径,知识创新在其中必然扮演重要角色^[19]。

2 国内相关研究

笔者使用检索词“知识创新”“知识创造”“模式”“模型”“过程”,在中国知网中进行组配检索,得到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经过梳理和分析可知,我国关于知识创新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2.1 国外经典知识创新模式的问题与改进

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提出的SECI知识创造螺旋模型在知识创新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被相关领域的学者奉为经典的知识创新模式。我国早期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就是以SECI模型的引进与分析为开端^[20]。我国学者对个人、团体、组织及企业联盟的知识创新活动进行研究,结合SECI模型,探索其内在规律。研究发现,SECI模型虽然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仍然有许多缺陷:

(1)经典的SECI模型包括四个环节,即社会化(隐性知识共享)、外部化(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组合化(显性知识整理)、内部化(学习及隐性知识显性化)。在对四个环节进行描述分析时,野中郁次郎过分强调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忽视了显性知识的共享对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21],以及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组合化过程^[22]。

(2)SECI模型着重考虑了组织内部的知识创新,也描述了不同层面之间的知识转换,但是对个体、组织、行业之间的知识交互与创新过程阐述不清,忽视了知识创新的复杂性。仅对知识创新过程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模糊的描述,没有分析知识创新方向、速度、路径等细节^[23]。

(3)SECI模型是一个封闭的模型,而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受多种因素干扰,企业或组织的知识创新过程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外部环境存在的知识发生交互,形成新知识^[24]。外部环境中的知识包括供应链上下游知识,社会知识,相关组织的知识、政策环境等。

(4)SECI模型的基础是知识的分类。依据野中郁次郎的研究,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25]。如果将知识是否能被编码量化成一条数轴,那么隐性知识就是完全不能被编码的知识,显性知识就是能够被完全编码的知识^[26]。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分别处于知识分类的两极,在这两极之中,存在着大量的

灰色知识,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显(隐)性知识^[27]和假显(隐)性知识^[28]。灰色知识在组织中是广泛存在的,比起隐性知识具有更加良好的可转化性。企业在知识创新活动中应当更为重视这类知识。

针对上述缺陷,我国学者进行了许多改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芮明杰^[21]、徐瑞平^[29]等人为代表的基于知识价值链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流派。该流派的研究利用价值链的概念和方法,分析组织中知识产生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阐述知识创新的机理与模式。另有“扩展的知识转换模型”^[30]“知识创新的碗装模型”^[31]和“IDE-SECI模型”^[32]等,在经典SECI模式的基础上作出了许多修正。

2.2 知识活动视角下的企业知识创新模式的研究

从知识活动出发探究知识创新模式是国内外学者的主流研究思路,我国学者延续这一思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知识管理是知识创新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保障。可以说知识创新既是知识管理的一个环节,又是它的目的。因此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创新活动的机理与模式,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我国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多沿用国内外经典知识创新模式,对知识管理活动的各环节进行研究和分析,用以指导企业知识管理与创新活动。

国外学者对供应链中的知识创新研究已有很多,这类研究通常关注供应链成员及外部环境的系统知识创新活动,主张为了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保障供应链的高效运作是十分必要的,而供应链的优势来自于知识^[33]。受这一思路的启发,我国学者也展开了基于供应链的知识创新研究。这类知识创新模式将知识活动从组织内放在了组织间来观察,以SECI模型理论为基础,通常构建知识创新活动的网状模型,要求各组织协同互助来达到共同创新的目的。

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自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被提出,人们在组织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比竞争对手学习的更快的能力”这一观点上已达成共识^[34]。根据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型,探索不同的知识创新路径与方法。较普遍被认可的一种说法认为,在组织学习过程中,知识创新经过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具体化、知识的运用及知识的扩散这四个阶段不断螺旋上升^[35]。另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模型^[36]

和“知识发酵”理论,也由此而来。

从知识本身所表现出的属性出发,我国学者结合物理学领域势能及量子论的知识,构建知识创新模式。

“知识位势”研究者主张物体由于处于某一位置而必然具有一定的势能,那么位于知识场中的知识主体即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势能,表现为知识主体所掌握知识的深度、广度,势能差就是促使知识创新的力量^[37]。

“量子论”观点则认为,与光一样,在知识创新视角下,知识具有“波粒二象性”,知识既是存量,又是过程,知识创新的过程就可以用粒子突破障碍的过程来描述,基于此构建知识在不同环境中的创新机制^[38]。

此外,还有基于仿生学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39]、基于知识构架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40]等。

2.3 创新系统视角下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知识创新是知识理论与创新理论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末,创新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阶段。早期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要归功于国家创新体系,这一体系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41]。在一个创新系统中,元素种类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包括创新主体,还包括创新主体间的关系及其所涉及的一系列环境。根据系统大小不同,可以将创新系统划分为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企业创新系统。基于此我国学者在以下两个领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一是三螺旋合作创新模式。产业—高校与科研机构—政府合作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种创新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单一的主体在知识创新上难以生成重大突破,因此,将不同的主体组织起来,在一定组织结构和制度的支持下形成协作体系,才能将知识创新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目前国内对三螺旋合作模式的探索已十分成熟。葛杨等人从宏观角度指出产学研合作模式下,知识创新主要有三种模式:生产需求型、产业集群型和创新网络系统^[42]。王娟茹、李成龙等人侧重研究产学研合作中知识创新活动的机理,分析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各主体的地位、功能及作用方式^[43-44]。

二是产业集群创新。产业集群指在某一特定产业中,大量在产业中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地理位置上集聚,并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在区域和国家经济增长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不仅仅是产学研知识创新机理的研究重点,还是区域创新的研究中心。我国学者对区域产业集群现象中的知识创新分析,主要是从机理入手,分析知识创新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领域所研究的知识创新模式多集中于组织之间的互动和知识的流动,对知识的特性和知识创新的动因分析较少。

2.4 其他主体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企业是知识创新研究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主体,但是随着知识管理在不同组织中的应用,以及协同创新思想的演进,一方面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创新是提升主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其他创新主体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由此知识创新活动研究在不同主体中展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1)以个人为主体的研究。组织中人的原动力是知识,知识创新来自于人,组织中个人学习的能动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组织知识创新。因此研究个人知识的获取、组织、传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学者对个人知识创新的研究多与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个人知识管理、个人学习等领域相结合,较少的研究集中在个人知识创新模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我国学者陈国权的相关研究,他提出个人知识来源模型^[45],该模型通过分析个人知识获取和传递的过程,指出个人知识来源有四种途径:体验法、交流法、解读法和反思法。通过这四种方法可以提高个人知识获取与传递效率。

(2)以科研团队或组织为主体的研究。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知识创新研究早期,刘助柏等人就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创立了知识创新学^[46]。路甬祥指出,知识创新是指通过基础研究来获取新的知识的过程^[47]。科研团队/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团队/组织,在当代的科技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创新能力取决于团队的知识的运作机制、团队结构、科研氛围、管理模式等^[48]。吴杨等人从系统的角度,对科研团队进行了实际调研,分析科研团队的运作机理,得到科研团队的知识创新模式,这一研究指出科研团队的创新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特性,需要引入协同机制来加速知识增值。其他研究者多从知识创新的各环节或影响要素出发,研究其作用机制,多集中于知识整合、知识共享、协同模式、团队管理等。

除此以外,另有以特殊主体为主题的知识创新模

式研究,如图书馆、政府、教师人群、煤炭企业、高技术企业、石油化工企业、中小型企业等。也有以特殊活动为对象的知识创新机理探究,如教学、信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等。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针对知识创新模式问题,目前国内外关于知识创新模式已有很多,但以往的研究尚存在些许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展开以下讨论。

一是缺少知识创新基本问题的系统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创新的定义尚没有达成统一,但是都基本上认同知识创新包含知识创造和产生价值。这一认知是基于企业或营利性组织的研究。但是是否同样适用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尚未明确。高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是知识生产、扩散、传播与应用的场所,其知识创造和产生价值的途径与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已有学者提出高校的知识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其价值,这样的价值有可能是隐性的,难以用经济手段衡量,但是尚没有研究提出合理的判断与衡量方法。因此,国内外学者在知识创新的内涵、特点、范围等问题上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是针对知识创新的细分对象较多,涉及本身全部功能和活动的研究较少。在对知识创新活动进行研究的许多文献中,图书馆、科研团队、专利等直面社会经济发展,或者能够直接反映知识创新的部门、数据、活动是比较常见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解决知识创新相关问题。但是,这些知识创新的主体,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向社会输送的不仅仅是知识,还可以是知识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产品、服务等。我们需要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探究知识创新问题。

三是缺少整体知识活动的模式构建。知识活动是研究知识创新的重要基础。目前,关于知识创新模式的研究较为分散,角度多样。大量文献都集中于研究官产学研的合作,其中,高校作为一个知识单元,参与系统互动,主要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然而,这些探究多集中于个别机构、个别职能活动,并不全面。较少文献探究这种支持究竟来源于哪些具体的知识活动。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知识创新

模式的研究尚不系统,缺少成熟的基本理论框架,存在概念模糊、定义不清的问题。学者往往追逐新鲜的角度进行探寻,虽然大大扩展了研究视野与应用领域,但是根基不牢,上层研究往往“不接地气”,较难

以在实体经济中得到有效应用。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基础理论上开展研究,完善基本理论,打牢学科基础,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入实际,将研究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着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与应用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AMIDON D M.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the Knowledge Economy: The Ken Awakening[M]. London: Routledge, 1997: 27-37.
- [2] 薛晶晶. 国内外企业知识创新研究比较分析[J]. 情报探索, 2012(8): 76-79.
- [3] NONAKA I.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5(85): 162.
- [4] NONAKA I, KONNO N. The Concept of “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8(3): 40-54.
- [5] WIIG K M. 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s: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How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Create, Represent and Use Knowledge[M]. Arlington TX: Schema Press, 1993: 15-23.
- [6] BOISOT M H. Knowledge Assets: Sec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15.
- [7] LEONARD BARTON D.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13): 111-125.
- [8] SZULANSKI G.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27-43.
- [9] ALAVI M. KPMG Peat Marwick U.S.: One Giant Brain[J].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1997(9): 20-28.
- [10] LIEBOWITZ J.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s Link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1(20): 1-6.
- [11] SCHAEMER C O. Self-transcending Knowledge: Sensing and Organizing Arou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01(5): 137-150.
- [12] HALL R, ANDRIANI P. Managing Knowledge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J]. Journal Business Research, 2003(56): 145-152.
- [13] Knowledge Research Institute, Inc. The Personal Knowledge Evolution Cycle[DB/OL]. <http://www.knowledgeresearch.com/articles.htm>, 1999.
- [14] KROGH V, NONAKA I, ABEN M. Making the Most of Your Company's Knowledge: A Strategic Framework[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1(34): 421-439.
- [15] BRANNBACK M. R&D Collaboration: Role of Ba in Knowledge Ecreating Networks[J].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 Practice, 2003(1): 28-38.
- [16] MERX CHERMIN M, NIJHOF W J. Factors Influencing Knowledge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in an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13, 29(2): 135-147.
- [17] LICHTENSTEIN S, PARKER C M. Collaborative Knowledge Creation in Electronic Mai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nowledge & Learning, 2006, 2(3/4): 279-297.
- [18] TREVOR M.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J]. R&D Management, 1989, 19(3): 278-279.
- [19] PATTERSON K A, M GRIMM C M, CORSI T M. Adopting New Technologies f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03(39): 30-38.
- [20] 王丰, 宣国良. 知识创造的机理分析[J]. 软科学, 2001, 15(5): 2-5.
- [21] 芮明杰, 李鑫, 任红波. 高新技术企业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对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模型的修正与扩展[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4, 26(5): 8-12.

- [22] 彭灿,胡厚宝.知识联盟中的知识创造机制: BaS-C-SECI模型[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8,20(1):118-122.
- [23] 姚哲晖,胡汉辉.知识演化和创新的SECI模型之改进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9):118-124.
- [24] 任庆涛,王蔷.知识型企业知识创造的动态模式[J].上海管理科学,2003(6):7-9.
- [25] NONAKA I,TOYAMA R,KONNO N.SEI,Ca, and Leadership: 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J].Long Range Planning, 2000,33(1):5-34.
- [26] 高章存,汤书昆.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企业知识创造机理探析: 兼对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的一个拓展[J].情报杂志,2008,27(8):87-91.
- [27] 吴素文,等.基于知识特性的组织学习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5):95-99.
- [28] 王铜安,等.知识转化灰箱模型与企业知识管理策略的研究[J].科研管理,2005,26(5):86-89.
- [29] 徐瑞平,王丽,陈菊红.基于知识价值链的企业知识创新动态模式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4):78-81.
- [30] 饶勇.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与知识型企业的创建: 对野中郁次郎SECI知识转化模型的扩展与例证分析[J].经济管理,2003(4):44-49.
- [31] 王忠.企业知识创新的整合模式[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4):20-23.
- [32] 耿新.知识创造的IDE-SECI模型: 对野中郁次郎“自我超越”模型的一个扩展[J].南开管理评论,2003(5):11-15.
- [33] 许锦锦,魏文龙.供应链协同知识创新研究综述[J].硅谷,2012(9):83-84.
- [34] 迪克斯.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47-48.
- [35] 何绍华,曾文武.基于组织学习的知识创新过程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7(2):93-95.
- [36] 吴翠花,万威武.基于自主创新的组织知识创造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07,28(3):31-37.
- [37] 党兴华,李莉.技术创新合作中基于知识位势的知识创造模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11):143-148.
- [38] 邱尔妮,邱尔卫,王臣业,等.基于量子论的知识创新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3):144-148.
- [39] 张功.基于仿生学原理的企业知识创新模型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0(3):15-21.
- [40] 王毅.构架—元素知识创造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1,19(3):96-101.
- [41] FREEMAN C.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Printer Publishers,1987:12-18.
- [42] 葛扬,管陵,汤逊.产学研合作的知识创新模式与机制研究[J].经济纵横,2013(8):45-50.
- [43] 王娟茹.产学研合作知识创新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09(10):224-225.
- [44] 李成龙,刘智跃.产学研合作组织耦合互动的知识创新机制[J].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7(5):662-666.
- [45] 陈国权.人的知识来源模型以及获取和传递知识过程的管理[J].中国管理科学,2003,11(6):86-94.
- [46] 刘助柏,梁辰.知识创新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02.
- [47] 路甬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呼唤知识创新工程[J].中国科技信息,1999(Z1):5-6.
- [48] 胡西厚,祁爱琴,雷国华,等.基于科研团队创新的知识运作模式研究[J].科技与管理,2008,10(3):50-51.

作者简介: 赵浚吟(1988—),女,硕士,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柴雯(1990—),女,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杨华(1972—),男,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

收稿日期: 2018-05-08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比较研究

周满英 付 祿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1203)

摘要: 随着E-science、开放存取运动和科研大数据研究的迅速发展,科研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凸显,数据的创建、存储、管理和再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催生了科研数据策管。文章对科研数据策管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对DCC、ICPSR、JISC3个典型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描述和对比,发现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呈现多样化的同时又有其共通之处,以为我国开展科研数据策管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数据策管;内涵;生命周期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Data Curation Lifecycle Models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science, open access big data appli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value of research data is getting higher,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create, store, manage and reuse data. Therefore, data curation came into be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connotations of data curation. After describing and comparing three typical data curation lifecycle models of DCC, ICPSR and JISC, the author finds that data curation lifecycle models are diversified and share similar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rovides inspiration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ata cur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data curation; connotation; lifecycle model

随着E-science、开放存取运动和科研大数据研究的迅速发展,科研数据的价值越来越凸显,数据的创建、存储、管理和再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催生了科研数据策管(Data/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Cur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2001年10月由数字保存联盟和英国国家空间中心在伦敦组织召开的名为“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Archives, Libraries and e-Science Seminar”的研讨会上^[1]，“Data Curation”一词则是由美国微软首席研究员、计算机图灵获得者Jim Gray等人2002年7月在预印本文库“arXiv”上发表的文章“Online Scientific Data Curation, Publication, and Archiving”中首次提出^[2]。

1 科研数据策管的概念内涵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将“Data”的概念解释为“原始的研究数据”^[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将“Data”的定义进行了细化,认为是“所有通过观察、计算和实验等手段获得的可以用数字化形式存储的信息,包括数字、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动画、软件、算法、方程式、模型、模拟等”^[4],由此可见数据策管的“数据”专指科学数据或科研数据(下文中将“科研数据策管”简称为“数据策管”)。“Curation”来源于拉丁语,本意是照顾,博物馆学中将其翻译为“策展”,表示对馆内藏品进行持续保管、维护和保养,并推出新主题的展览,最终达到提高馆藏利用率的目的^[5]。JISC发布的e-Science Curation Report认为“Curation”一词是指在科学数据产生时就开始的对数据进行管理和促进数据利用的活动,此项活动确保数据符合当前的应用目的,且能被发现和被重新利用,同时不仅包括对数据的管理,

还包括对相关数据的内容进行标注以及对数据内容关系的管理,对于动态的数据集,还要不断对数据进行丰富和更新^[3,6]。

英国JISC对数据策管解释为:“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数据进行评估管理、维护、完善增值,以便于数据在当前和未来被利用”^[7]。英国数据策管中心DCC(Digital Curation Centre)对数据策管解释为:

“在数据整个生命周期内对数据进行维护、保存以及增值的活动”^[8]。

国内目前对Digital Curation/Data Curation的翻译不一,秦健教授于2011年在上海举行的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作的“e-Science图书馆服务前沿:学术图书馆的新创举”的主题报告中,把“Data Curation”一词译为“数据策管”^[9],任树怀、时婉璐等延续了这种翻译^[10],杨鹤林等在其文献中将其译为数据监护^[11],谭榕、元靖涛等将其译为数据监管^[12],丁培等将其译为数据策展^[13],孟宝祥、钱鹏等将其译为数据管理^[14],唐义、肖希明等将其译为数字监控^[15],另外还有学者将其译为数据管护、数据典藏、数据掌管、数据保管、数据医疗等。

笔者认为译为“数据策管”为佳,数据策管是以数据保存、再利用和增值为主要目的的有计划、有策略的数据管理,是贯穿数据整个生命周期(从创建、初始存储到为未来研究存档,直至过时被删除)的管理,数据策管的过程涉及数据创建、数据保存、数据共享、数据存档、数据维护、数据出版等活动。

2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是进行数据策管活动的基础,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和图书馆员进行数据策管工作,不同组织机构提出了很多的数据生命周期模型。本文选取了3个典型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即DCC、ICPSR和JISC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

2.1 DCC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DCC是自数据策管概念提出后成立的全球第一个国家级数据策管中心,该中心2008年制定并发布了其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16],该模型用图形高度概述了成功进行数据策管和保存数据的活动内容、实施步骤和行动路线,具体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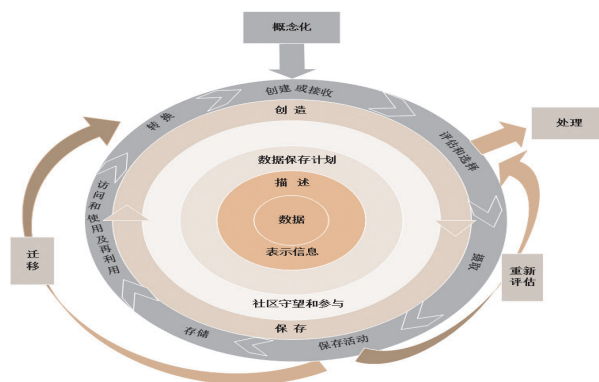


图1 DCC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该模型分7层,中心层为数据层,第2层到第5层为数据策管生命周期功能活动层,第6层为数据生命周期顺序步骤层,第7层为特别处理层。也即DCC模型可以解析为4个模块:“数据”对象、数据策管生命周期功能活动、数据生命周期顺序步骤以及特别处理。

2.1.1 “数据”对象

DCC模型中的“数据”既包含数字对象,也包含数据库。数字对象包括相对独立的简单的数据项以及与其相关的标识符和元数据,也包括由其诸多其他数字对象组成的复杂数字对象集,前者诸如文本、图像、视频、音频,后者诸如网站等;数据库则包括各种结构化的文档记录集,也包括存储在计算机系统的数据集^[17]。

2.1.2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功能活动

数据策管整个生命周期的活动,主要包括4个活动:①描述和表示信息;②数据保存计划;③社区守望和参与;④创造和保存。描述和表示信息是利用具有描述性、结构性、技术性、管理性和保存性的元数据对数据进行表示和描述,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数据保存计划则是制定贯穿于数据策管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保存计划,包括策管生命周期里的所有管理活动和保管活动。社区守望和参与包括保持对研究社区进行高度关注,并参与开发共享标准,以及开发共享工具和软件。创造和保存活动包括数据的监管,以及知识增强和数据维护。

2.1.3 数据生命周期顺序步骤

数据生命周期顺序步骤是围绕数据的处理而进行的8个活动:①概念化;②创建或接收数据;③评估和选择;④摄取;⑤保存活动;⑥存储;⑦访问和使用及再利用;⑧转换。概念化步骤是指构思和计划科学数据的创造,包括数据捕获方法和数据存储选

项;创建数据步骤包括创建结构性、描述性、技术性以及管理性的元数据,接收数据步骤则是在收集政策文件指导下,从数据的创建者以及其他存储库或数据中心等接收数据的过程;评估和选择步骤是指评估和选择那些用于长期策管和保存的科学数据;摄取步骤指将科学数据传输到存储库、档案库、数据中心或其他保管人;保存步骤包括科学数据清理和数据验证,分配保存元数据以及分配标识信息,并确保可接受的科学数据结构或文件格式;存储数据步骤要求以符合相关的存储标准并安全的方式存储科学数据;访问和使用及再利用步骤需要确保既定用户以及再利用用户均可随时访问科学数据,可以通过公开发布数据或通过身份验证来控制访问;转换步骤则是由原始科学数据来创建新的数据,例如转换到不同数据格式,或者创建一个数据子集,或者公开发表出版等。

2.1.4 特别处理

特别处理是在某些情况下或某些学科可能需要进行的额外活动,包括处理、重新评估和迁移3种活动。处理是指处理那些不符合指南、政策文件或法律要求的科学数据,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将其转移到其他库或其他保管者,或者基于法律的原因,安全地进行破坏;重新评估是针对那些未通过验证的科学数据进行进一步评估和重新选择;迁移一般是为了符合存储环境或者确保科学数据免受硬件或软件过时而淘汰,将科学数据迁移成其他格式。

2.2 ICPSR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ICPSR是美国校际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其数据策管生命周期参见图2,一共分为6个阶段^[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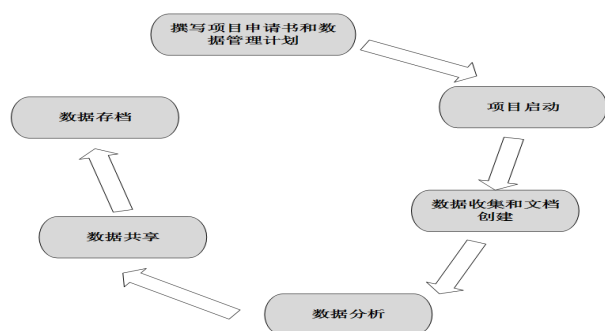


图2 ICPSR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ICPSR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的1~2阶段为科研生命周期前两个阶段,3~6阶段为科研生命周期的项目实施阶段,在这个阶段整合了围绕数据处理的数据生

命周期。具体为:第1阶段是科研生命周期的撰写项目申请书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同时获取数据存档相关建议,以使科学数据能够长期可利用。第2阶段是科研生命周期的项目启动阶段,在此阶段科研人员需要预测科学数据的内容以及数据的格式,可以通过抽样的方法对科研数据和科研方法进行测试。第3阶段是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收集和文档创建阶段,这个阶段科研人员需要考虑科研数据的完整性,对科研数据进行分组、编码、建立标签、确定变量名称等活动;如果是文档,需要参照数据文件倡议DDI的元数据标准进行处理。第4阶段为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分析阶段,在此阶段数据策管活动有管理科研数据集,建立科研数据文件,文件结构需要进行合理的设置,科研数据以及科研文档还需要备份以防丢失。第5阶段是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共享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科研人员了解公开科研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明确科研数据存储的格式和地点。第6阶段是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存档阶段,在此阶段需要科研人员参照数据共享和传播的有关协议,将科研数据打包完整并进行存档。

2.3 JISC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JISC是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该机构提出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分为科研生命周期和数据生命周期^[19],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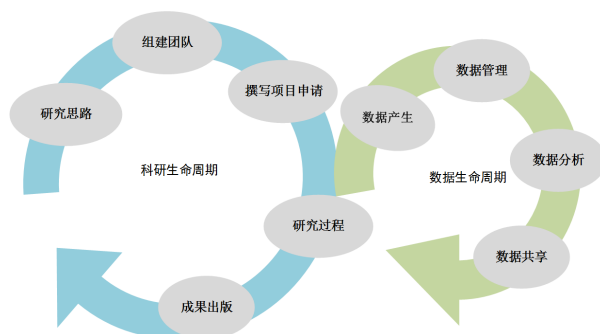


图3 JISC 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其中科研生命周期包括5个阶段:①研究思路/灵感;②组建研究团队;③撰写项目申请书;④研究过程;⑤研究成果出版。数据生命周期嵌入在研究过程中,包括4个环节:①数据产生;②数据管理;③数据分析;④数据共享。模型的说明中指出:科研生命周期第1阶段的研究思路/灵感的产生需要进行的策管活动为文献检索,查找文献资源和阅读背景材料。科研生命周期第2阶段的组建研究团队可以采用线下方

式,也可以利用社交网络。科研生命周期的第3阶段即撰写项目申请书阶段需要同时撰写数据管理计划。科研生命周期的第4阶段即研究过程包含数据生命周期的4个环节,涉及科学数据的产生到共享,不同学科的研究过程差异比较大:科学数据的产生环节可能来源于观察、实验或者模拟等;数据管理环节主要依据数据管理计划进行;数据分析环节主要通过统计和计算进行;数据共享环节主要是对原始或者已经处理的数据进行管理并保存,以便其他人可以进行访问和使用。科研生命周期的第5阶段为研究成果出版,其出版形式可以选择传统期刊,也可以选择出版在开放获取期刊或发布在开放获取仓储中^[20]。

2.4 模型比较分析

表1从模型结构、核心要素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特点比较详细地比较和分析了DCC、ICPSR、JISC3个机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表1 数据策管模型比较和特点分析

模型	模型结构	核心要素	特点
DCC模型	环形层次结构	8个:概念化;创建或接收数据;评估和选择;摄取;保存活动;存储;访问和使用及再利用;转换。	DCC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非常详细,包含了数据策管所涉及的各种功能活动和数据处理过程,可以用于指导组织或联盟的策管计划,以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执行所有必要的阶段,同时参照该模型进行映射,可以定义每个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和职责,也可用来构建标准化的技术及实施框架。
ICPSR模型	链型结构	6个:数据管理计划;确定数据的格式和内容;数据收集和文档创建;数据分析;数据存档;数据共享。	ICPSR模型的特点是将科研生命周期和数据生命周期进行了整合,依据科研生命周期及项目启动后的数据生命周期开展相应的数据策管活动。
JISC模型	链型结构	4个:数据产生;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	JISC模型的特点是将数据生命周期嵌入了科研生命周期的研究过程,并将科研生命周期从研究思路的产生开始探索数据策管活动。

参考文献:

- [1] POTHEM P. Digital Curation: Digital Archives, Libraries and e-Science[EB/OL].[2018-05-10].<http://www.dpconline.org/events/past-events/digital-curation>.
- [2] GRAY J, SZALAY A S, THAKAR A, et al. Online Scientific Data Curation, Publication, and Archiving[EB/OL].[2017-07-14].<http://arxiv.org/ftp/cs/papers/0208/0208012.pdf>.
- [3] LORD P, MACDONALD A. E-Science Curation Report: Data Curation for e-Science in the UK: An Audit to Establish Requirements for Future Curation and Provision[M]. Digital Archiving Consultancy Limited, 2003.
- [4] National Science Board. Long-Lived Digital Data Collections: Enabl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EB/OL].[2017-09-10].<https://www.nsf.gov/pubs/2005/nsb0540/>.
- [5] 邓仲华, 宋秀芬. 信息资源云的数据监护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4(17): 45-52.

(下转第87页)

DCC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非常详尽,有涵盖了数据对象内涵的描述。数据策管生命周期各种功能活动,也有数据的顺序处理步骤,以确保进行数据策管时顺序执行所有必要的阶段,同时又有特殊情况下需要进行的数据处理活动,可以直接用于指导组织或联盟的策管计划,或者借鉴该模型用来构建标准化的技术及实施框架。ICPSR模型相对简单,只是一个单链结构,特点是将科研生命周期和数据生命周期进行了整合,依据科研生命周期及项目启动后的数据生命周期开展相应的数据策管活动。JISC模型则将数据生命周期嵌入在科研生命周期的研究过程,并将科研生命周期从研究思路的产生开始探索数据策管活动。

3 结语

通过以上3个典型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呈现多样化的同时又有其共通之处,多样化表现在模型结构、角度、核心要素的数量和内涵、模型的特点、详略程度等,共通之处表现在都是针对科学研究,数据对象都是科研数据,核心要素都有数据产生、数据保存、数据维护、数据出版和共享。

总之,数据策管活动是贯穿了科学数据整个生命周期以及科研生命周期的策管活动,以数据保存、再利用和增值为主要目的。在具体的数据策管实践中,可以参考DCC、ICPSR、JISC等典型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也可以根据科研生命周期或者科研机构的需求和所需服务的学科特点设置适合本机构的数据策管生命周期模型。

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鲍永庆

(四川大学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 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热门话题。在休眠数据的数据重组、资源整合以及再利用过程中, 需要解决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文章从二者利益平衡点以及弹性的知识产权规则角度对大数据时代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与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大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 数据创新; 休眠数据

中图分类号: G250.73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Dormant Dat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dormant data is a hot topic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 the process of reorganization, integration and reuse of dormant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enfor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alance of interest and flexib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on of dormant data as well as some acute problem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Key words big da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ata innovation; dormant data

亟需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1 引言

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两大重要内容。由于国内具有价值的海量数据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医院、科研院校以及其他行业并相互独立, 形成了信息孤岛, 从而产生了暂时搁浅的休眠数据, 这些数据不仅单项价值巨大, 多重数据的整合开发更能发挥出巨大潜能。休眠数据是指已经存在于数据库中、当前并不使用、将来有可能使用的数据, 这种数据随着时间延长而积累蔓延^[1]。也有学者认为休眠数据是指数据价值被特定主体利用殆尽之时, 只是这些数据的某一方面用途的价值被使用, 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没有其他任何价值, 可能由于主体或主体数据需求的改变, 可能由于数据技术的发展, 也可能由于其关联数据的出现, 使其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海量数据或者数据集^[2]。而如何将大量具有潜在价值的休眠数据进行再利用或重组创新, 以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传统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都

2 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

休眠数据的数据创新是将已经存在于各种数据库中的不经常被使用或不被挖掘, 但是具有一定潜在价值的海量数据, 通过重组或整合等方式释放, 从而使数据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2.1 数据再利用

海量休眠数据的潜在价值巨大, 其数据再利用的不同环节和不同阶段都蕴含着重大的商业性价值, 并能促使产品增值以实现新的价值创造^[3]。休眠数据再利用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大数据技术搜索关联数据, 使主体和客体数据之间瞬时交互形成关联列表, 使数据中隐藏的价值得以实现。例如, 京东商城将顾客在网站内的所有浏览轨迹都通过机器人系统自动记录下来, 根据不同的数据特点进行自动分类并分析处理, 按照商品类别形成不同的推荐栏目, 从而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携程网对机票价格与机票预

定时间二者销售数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机票价格的走势。

2.2 数据重组

休眠数据有时需要通过与另一个毫无相干的数据集结合,其价值才能被激活变得有意义,即用一种用户自己特定需要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创新要求混合这些数据——数据重组。例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在2013年对手机辐射是否可增加大脑神经胶质瘤风险进行了研究,其中手机用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其中一部分(2 750人)为例,与此同时,选取胶质瘤患者2 630名作为参照对象,结合两个数据集研究后发现二者并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总之,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两个或多个数据源重组再利用的总和比部分数据更加有价值。当我们将多个独立数据集的总和重组在一起时,重组总和本身的价值比单个数据总和更大。

3 大数据时代中的知识产权

大数据时代,创新主体对休眠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以及重组再利用是通过对数据的抓取、分析与加工等手段得到新的数据集信息。但是这一过程中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原有数据创造者的权利维护(即知识产权)与创新主体有权利的拥有该如何界定和分配,对传统的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而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4]。知识产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其客体是智力成果或者知识产品,是一种无形财产或者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财富,是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成果。

3.1 新特征

传统的知识产权简单来说具有3个特征: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大数据时代又重新赋予了知识产权新的特征:其网络资源相对于传统文字资源有着自己独特的特征。①数字化、网络化,这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基本特征;②信息量大,种类繁多;③信息更新周期短;④资源庞大,开放性强,信息资源不受地域限制,任何联网的计算机都可以上传和下载信息;⑤组织分散,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而黄

立芳提出数据产权这一概念,即数据开发者对合法获得的共有或专有领域的的数据,通过抓取、分析、加工、处理等智力劳动获得的数据或数据集所拥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5],也是对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补充。

3.2 新挑战

海量休眠数据经过数据重组或整合等方式加工处理后成功创造出新的数据集或数据集,即数据创新。这些创新数据既可以作为评价科研机构产出水平的数据,也可以通过在商业领域、银行、商户之间的交易记录和凭证预测消费者消费倾向^[6]。李学龙、龚海刚依据目前大数据分析的主要领域将大数据生成的来源划分为科学数据、商业数据和互联网数据3种类型^[7]。无论是严谨的科学数据、热点的商业数据还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互联网数据,都存在暂时被搁置的具有潜在价值的休眠数据。这些休眠数据经过进一步挖掘、加工、分析与整理需要新的知识产权政策支撑,是否会侵害到原有数据创造者的合法权利,是否对重组的结果给予合理的保护,这些都使得原有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4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与协调

4.1 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分析

数据创新强调利用数据挖掘(包括关联规则学习、聚类分析和分类分析等^[8])与知识发现(是指从数据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最终可理解的模式过程^[9])等大数据技术对具有潜在价值的休眠数据进行重组与整合,而创新的过程就是知识产权的应用和获得过程。数据的二次利用涉及源数据隐私及商业机密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其产权的保护与归属不仅是相关原有主体间的利益分割问题,更是创新主体持续发展和掌握竞争主动的重要支撑,所以知识产权保护与归属是数据创新的关键所在。在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需要投入优势资源和秘密技术等,同时围绕一项产生的知识产权有很多利益主体,所以知识产权对于数据创新主体更多的是约束而不是激励和促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只有数据创新各方面的利益达到均衡保障,创新主体的潜力与优势才能充分发挥,数据创新活动才

能顺利开展。

4.2 营造鼓励数据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环境

如何平衡各创新主体之间新的利益格局以及使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更具弹性,是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所面临的新的要求。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名词:“平衡”与“弹性”。

(1) 平衡。在新的背景下,休眠数据的重新整合以及利用知识产权法对原有数据资源的控制,导致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必须在更广阔的空间内的各种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一方面,海量休眠数据再利用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因为数据的二次利用涉及大量知识产品,而创新主体所生产的本身就是知识产品,如果缺乏法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数字化进程就会遇到障碍;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又可能束缚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带来的利益冲突是数据创新获得的利益是否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应受到保护,保护的范围有多大,与原专利权团体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处理。因为新专利可能会侵害到原专利权人的权利,一旦受到保护之后,原专利权人的权利又该受到何种保护,同时对于重新组合的产品,法律风险已经被规避,但是对原专利权人造成的损失又该如

何处理^[10]。

(2) 弹性。弹性与平衡相辅相成,各种利益需要在更广泛的空间内保持平衡,因此就得充分保持法律法规的弹性。就数据创新主客体而言,弹性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协调创新主客体之间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而协调本身不可能统一,因此妥协就不可避免,而妥协本身也就意味着弹性,只有更具弹性的法律法规才更具有广泛性。过分原则的法律法规会导致规则范围内所追求的目标无法实现^[4]。在大数据时代,弹性这一要求表现得尤为突出,具有恰当弹性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仅可以使知识产权法能够更好地适用各种新技术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又可以使创新主客体之间清晰地理解相关规范。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数据创新越来越受到密切关注,且成了新的利益增长点和竞争力,而休眠数据的二次利用并重新释放它的能量,为创新主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如何平衡数据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点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初步探析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至于如何建立二者冲突与协调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曾建华.挖掘休眠数据提高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性能[J].计算机时代,2005(8):46-47.
- [2] 杜彦峰,相丽玲,李文龙.大数据背景下信息生命周期理论的再思考[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5):25-29.
- [3] 谷岩松,夏义堃.开放数据环境下公共信息再利用的经营模式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7(4):5-12.
- [4] 钟云龙,马聪.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10.
- [5] 黄立芳.大数据时代呼唤数据产权[J].法律博览,2014(12):50-51.
- [6] 高筱培.知识产权政策研究中的大数据方法应用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6:5.
- [7] 李学龙,龚海刚.大数据系统综述[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5(1):1-44.
- [8] 张锋军.大数据技术研究综述[J].通信技术,2014(11):1240-1248.
- [9] 化柏林.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关系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31(4):507-510.
- [10] 黄雷.大数据时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4,30(9):1-3.

作者简介:鲍永庆(1974—),男,硕士,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大数据技术与知识产权法。

收稿日期:2018-03-23

· 知识管理与服务 ·

美国可汗学院数据平台功能与数据分析框架研究及启示

孟冰纹 肖玉敏 唐婷婷 谢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美国可汗学院的数据平台及其框架在提供学习内容和数据分析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文章全面分析了可汗学院的课程和教学理念以及其使用的数据分析框架的特点和价值,认为从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升级视角来看,可以从三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利用更好的数据呈现形式为读者提供更直观的图书馆使用报告;推动图书馆在线课程资源建设;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有效处理海量的数据,获得有效的信息反馈。

关键词: 可汗学院;数据平台功能;数据分析框架;数据应用;高校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3.1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and Enlightenment of Khan Academy's Data Platform Function and Data Analysis Framework to University Library's Data based Service Improvement

Abstract The data platform and framework of Khan Academy, founded by Salman Khan, USA, has created a very successful story in providing learning content and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deas of Khan Academy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the large data analysis framework used by Khan Academ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c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grading services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get inspir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using better data presentation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more intuitive library use reports; boos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online course resources, and using large data analysis tools to deal with massive data and obtain effective information feedback.

Key words khan Academy; data platform function; data analysis framework; data applic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由美国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在2007年创立的一家非营利性质的教育机构,它的愿景是“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一流教育”^[1],满足渴望学习的人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2018年6月12日,从发布世界网站流量排名的公司Alexa官网获得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出,可汗学院的访问量在全球所有网站排名中高居第635位,而世界三大慕课网站Coursera、edX和Udacity的访问量分别为680位、1 027位和1 473位,都低于可汗学院^[2]。访问人数之多,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从高校图书馆对提升大数据应用服务水平的需求来看,可汗学院的数据平台及其框架在提供学习内容和数据分析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1 可汗学院的课程与教学理念

目前,可汗学院拥有150人的团队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开设了3 500多个视频课程,内容系统全面,涵盖了数学、科学与工程、计算、艺术与人文、经济学和金融学,还设置SAT、GMAT等备考科目以及大学入学申请培训等共七大类课程^[3],如图1所示。

这些课程的目的在于给学习者提供符合个人节奏的校内外学习机会。目前,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利用可汗学院学习,它的学习资源被翻译成36种语言,受到不同年龄学习者的喜爱。它利用练习、教学视频以及个人学习仪表盘等为学生提供课内

Math by subject	Math by grade	Science & engineering	Computing	Test prep
Early math	Kindergarten	Physics	Computer programming	SAT
Arithmetic	1st 1%	AP Physics 1	Computer science	LSAT
Pre-algebra	2nd	AP Physics 2	Hour of Code	MCAT
Algebra 1	3rd	Cosmology & astronomy	Computer animation	GMAT
Geometry	4th	Chemistry		IIT JEE
Algebra 2	5th	AP Chemistry	Arts & humanities	NCLEX-RN
Trigonometry	6th	Organic chemistry		
Precalculus	7th	Biology	World history	College, careers, & more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8th	High school biology	US history	
AP Calculus AB	Eureka Math/EngageNY	AP Biology	AP US History	College admissions
AP Calculus BC	High school	Health & medicine	Art history	Careers
Multivariable calculus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rammar	Personal financ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Entrepreneurship
Linear algebra			Economics & finance	
			Micro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Finance & capital markets	

图1 可汗学院的课程（截至2018年6月11日）

外的学习支持,其中数学教学的目标是给学习者提供从幼儿园数数到微积分的学习内容,通过自适应技术发现学生的学习优势和学习差距。

可汗学院的贡献者们相信大脑通过学习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智力水平在持续的思考中可以不断提升,每一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学习能力,在学习中构筑自己的思维模式,成为更好的学习者。正如可汗学院董事局主席Ann Doerr所说:“可汗学院的即时反馈,给予了学生了解自己掌握了什么和没有掌握什么的机会。学生在可汗学院可以尝试、失败、再尝试。学生们可以反复观看视频,逐步找到需要掌握的问题解决线索。过去学生要是不会什么,经常会经历尴尬无助的场面,如今可汗学院减少了这样的可能。”^[1]

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可汗学院为全世界的学习者提供了高质量的课程内容,除了最初的数学课程,它还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加利福尼亚州科学馆(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合作提供更专业的课程内容^[1]。这些整合了其他资源的课程,也为可汗学院带来了大量的可利用数据。

2 可汗学院的基本功能及其数据分析框架

2.1 可汗学院的基本功能

2.1.1 观看视频(watch)

教学视频是可汗学院为学生提供的获取知识的

主要手段,它有以下特点:①均为微视频,时长10分钟左右,质量极高、趣味性强,短平快;②讲师不出镜,避免干扰,有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③电子板书中包含大量图示,犹如现场授课,浅显易懂、循序渐进;④学生可以按自身学习水平对视频操作快进、后退,也可反复播放。

10分钟的视频教学易于消化,降低了认知负荷。学生无需再依赖教师授课,而是看视频自主学习。这样的学习模式是开放与自由的。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顾及多数学生的认知水平,可能为了赶进度,放弃部分落后于班级平均水平水平的学生。在可汗学院,学生通过视频,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学习,能够在任何不懂的地方暂停、重播,不用自卑和尴尬、提防外部负面评价;当然,对于已经理解的内容同样可以快进,提高学习效率。这样的讲课形式更具人性化,更能理解和尊重学生,使学习从恐惧走向了愉悦。

2.1.2 做练习(practice)

(1) 不求及格,唯需精通

看完视频,针对每个知识点都相应提供配套的即时练习。每10分钟一节课,随堂测试,作业量不大,以免对学生造成过重负担。可汗学院推崇精熟教学,一个知识点学通透了,才可以进入下一环节。“精熟教学法”是1919年美国激进教育家卡尔顿·沃什伯恩提出的,原本因为教学成本太高而未被推广,而由于技术的支持,可汗学院的教学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初学生觉得连续答对10题是很苛刻的事,但如果他们做到了并得到奖励,会很有成就感,自信心和自尊心都获得大幅度提升,进而对更难的挑战充满期待^[4]。练习过程中若有疑问,可先点击“提示按钮”。平台会就同一个问题,根据问题的难度给出3~12个不同提示^[5],确保学生能够掌握知识点的精髓,避免了传统教育中存在的一知半解。

为了调动学生好奇心和学习热情,把教育目标与孩子的天性相结合,学习过程采取发放经验值与徽章奖励的模式。学习犹如游戏通关,只有完全学通透了,“十分过关”,才可以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可汗学院的学生统计数据如图2所示,饼图分为外、内两圈,外圈表示做过的知识点练习,内圈表示看过的知识点视频。鼠标移到外圈不同区域,可以看到该知识点的名称、练习耗费的时间、完成了多少道题目、正确率如何、是否精通。

(2) 串联相通的知识地图

在练习界面出现的星空图,实质是建立了一个基于知识点内在联系的知识地图。图3中标识了每个具体的知识点,画出了知识点之间的相关逻辑。知识不应该强制性地分出科目和章节,传统的学科划分局限了学生的思维,教学应该将课程之间纵横打通,帮助学生梳理各知识点间的联系。根据学生的知识点选择,可汗学院会依据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给学生推荐下一步学习的内容^[2]。

2.1.3 提供指导 (coach)

(1) 个人主页

在个人主页,学生可以查看自己的数据统计,了解系统针对每次学习与测试的数据分析后提供的实时评估,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

(2) 指导者

每个学生都可以在个人页面上绑定一名或多名

Vital Statistics

- Activity
- ▾ Focus
 - Shows how well you've focused on exercises and video playlists.
 - Today | Yesterday | Last 7 Days | Last 30 Days
- Exercise Progress
- Exercise Progress Over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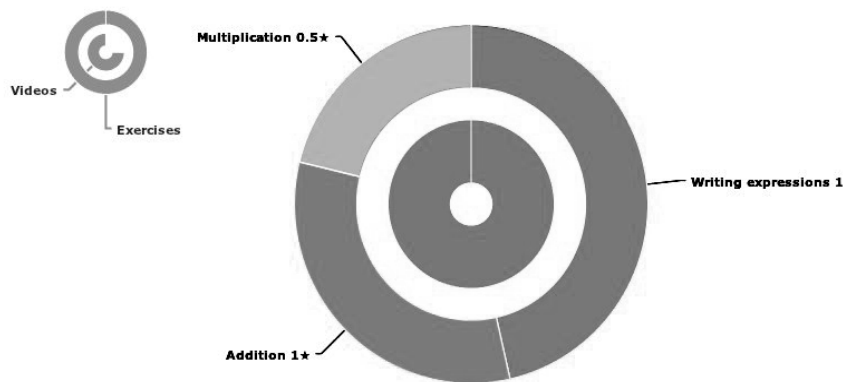


图 2 可汗学院的学生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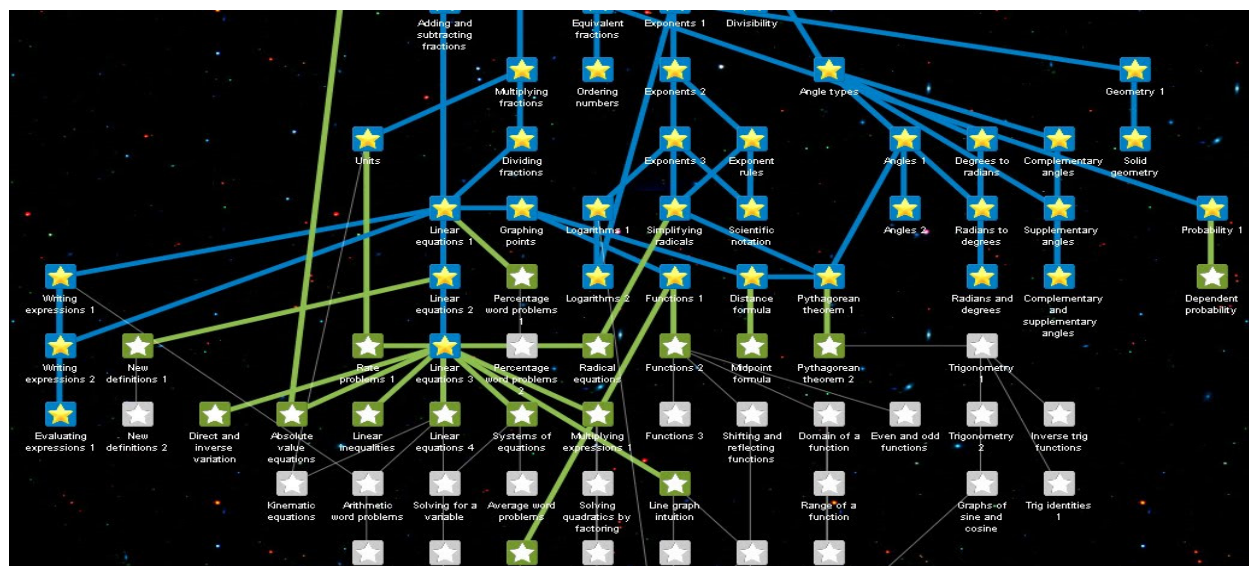


图 3 知识地图

指导者,指导者可以共享学生的学习进度,方便更加及时和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和辅导。

(3) 学习社区

在看完视频后,还可以进入学习社区,向指导者或者其他学习者提问、交流。

(4) 其他数据分析

除了正确率的数据外,平台还会统计学生在每个模块的停留时间、能力培养情况,以及学生的个人目标等。学好了有奖励,学不好可以自查问题所在;指导者会及时对症下药地进行辅导;有疑问可以在交流区进行讨论,互相启迪创新、激发灵感。这种方式可促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更积极、更具有责任心。

2.2 可汗学院的数据分析框架

可汗学院教育平台拥有强大的在线课程,能够让学生观看视频,解决练习或获得徽章。该平台提供了具有可视化功能的高级学习分析模块。每天可汗学院的数据分析师需要收集大约800万运动和视频互动的数据点,以及数百万个关于社区讨论、计算机科学课程和注册的数据。同时还有原始的web请求日志,以及发送给MixPanel的一些客户端事件。从难以理解的原始数据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分析处理,可视化为与技能进步、练习报告或学生活动等有关的报告并反馈于用户,这些数据使指导者与学生由此做出明智的选择,因而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可汗学院,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框架用于从收集的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并分析。

2.2.1 MixPanel

Jace Kohlmeier是可汗学院前数据分析总监,之前则是著名对冲基金Citadel的高管。在可汗学院,Jace Kohlmeier使用Mixpanel的服务来分析数据。MixPanel是移动网络最先进的分析平台之一,让开发者跟踪用户的使用习惯,并提供实时分析。MixPanel的漏斗工具十分强大,主要跟踪关键行为,可从页面访问量数据的局限跳出来,转而以用户行为为驱动。

Mixpanel主要给可汗学院提供了几大关键指标:

(1) 用户动态分析(Trends):你关心的用户行为发生了多少次,占总比例多少。

(2) 行为漏斗模型(Funnels):某些关键行为是怎么发生了,每一步有多少的留存率和流失率。

(3) 用户活跃度(Cohorts):网站用户的活跃度如何,可以用来区分忠实用户和普通用户。

(4) 单用户行为分析(People):单个用户在网站上做了哪些操作,过程是如何的。

漏斗图是对业务流程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漏斗图可以很快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优化,漏斗图又可以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流程的优化效果。

MixPanel比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更好理解和设计。Jace表示,他们研究了其他分析提供商,但发现“类似的功能,例如事件跟踪和漏斗报告,但很难理解,文档很差,并且在可以跟踪的事件的限制方面有一些障碍”^[6]。

2.2.2 MapReduce

MapReduce最早是由Google公司研究提出的一种面向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并行计算模型和方法。Google公司设计MapReduce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其搜索引擎中大规模网页数据的并行化处理。可以把MapReduce理解为,把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按照某种特征归纳起来,然后处理并得到最后的结果。Map面对的是杂乱无章的互不相关的数据,它解析每个数据,从中提取出key和value,也就是提取了数据的特征。经过MapReduce的Shuffle阶段之后,在Reduce阶段看到的都是已经归纳好的数据了,在此基础上可以做进一步的处理以便得到结果。这就回到了最初,终于知道MapReduce为何要这样设计。

Khan academy的数据分析师Matt Faus指出,MapReduce库允许数据分析师在生产服务器上对生产数据执行查询和数据维护。最常用的MapReduce库是在数据存储区中的许多实体上执行模式更改和数据清理。例如,从模型中删除现在未使用的属性,授予基于时间的成就徽章,或者基于最终一致的问题日志重新计算锻炼进度。

另一个常见用途是计算聚合数据,以确定学生完成练习的平均时间。MapReduce图书馆功能强大,但可能难以按需要正确地工作^[7]。

2.2.3 Hive

目前,可汗学院最成熟的系统是在Amazon EMR上运行Hive。Matt Faus和同伴们创建了几个在App Engine中直接运行的Google MapReduce和Pipeline框架的工作。快速实现简单的MapReduce统计,不必开发专门的MapReduce应用,十分适合数据仓库的统计分析。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将备份导出到Google Cloud

Storage, Google BigQuery可以以疯狂的速度消耗和运行查询。

将数据从生产数据存储区移动到Hive中,使之能够使用强大的HiveQL功能(如UNION,子查询,最重要的是JOIN)来迭代查询。有了这些,就可以回答“根据学生的活动,哪些指导者在过去一年中最活跃”的问题。分析师还使用这个系统来训练Khan academy的机器学习模型,以了解学生的知识状态,并推荐最有可能帮助他们改进的内容。这个设置需要几个转换的数据转换成一种Hive可以理解的格式。现在提供的数据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可访问性,可以启动一个Hive实例做一些重型查询,或REST调用下载一个紧凑的总结。Hive并不提供实时的查询和基于行级的数据更新操作。Hive的最佳使用场合是大数据集的批处理作业,如网络日志分析。

Matt Faus提到使用Hive和GCS进行数据仓库和巨型查询,无需输出原始的实时信息。Hive系统自创建以来一直运行良好,但现在Google技术正在提升,所以未来的数据分析工作将会更加轻松快捷^[7]。

2.2.4 谷歌 BigQuery 云存储

BigQuery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是Google专门面向数据分析需求设计的一种全面托管的PB级低成本企业数据仓库。Google Cloud Storage和BigQuery管道在概念上非常类似于EMR和Hive管道,但是更容易设置。BigQuery是Google推出的一款SaaS查询产品,其发展势头似乎越来越好。它允许查询云中的大型柱状数据结构。开发人员可以通过上传到Google云存储(相当于Amazon的S3)或者以流数据的方式把数据加载到BigQuery中,然后使用类似SQL的查询语言执行OLAP风格的查询。

它能提供许多强大的声明,但缺乏添加自定义地图或减少项目的功能,这在Hive中已经完成。可汗学院的数据分析师对这些新技术产生了兴趣,认为它设置和检索查询结果的速度非常好,将来会更广泛地使用它^[7]。

2.2.5 ALAS-KA

ALAS-KA被设计为可汗学院平台的新型辅助型插件。这种架构可以让指导者处理大量的教育低级数据(以事件的形式),并获得能以可视化和建议的形式呈现的更高级别的学习信息。

相比其他视觉分析工作通常集中在直接指标

(例如访问次数、帖子数量和正确的练习次数)上,ALAS-KA可显示更复杂过程的信息,与学习相关的信息包括如主观意图明显的用户,他们的想法和情感取向,可作为分析时的补充。

以对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UC3M)本科课程(物理、化学和数学)的300多名新生研究为例,研究者发现ALAS-KA模块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学生的情感状态与学习风格,并可视化。例如图4,使用ALAS-KA开发和实施的算法,设置纵坐标情绪饱满阈值为1.0,可以推断出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幸福感、无聊感、混乱感和沮丧感。之后对这些测量进行汇总,可显示整个教室的每个状态。在这个例子中,与学习收益正相关的情感状态是灰色的,而黑色状态已被证明与学习成果呈负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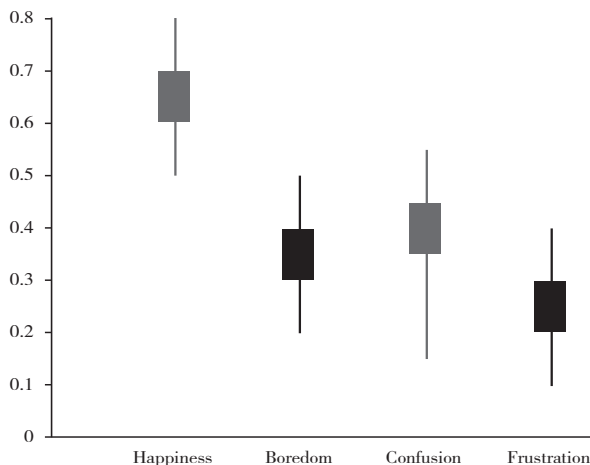


图4 学生情感状态

ALAS-KA模块是支持可汗学院学习分析的重要附件,它提供的信息能够帮助可汗学院关注到原先非设定的重要信息,如这里提到的情感、学习风格等,不单是效率、行为,老师们将有更多机会通过直观的图表了解学习的全貌,有益于教师基于学生的数据做出更符合学情的决策,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8]。

3 启示

3.1 利用更好的数据呈现形式为读者提供更直观的图书馆使用报告

从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转型以实现服务升级的视角来看,当前高校图书馆除了提供学习空间、书刊借阅之外,还提供了大量电子数据库资源和开设一些资源利用的讲座,满足师生在资源利用方面的个

性化需求。因此,高校师生的图书馆生活不仅仅限于流通阅览,除了实体书外,他们还会在图书馆的网页上浏览和使用数字化资源,参与图书馆的讲座,目前这部分数据在学校提供的个人图书馆信息中没有反映。如果高校图书馆能够像可汗学院一样,建立读者图书馆利用仪表盘,就可以帮助读者整合自己的图书馆利用现状,分析自己的资源利用类型。一方面可以为读者提供诸如精准推送这样的个性化服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为读者基于准确了解自己的阅读现状、反思阅读习惯、选择阅读方向提供支持。比方说,某位读者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已经通过学校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除了下载的之外,还有很多可能已经浏览过。目前,读者想知道自己是否看过,需要去回看浏览历史,它是完全线性的、独立的一篇文章。而仪表盘的设计往往具有聚类分析的功能,通过浏览停顿时间、文章关键词分类等符合数据采集需要的模块化数据统计,让读者直观看到自己在图书馆都看了什么,下载了什么,所查看的资源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哪些是关注的重点,哪些资源还关注得不够,等等。因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对研究领域的文献掌握了多少是衡量其对一个领域熟悉程度的重要指标。

对图书馆而言,读者利用仪表盘也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读者的喜好、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何胜等人认为“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探讨了图书馆大数据应用面临的问题,明确关注服务创新,提出应对策略,但是多数偏重于概述方法和概念解析,在如何解决高校图书馆服务面临的学科知识服务和个性化服务问题上,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技术视角的应对方案”^[9]。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数据开放和知识共享的大趋势下,图书馆需要依据用户需求,通过知识搜索、组织、分析、重组等方式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以支持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9]。而读者图书馆利用仪表盘的应用,将有助于直接了解读者的学科知识服务需求,成为为读者提供精准服务的重要依据。

3.2 推动图书馆在线课程资源建设

可汗学院提供的各类课程服务,主要是基于学科知识点建立起了串联相通的知识地图。目前,高校图书馆也普遍提供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利用课程或系列讲座,这些课程或讲座有些已经能在线观看,课件往往也能下载,极大地方便了师生的学习和研究。然

而,普遍的问题在于这些课程都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未被设计成能够互动交流的在线课程,因此不能随时搜集到关于读者使用这些课程的信息,同时,读者在这些课程的收获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以及这些课程本身有哪些改进之处往往很难得到及时的回应。可汗学院的数据平台是建立在它提供了大量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学生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通过做练习、互动交流等在线学习行为,留下了他们对知识掌握程度、相应速度、互动交流状况等相关的数据以及对知识内容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反馈数据,实现了数据流通和分析的双回路有效信息沟通,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使双方都获得了提升所需要依据的信息。

如果图书馆的课程,特别是有关个人知识管理、文献整理工具、在线数据库有效利用等学习内容被设计成类似可汗学院这样可以通过完成挑战性学习任务来学习的课程,将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和读者的黏度,有助于提高这些课程被使用的频度、灵活性和有效性,使图书馆课程真正成为支持读者学习的助手,而学习者在课程学习时留下的痕迹以及反馈数据将帮助图书馆更好地提升课程水平,读者学习数据和图书馆提供的课程内容数据也因此被打通。图书馆也将成为支持读者不断成长的重要平台。

3.3 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有效处理海量的数据,获得有效的信息反馈

每天有大量的学习者访问可汗学院,高校图书馆在这方面也不逊色。目前各个高校图书馆都在关注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也非常重视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研究。

魏来、张伊认为智慧图书馆的资源管理,不仅要充分利用资源,还需要对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探究数据层面间的关联智慧图书馆业务数据的管理,不仅可以优化图书馆的业务流程,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而且能够对图书馆的发展决策和战略规划提供支持”^[10];何胜等人指出“伴随着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图书馆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大数据的特征,这些数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只有及时加以分析,其价值才能得到有效利用发挥”^[9];包冬梅等人认为“图书馆数据的统计分析,直接关系到高校图书馆的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应加强统计分析与挖掘,致力于推动信息资源体系的优化、知识发现服务的完善、学术评价体系的创新,以

及为高校教学科研和战略决策提供权威、高质量依据;另一方面,应建立可实行的、可测量的统计与评估指标体系,开发高校图书馆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及工具(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促成顺畅、持续的统计报告制度”^[11]。可见,对图书馆资源的深度挖掘,体现数据的价值,形成定期的图书馆统计报告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图书馆的重要任务。

目前,关于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有其特定的工具,如“OCLC对馆藏资源的网格化分类、W3C图书馆关联数据孵化小组从信息处理和组织角度对图书馆数据的狭义界定、中国国家图书馆对图书馆数据的划分与归总”^[11]，“基于WorldCat数据库和基于HPC—ABDS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Apache Big Data Stack)的图书馆大数据应用框架”^[9]等。我们从理解读者数据平台使用习惯、使用结果,掌握使用动向的视角来看,可汗学院目前使用的几类大数据分析框架,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如可以通过MixPanel及相应的升级平台能够实现对读者的动态分析,了解他们使用图书馆各类资源行文、频率、活跃程度等;通过类似MapReduce的技术把不同读者在应用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杂乱无章的数据,按照相应特征归纳

清洗,然后处理并得到最后可以说明问题的结果;通过Hive解决数据处理和计算问题,快速了解用户的知识状态,并推荐最有可能适合他们学习和研究需要的内容;通过谷歌BigQuery云存储来进行大数据存储与分析;通过ALAS—KA这样的插件理解读者的情感需求和体验,等等。当然这些数据平台和工具并非与图书馆的大数据存储、应用和分析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它们的数据处理、分析和应用的方式能够提供一定的思考视角,帮助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的过程中高效地获取整合的以及个性化的读者信息,洞悉学习和科研的现状和问题,为基于数据的高效决策奠定基础。

4 结语

可汗学院作为学习内容的供应者,通过其数据分析为学习者提供了全面的学习诊断和学习指导。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升级和创新,同样离不开对其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也离不开所有读者的积极参与,可汗学院的教学、运营和数据应用模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You Can Learn Anything[EB/OL].[2018-06-14].<https://www.khanacademy.org/youcanlearnanything>.
- [2] Website Traffic, Statistics, and Analytics[EB/OL].[2018-06-14].<https://www.alexa.com/siteinfo>.
- [3] Khan Academy[EB/OL].[2018-06-14].<https://www.khanacademy.org/>.
- [4] 可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 互联时代的教育革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0-25,101-102
- [5] 赵瑞.可汗学院课程学习经历带来的思考[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5):41-45.
- [6] Mixpanel[EB/OL].[2017-09-22].<https://mixpanel.com/case-study/khanacademy/>.
- [7] Big Data at Khan Academy[EB/OL].[2017-09-22].<http://mattfaus.com/2013/10/big-data-at-khan-academy/>.
- [8] OSÉ A. Ruipérez-Valiente P J M D. ALAS-KA: A Learning Analytics Extens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Khan Academy Platform[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6):139-148.
- [9] 何胜,熊太纯,周冰,等.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服务现实困境与应用模式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5(22):50-55.
- [10] 魏来,张伊.基于数据管理的智慧图书馆功能框架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4):2-7.
- [11] 包冬梅,范颖捷,李鸣.高校图书馆数据治理及其框架[J].图书情报工作,2015(18):134-141.

作者简介: 孟冰纹(1978—),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肖玉敏(1968—),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教育大数据等;唐婷婷(1988—),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教育信息技术等;谢蓉(1974—),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开放教育等。

收稿日期: 2018-07-03

基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调查与分析^{*}

龚花萍 余建兵 胡 媛

(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 在高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进展,旨在为“双一流”高校建设提供信息资源支撑。通过访问13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主页和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调查目前“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整体开展的现状,分析归纳其延伸服务的情况及特点。从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提出进一步优化延伸服务的对策。

关键词: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Universities Library Extension Services Based on Double First-rate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world-class disciplin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gress of extension service of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ies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fter visiting homepages of 137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doing a lot of literature researches, the author does a thorough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xtension services offered by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feature of the extension services. This paper provides sever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extension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ng concept, content and mode.

Key words Double First-rate university; library; extension service

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相关理念的提出和影响力度下,国内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已经开始迈开步伐。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1],在“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背景下,图书馆作为高校科研、教学的重要信息基地,应该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的功能,提升延伸服务理念,扩大

延伸服务内容,优化延伸服务方式,使其在建设“双一流”高校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图书馆延伸服务最早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之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特殊读者的关注,并注重实践性。W.J.Martin^[2]认为延伸服务就是馆员走出图书馆到社区的服务。伴随着现代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有了新的定义。S.E.Poninton^[3]认为延伸服务是以图书馆建筑物为圆,在圆之外开展的图书馆服务以及相关的活动都是延伸服务。Doherty B等^[4]认为延伸服务是当代图书馆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

^{*} 本文系2016年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图书馆社区知识聚合与推送服务研究”(项目编号:20161BAB211008)的成果之一。

发展,依据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为读者提供的新模式、新机制和新领域的个性化服务。刘瑞香^[5]研究图书馆延伸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入馆培训、信息检索课程教学、数据库使用培训、读书服务、信息推送、信息开发等。基于以上学者对延伸服务的定义,笔者认为图书馆延伸服务是图书馆在信息服务、空间服务以及教育服务等方面的延伸服务。因此,对目前的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的创新,是延伸服务的意义所在。

目前,在图书馆延伸服务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如徐健晖^[6]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针对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提出决策支持、科研支撑、知识情报服务、信息素养教育细化、特色学科文献建设为主的新型创新服务模式。蒋艳柏^[7]从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技术手段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当前利用RSS技术的信息推送服务、Blog技术的学科博客服务的创新服务方式。刘安定^[8]从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平台、服务内容四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服务对象方面根据高校的服务主体开展科研情报服务。根据服务方式构建信息共享空间的延伸服务。根据服务平台的发展趋势,建设学科服务平台,以及高校图书馆网络服务平台实现移动化。从服务内容细化服务对象,针对教师开展科技查新、查收查引、定题服务、专题情报检索等服务;针对学生开展新生专栏、讲座与培训、信息检索课程及数据培训等服务。Hardin医学图书馆^[9]以IC为用户科研与自主学习的场所、用户进行学术交流乐园的服务理念,将IC定位为用户科研与学习的桥梁。朱静^[10]从服务理念、服务领域、信息素养等方面对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延伸方式进行分析。包祖军等^[11]通过对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探索,提出构建学科服务平台来延伸图书馆的服务。刘政^[12]探索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延伸服务中学科馆员的服务,包含信息联络、参考咨询、馆藏资源建设、教育与培训等内容。以上学者大多是以某一视角对图书馆开展的延伸服务进行研究,未对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本文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视角,选取信息延伸服务(学科服务与科研情报服务)、空间延伸服务(IC的构建与服务项目)、教育延伸服务(信息素养教育的方式与内容)为调查内容,进行调查分析。

本文选取“双一流”院校为调查对象。“双一流”

建设高校教育部公布名单中一共有137所,总体来说,“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在国内相对比较先进,服务能力、服务方式和服务范围相对走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前列,象征着我国高等院校的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总体发展趋势,对“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调查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对13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进行访问,发现有20所图书馆网站因网站建设、校外网络限制、服务不稳定等原因无法访问,如中山大学图书馆(服务不稳定无法正常访问)、外交学院图书馆(网站建设)等。因此,本文对11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站进行了逐一访问,从资源、服务、图书馆简介、图书馆通讯等栏目中查找图书馆延伸服务内容,并结合相关的文献和调查的方式,系统地对117所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情况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分析归纳和统计分析。查阅的内容聚焦在信息延伸服务、空间延伸服务、教育延伸服务三方面。调查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

2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现状调查

在网站可以访问的117所高校图书馆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有41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图书馆有76所,如表1所示。

表1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可访问情况统计

类型	可以访问的高校图书馆数量/所	高校图书馆数量/所	比例/%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41	42	98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76	95	80

由表1数据可知,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总体建设还不够完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图书馆开通校外服务的比例仅为80%,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开展校外服务的比例达到98%,这与学校充裕的经费保障有关,也和图书馆的技术优势、服务理念以及重视程度有直接关系。

2.1 信息延伸服务调查分析

信息延伸服务是指基于图书馆的资源,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基于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有科研服务、基础型服务、个性化信息需求服务等。基于高校图书馆在“双一流”高校建设中的作用,调查的信息延伸服务内容为科研服务,包含学科服务和科

研情报服务。

2.1.1 学科服务调查分析

117所网页可以访问的高校图书馆中,在服务项目中明确提供学科服务的有57所。因此,笔者以57所提供学科服务的高校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从学科服务的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平台来探讨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发展现状。

(1) 学科服务内容

通过对11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主页访问和文献的综合,归纳总结出学科服务的内容主要有学科资源建设、信息推送、情报服务、学科服务平台、图书馆宣传。“双一流”高校中57所高校图书馆提供的学科服务中,服务内容的数量占比如表2所示。

表2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学科资源建设	信息推送	情报服务	学科服务平台	图书馆宣传
数量/所	49	34	38	32	31
占比/%	85.96	59.65	66.67	56.14	54.39

从“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覆盖面来看,学科服务内容完善的有15所,占26.32%,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提供了以上的所有服务,服务内容得到了完全的整合。

(2) 学科服务模式

通过对57所提供学科服务的高校图书馆进行访问调查发现,目前的学科服务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学科馆员独立式与学科馆员-图书馆教师顾问协作式(见表3)。学科馆员独立式是指由学科馆员或学科服务团队来为相关院系提供学科服务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45所高校的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为学科馆员独立式,占78.95%。学科馆员-图书馆教师顾问协作式是指在院系聘请教师负责与图书馆联系,协助图书馆资源建设,收集教师对图书馆资源建设、服务内容的意见和要求。这种模式能发挥院系教师在相关学科上的专业性,弥补学科馆员专业性的不足,需大力发展该创新服务模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加完善的信息服务。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6所高校的图书馆采取学科馆员-图书馆教师顾问协作式服务模式。57所高校图书馆中还有6所高校图书馆没有

明确的服务模式,如长安大学图书馆、宁夏大学图书馆等。

表3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	学科馆员独立式	学科馆员-图书馆教师顾问协作式	服务模式不明确
数量/所	45	6	6
占比/%	78.95	10.53	10.52

(3) 学科服务平台

调查发现,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主要有学科博客、Lib Guides学科服务平台、高校自建学科服务主页3种,还有高校既使用Lib Guides学科服务平台,又使用自建学科服务主页。Lib Guides学科服务平台是一个“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系统”,现在已经是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的主要形式。高校自建学科服务主页是指高校图书馆自己搭建的单独学科的交流平台,使用此服务平台的高校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主要是一流建设的重点大学。学科博客是指学科馆员采用当前的新媒体技术,进行学科服务的平台,是当前比较容易宣传、使用广泛的服务平台,在学科服务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提供学科服务的57所高校图书馆中,只有37所高校图书馆建设了学科服务平台。基于Lib Guides学科服务平台的高校图书馆占59.46%。提供Lib Guides+高校自建学科服务平台两种服务平台的仅为13.51%(见表4)。基于以上数据分析,“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平台建设总体结果不甚理想。在未来的学科服务中,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是关键性支撑。

表4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类型

平台类型	学科博客(新媒体)	Lib Guides学科服务平台	高校自建学科服务主页	Lib Guides+高校自建学科服务平台
数量/所	5	22	7	5
占比/%	13.51	59.46	18.91	13.51

2.1.2 科研情报服务调查分析

通过对“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主页的访问与文献的综合,发现科研情报服务包括科技查新、查收查引、代查代检、情报分析服务等。在科研情报服务中,科技查新、查收查引等得到广泛开展,其中开展科技查新相关服务的高校图书馆有91所,占77.78%,开展查收查引服务的高校图书馆有68所,占58.12%,说明基础性的科研服务在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中

开展比较成功。而专题情报检索服务仅有13所高校图书馆开展,占11.11%,说明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提供的深层次科研情报服务较为不足。调查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总体来说,科研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不高,且面向社会开展科研情报服务的高校图书馆较少。在未来的图书馆建设中,科研服务需大力拓展。

表5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科研情报服务内容调查

科研情报服务内容	科技查新	代查代检	查收查引	定题服务	专题情报检索
数量/所	91	21	68	19	13
占比/%	77.78	17.95	58.12	16.24	11.11

2.2 空间延伸服务调查分析

空间延伸服务是指以图书馆物理建筑为中心,馆内与馆外空间上的延伸服务,如社会化服务(馆外)、信息共享空间的建设(馆内)等。本文调查的主要内容是馆内延伸服务——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简称IC)。

2.2.1 IC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通过对11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页进行访问,一共有16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IC,有12所高校图书馆网站显示拥有IC硬件设施但未进行整合,无法提供IC的服务,其余的高校图书馆网页均未显示拥有IC或IC的服务,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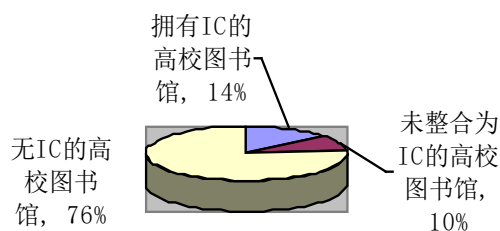


图1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IC 使用情况统计图

由上述调查可以看出,24%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已经拥有IC或具备拥有IC的潜力,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始尝试IC的实践。因此,笔者以16所拥有IC的高校图书馆作为深入调查对象,从IC的服务项目构成要素来探讨国内高校图书馆IC的发展现状。

2.2.2 IC服务项目构成要素调查分析

建设完善的IC应该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电子资源阅览服务、研讨学习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等。通过对16所具有IC服务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网页进行访问可知,研讨学习基本上每所高校图书馆IC提供的基本

服务,在IC开展学科服务和信息素养服务的仅有2所,仅占提供IC服务高校图书馆的12.50%(见表6)。同时提供以上服务的只有浙江大学图书馆IC,实现了图书馆服务项目的有效整合。从IC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来看,研讨学习与电子资源的使用占据了最高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3.75%和75.00%。其余的服务项目比例均低于40%,说明这部分高校图书馆在建设IC时未对硬件设施与服务内容进行整合,缺乏对信息资源、空间资源和人力资源充分整合的IC服务。

表6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IC 服务项目构成要素表

IC服务项目构成要素	参考咨询	纸质文献阅览	电子资源阅览	研讨学习	休闲服务	学科服务	信息素养服务
数量/所	7	5	12	15	6	2	2
占比/%	43.75	31.25	75.00	93.75	37.50	12.50	12.50

2.3 教育延伸服务调查分析

教育延伸服务主要是指信息素养教育服务。高校图书馆为使图书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开展的培训、讲座等延伸服务(如新生专栏)。

2.3.1 信息素养教育服务方式调查分析

在所调查的11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笔者发现其图书馆的网站都包括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但这些内容的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有些高校图书馆是将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放入“读者服务与培训”专栏,有些高校图书馆将信息素养教育放入了“教学与培训”,而有些高校图书馆网站将信息素养教育板块放置在了主页的醒目位置。“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开展方式统计如表7所示。

表7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开展方式统计

信息素养教育开展方式	新生入馆教育	课程			培训与讲座		网络课程		自我评测
		统一课程	区分本科生、研究生	区分不同专业	定期培训	预约培训	数据商	MOOC	
数量/所	107	61	27	9	80	37	31	6	5
占比/%	91.45	52.14	23.08	7.69	68.38	31.62	26.50	5.13	4.27

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新生入馆教育,开展新生专栏服务的图书馆高达91.45%。根据调查发现,信息素养教育的课程开设分为统一课程,区分本科生、研究生,区分不同专业3种方式,开设统一课程的高校图书馆占52.14%,区分本科生、研究生的占23.08%,区分不同专业的仅占7.69%。在信息素养的培训与讲座中,主要是定期的培训与由学生根据自己

的爱好选择参加的预约培训。预约培训是根据每个学院甚至年级的不同进行预约的培训服务,如参加信息检索大赛的同学,图书馆会根据特定的学生开展培训。网络课程中主要分为数据商与MOOC学习方式,根据调查发现,在用户培训网页中加入了数据商的网站培训服务链接的高校图书馆占26.50%,将MOOC资源整合进信息素养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占5.13%。在这些使用网络资源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高校图书馆中,开展自我测评的高校图书馆有5所,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用户可以在自测平台中测试自己对本校图书馆的了解程度、对信息资源获取能力的大小、主流数据库的使用方法等,能够有效地帮助用户评估自身的素养。

2.3.2 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内容调查分析

信息素养教育服务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检索技能培训、数据库使用方法培训、信息质量的评价、信息法律与道德教育、常用软件的使用、论文写作培训等。调查发现,117所高校图书馆全部开展了信息检索技能的培训。开展数据库的使用与常用软件的培训服务的高校图书馆高达60%以上,说明“双一流”高校图书馆都比较重视学生基本信息素养的培训。此外,开展信息法律道德教育的有27所,占23.08%,说明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将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向用户传授如何使用工具、如何搜索信息资源等,忽视了信息法律与道德方面知识的培训。信息法律与道德教育是告诉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信息价值观,在信息利用过程中,如何避免知识产权侵权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在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建设中,信息素养教育中开展信息道德与法律的教育不可或缺。开展论文写作培训的有42所,占35.90%。而针对信息质量评价的只有7所,占5.98%,说明高校图书馆的培训服务深度不够,有待提高(见表8)。

表8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内容分析

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内容	信息检索技能培训	数据库使用方法培训	信息质量的评价	信息法律与道德教育	常用软件的使用	论文写作培训
数量/所	117	99	7	27	72	42
占比/%	100.00	84.61	5.98	23.08	61.53	35.90

3 优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对策

3.1 优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理念

3.1.1 加强主动服务理念

在提供学科服务的57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图书馆员进行图书馆宣传、信息推送的高校图书馆仅有34所,占59.65%,说明高校图书馆主动服务理念不强。为了满足高校科研工作者对信息的需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主动服务意识,走进院系、走进课堂,主动开展高质量的延伸服务。

3.1.2 加强个性化服务理念

情报服务及学科服务平台是依据信息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信息服务的体现,在调查的“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情报服务和学科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的仅有38所高校图书馆,占比为66.67%。高校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和科研工作者,高校图书馆应该根据本校的学科特色、自身的优势资源,根据信息需求主体的不同提供更加完善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3.2 优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内容

3.2.1 深化延伸服务内容

高校图书馆必须从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两方面开展全面深层次的服务内容。第一,针对原有的服务进一步深化服务,如学科服务、科研情报服务等。第二,拓展新型的深层次服务内容,如开展校园舆情信息服务^[13]、Gartner高管服务^[14]等。在深层次的学科服务方面,应该加强情报服务与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

3.2.2 加强服务内容的整合力度

IC建设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新方向。高校图书馆IC建设中,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本着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宗旨,简化知识流通的程序,提供更加迅捷的资源。将馆内资源融入IC,为高校图书馆资源延伸服务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高校图书馆在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服务的同时,不能只是一味满足用户技能的需求,也要增加信息道德与法律的教育力度,使得IC整合更多的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促使用户自觉遵守信息法律和道德,合法地使用现有资源及服务。

3.2.3 增加个性化服务内容

高校的主体主要是教师、学生、科研工作者,这些主体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在高校图书馆建设中,

应注重用户的个性化差异,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应针对用户的年级以及专业的不同特点结合用户对于信息资源与科研的不同需求提供有侧重点、针对性的信息素养讲座与课程。在学科服务方面,可以积极开展嵌入式学科馆员服务,关注不同学科用户对于科研的个性化需求,为学科服务助力。

3.3 优化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方式

3.3.1 完善网络平台建设

从数据来看,双一流高校的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不完善。需要从数量上增加学科服务平台涵盖的学科范围,质量上重视网站的维护,内容上确保学科前沿动态的及时更新,建设嵌入检索功能,实现一站式资源检索与获取,为用户提供更加完善的学科服务。

3.3.2 丰富学科馆员服务方式

目前学科馆员独立式服务方式在我国高校图书

馆中占主流,采用学科馆员-图书馆教师顾问协作式的高校图书馆仅有6所。院系教师更加熟悉本院师生所做的研究方向,更有利于学院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学科馆员应主动同学院教师进行沟通,了解本院的学科发展以及科研需求,及时反馈教师图书馆员与学科馆员意见,为图书馆的发展建言。

4 结语

随着“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加速,“双一流”高校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图书馆除了要满足本校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外,还应该发挥自身文献中心、数据基地、创新空间的优势,不断转变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方式,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拓展自己的服务领域,为“双一流”高校建设提供信息资源支撑。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2017-11-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5/content_10269.htm.
- [2] MARTIN W J.Reaching Out to the Disadvantaged[J].New Library World,1973,74(6):126-127.
- [3] PONINTON S E.Library Outreach is the Future[J].Public libraries,2009,48(2):5-24.
- [4] DOHERTY B,PIPER A.Creating a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 a Small Academic Library:The Merging of Technical Services and Access Services[J].Technical Services Quarterly,2015,32(2):160-172.
- [5] 刘瑞香.图书馆延伸服务馆员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报,2014(5):93-94.
- [6] 徐健晖.“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创新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2):55-58.
- [7] 蒋艳柏.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技术手段及其对策[J].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3(2):187-190.
- [8] 刘安定.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模式的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17(7):20-24.
- [9] Hardin Library for the Health Science[EB/OL].[2018-05-16].<http://www.lib.uiowa.edu/hardin/>.
- [10] 朱静.试论高校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延伸[J].知识经济,2009(1):141-144.
- [11] 包祖军,蔡小红,崔倩,等.高职院校图书馆多元化延伸服务探索与实践:以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32(1):119-122.
- [12] 刘政.美国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实践及其启示: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16(23):97-100.
- [13] 李灿元.开展校园舆情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延伸服务的新亮点[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1):93-95.
- [14] Gartner高管项目服务说明[EB/OL].[2018-05-16].<http://www.lib.pku.edu.cn/portal/en/fw/gartner>.

作者简介: 龚花萍(1964—),女,南昌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余建兵(1993—),男,南昌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信息管理;胡媛(1989—),女,南昌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知识信息服务、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18-06-29

厦门市图书馆飞鸽传书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黄海燕 林少杰

(厦门市图书馆 福建厦门 361012)

摘要: 文章以厦门市图书馆飞鸽传书服务为例, 探讨网约书服务的机制设计及实现方法。从业务流程、网借库管理、物流管理方面入手, 结合厦门市图书馆流通规则和运营特点, 以提升读者体验为目的, 创新性提出鸽眼、沙漏借书架、押金与逾期栅栏设计, 全面分析与总结厦门市图书馆进行O2O线上线下业务融合的经验, 并进行图书馆“在线化”的“新闭架”尝试, 以探索图书馆在互联网思维指引下推广全民阅读的新模式。

关键词: 网约书; 互联网+图书馆; 飞鸽传书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3 **文献标识码:** A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IP Messenger Services in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

Abstract IP Messenger is a library book delivery service provided by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 which i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to describe the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online book borrowing service. Taking aspects like business process, network library management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as well as circulation rules and operation features of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ervice aim to improve user experience. The library creatively presents designs like Pigeon Eye, Hourglass Book Borrowing Shelves, cash pledge and over due warning. The author makes a thorough research and conclusion on Xiamen Municipal library's practice on converging O2O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s, and its attempt to do online new shelving closed service, so as to exploring a new pattern for libraries to do reading extens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Key words online book borrowing; Internet + library; IP Messenger

1 引言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移动支付技术的成熟和用户网络消费习惯的培育, 以及网购、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线上线下融合服务的如火如荼, 图书馆开展O2O纸书网借服务已经拥有较好的时代背景。网约书服务实际上是一项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城市物流资源的图书馆创新性“在线”服务。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博士在《在线——数据改变商业本质, 计算重塑经济未来》一书提及, 在线是连接的属性, 只有在线才能让数据产生最大化的经济价值、社会竞争力和影响力。移动互联网是比传统互

联网在线程度更深的互联网, 它的渗透性更强, 每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在线。移动互联网时代, 任何行业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在线”方式, 这就是“互联网+”的概念, 否则就无法降低被淘汰的概率。图书馆始终坚持在线化的尝试, 以数字阅读为代表的数字图书馆就是图书馆的在线化路径尝试, 网约书则是图书馆为传统纸质阅读提供在线化服务的另一种尝试。

目前, 网约书服务从能力、市场到案例均有较为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国内一些公共图书馆对网借服务展开积极尝试, 并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例如, 苏州图书馆在2014年9月推出“网上借阅、社区投递”服务, 读者通过电脑或手机访问其网上借阅平台, 可网借苏州图书馆160万册藏量的图书, 范围涵盖整个总分馆体

系内的流通文献。图书馆找到书后,通过物流把图书送到读者指定的社区分馆或“网借投递”服务点的智能书箱,同时发出短信通知,读者凭证刷卡取书^[1]。杭州图书馆在2016年11月底开展网上借书服务——“悦借”,借助互联网与物联网的技术打造线上线下借阅平台,读者在线选书、下单、支付,可借阅图书馆的热门书、畅销书和新华书店的最新图书(约占网借中心书库图书的90%),由EMS送书上门,3本以下运费为3元,3本以上每增加1本,增加1元运送费用,每单借阅上限为5本^[2]。

2 飞鸽传书服务设计与实现

飞鸽传书服务是厦门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厦图”)于2017年7月1日推出的送书上门服务。飞鸽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完成读者与“馆藏地”的解耦,将读者与纸质阅读的连接从线下迁移到线上,完成连接的切换,使图书馆的服务可以脱离馆藏地而发挥作用。

2.1 业务流程设计

飞鸽传书服务包括借书、找书、送书、还书、补书和异常处理6项流程。

(1)借书流程。由读者发起,通过微信公众号菜单或APP等移动端入口进入飞鸽首页,在线选择图书加入借书架,当读者使用微信完成运费支付,系统生成订单后,读者选中的图书从“在馆状态”变为“预借状态”。

(2)找书流程。馆员登录飞鸽系统,导出找书单,根据层架信息到网借库找书、分拣并打包。打包后的图书正式借到读者证下,图书状态由“预借”变更为“借出”。

(3)送书流程。馆员与厦门EMS速递公司交接图书,送书到读者指定地点。

(4)还书流程。读者可到全市联网的公共图书馆及其分馆、流通点和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归还图书。

(5)补书流程。馆员每周五下午定时补充网借库图书,对超过3个月未被借出的图书进行下架轮换。

(6)异常处理流程。开通异常处理服务电话,当出现读者拒收、缺书等异常情况时,由馆员查明原因并处理。

2.2 网借库管理

公共图书馆馆藏管理模式从闭架走向开架以后,为读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但是图书实际在架情况与检索系统存在偏差,乱架现象增多,读者找不到图书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将图书馆开架流通库全部纳入飞鸽传书的选书范围,可能出现读者选书成功并支付运费,馆员却找不到图书的情况,损害了用户体验和满意度。因此,飞鸽传书采用闭架式网借库(鸽巢)管理,独立开辟一个满架容量约3万册的网借库,与全开架流通库物理分离,专为飞鸽传书提供服务。网借库具有以下5个特点。

(1)闭架管理。图书不采用分类法排架,而是利用基于层架管理的信息系统支撑,每一本书由飞鸽系统的书库模块完成定位,严格出入库流程管理,从机制上保证飞鸽传书服务“可见即可得”。读者通过飞鸽下单的图书,理论上100%可以找到,并在最短时间完成投递(最迟隔天即可交由厦门EMS公司)。

(2)动态调配。馆员根据TOP1 000借阅排行榜、豆瓣、各大书店的好书热门推荐及读者推荐每周进行定期补书。图书从其他馆藏地点经由馆员主动选择或读者推荐变更至网借库,只改变“所在”字段,不改变“所属”字段。网借库只是图书完成飞鸽服务的“临时存放点”。当读者归还网借图书后,由于图书的所属位置不变,将由典藏部负责上架到原属馆藏地书架,除非被馆员重新选择,否则不再进入网借库。此举保证了网借库图书的高流动性和更新率,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图书选项。

(3)智能上架。馆员使用无线终端扫描层架标和条码号,进行网借库图书上架。层架标编码规则为:图书馆编码(3位)+楼层(2位)+网借库编码(4位)+排架面层(7位)。例如XMT01WJSK0603B01,XMT代表厦图,01表示一楼,WJSK表示网借书库,06表示第六排书架,03表示第三架,B表示B面,01表示书架第一层。网借库图书物理上是乱序的,由飞鸽系统实现图书条码与层架标的映射关系,免除“分类排架难免要留空、倒架、倒库”的麻烦^[3],提升网借库管理的智能化和灵活性。

(4)最短寻书。馆员使用飞鸽系统打印找书单。找书单根据“总体寻书路径最短”目标进行算法设计,逐排逐列逐层依据“上架时间”进行排序,保障馆员单向找书,不需在书架中重复来回走动,缩短找书总路径。

(5) 播种分拣。常见的货物分拣模式分为两种：播种式与摘果式。飞鸽传书采用播种式分拣，即将订单根据货品种数先合并成批后再进行分拣，最后依据客户订单分配。分配区(打包区)的每个货位上的标签代表一个客户^[4]。找书和分拣相分离的流程设计，加强了系统工程流水线的工序优势，馆员完成找书工作后，在飞鸽系统进行“找到”登记，系统自动对订单进行包裹拆分，在播种墙分配格子。每个格子代表读者的一个包裹。目前播种墙编号为001-099。经过分拣、打包环节，飞鸽将调用Interlib接口，将图书从预借状态，正式借阅到读者证下。借阅期从此时开始计算。厦图默认借阅期是21天，飞鸽传书服务遵循原有线下借阅规则。

飞鸽传书的网借库管理，实际上是图书馆从闭架走向开架，再从开架走向“互联网+”图书馆的新闭架服务探索，即在库房对读者不开放的情况下，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建立完善的馆藏文献知识查检系统供读者查询，利用快速传送链传递文献载体的印刷型文献借阅服务模式^[5]。利用互联网整合多元书目数据，以封面、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图书简介、评论等内容完成馆藏文献知识的在线查检与揭示，以同城物流服务作为文献传送链，以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完成服务的串联和闭环，实现读者与传统图书馆服务场所的解耦，释放新闭架服务有序性和便捷性的优势。

2.3 物流管理

(1) 运费。厦图飞鸽传书服务与厦门EMS速递公司合作，由读者自付运费。飞鸽传书服务依托于微信公众号展开服务，采用微信支付体系。厦图直接将飞鸽系统与EMS微信支付接口打通，读者订单的物流费用实时支付到EMS账户中。3本书(含3本)以下运费为3元，每增加1本加收1元运费。

(2) 拆包算法。每个包裹最多寄5本图书。如果一个订单的图书超过5本，系统将自动拆分为多个包裹。飞鸽采用“总运费最低算法”进行订单拆包。例如：某订单共有6册图书，理应拆成A、B两个包裹。如果按照A、B包裹各三册的分法，读者只需要支付6元钱运费；如果按照A包裹1册书、B包裹5册书的分法，因为3元起送的规则，则读者需要支付8元的运费。系统自动遍历所有运费方案并选择总运费最低的方案进行拆包。

(3) 取件时间。厦门EMS速递公司每天上午十点

上门取件，基本可保证当天收到的包裹当天投递到全市六区的读者手中。因此馆员必须在早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完成前一天下班后至第二天上班前所有订单的找书、打包工作。

(4) 消息回流。飞鸽系统与EMS速递物流接口实时对接，更新的物流状态可实时回传到飞鸽中，方便馆员与读者跟踪。

(5) 退款。飞鸽系统有详细的订单状态，馆员将失败状态的订单导出生成excel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EMS公司，EMS根据退款清单进行比对处理，最终完成退款并返回处理清单，馆员在飞鸽系统对完成退款的订单进行标注，至此完成一次退款的流程。在下一步升级中，飞鸽的退款模块将EMS的系统完全打通，实现退款流程的自动化，减少人工干预。

3 飞鸽传书特色设计

飞鸽传书服务首期只在厦图微信公众号开放入口，下一步将在厦门市民卡APP和掌上厦图APP等移动端开放。之所以将移动互联网作为主要入口，理由有四：①移动互联网在线时长和渗透程度，远远超过PC端所代表的传统互联网，这一点从PC端官网逐年下降的点击率可以找到佐证；②移动支付与移动互联网天然的融合体验，以及网购、点餐等O2O服务培育的用户习惯，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飞鸽传书用户的学习曲线，并形成了较好的服务闭环；③移动应用的高迭代性适应瞬息万变的用户需求，飞鸽从推出至今已经完成多个版本的功能迭代，在用户体验和工作效率方面都有较大提升；④飞鸽服务有利于丰富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内容，为微信吸粉，上线一个月为图书馆微信增加了约5 000名粉丝。

结合厦图流通规则和运营特点，以提升读者体验为目的，飞鸽系统提出鸽眼、沙漏借书架、押金与超期栅栏3个创新性设计。

3.1 鸽眼

飞鸽系统遵循“所见即所得、可见即可得”的UE设计原则。第一，读者在飞鸽系统能够检索到的图书，与实际网借库在架图书是严格匹配的。每一本图书被上架到网借库后，将同步发布到飞鸽的前端界面，时延控制在5分钟以内。飞鸽首页最新上架信息，即是馆员在网借库真正最新上架的图书，数据无缝同

步,对操作者透明。第二,如果图书被读者借走,该书在网借库的副本数为零,将会被飞鸽前端自动屏蔽。此举保证飞鸽服务最重要的定律,只要读者看得到的,就必然是可以借的;只要是可借的,就必然在网借库中可以找得到的。此设计是为保障读者的期望值不落空,提高其对飞鸽的满意度。实现这一机制的设计即鸽眼。

3.2 沙漏借书架

网借跟网购同样存在关键资源互斥锁的问题,即当某一项资源为稀缺的关键资源,并且同时存在多名竞争者时,资源将面临合理分配的考验。资源越稀缺,考验的严峻性越明显。厦图采用等额押金借阅规则,读者押金数从100元到1 000元存在不同的梯度。押金多的读者,可以借阅更多的图书,也可以使用飞鸽“预借”更多的图书。因此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好的资源被押金多的读者“抢借”到借书架,但读者却不支付运费,导致流程没有继续推进,图书长期冷藏在借书架中,其他真正想借书的读者又借不了,导致资源紧张和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入沙漏借书架的设想。图书一旦被读者加入借书架,系统自动为该书加上一把定时锁,默认时间30分钟。这段期间为冰冻时间,除了加锁者,其他读者不能对该书进行操作。读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运费支付,超时后冰冻状态将被解除,图书资源被释放,其他读者重新获得操作权。沙漏借书架的设计大大降低了资源被抢占的风险,提高了飞鸽系统的鲁棒性。

参考文献:

- [1] 张丫.苏州图书馆“网上借阅社区投递”走全国前列[EB/OL].(2014-09-21)[2017-12-15].<http://sz.sina.com.cn/news/s/2014-09-21/083112830.html>.
- [2] 董小易.杭州图书馆推出在线“悦借”服务[EB/OL].(2016-12-12)[2017-12-15].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hznews/201612/t20161212_2178493.shtml.
- [3] 林妩,陆宗城.从大开架到新的闭架借阅:再谈图书馆现行借阅方式的改革[J].图书情报工作,2002(6):119-121,80.
- [4] 马银忠,邱胜海,王云霞,等.现代物流环境下电子标签拣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机械设计与制造,2012(9):263-265.
- [5] 彭林.建立库房模拟系统 分离知识管理与载体管理职能:完善新闭架服务模式[J].图书馆论坛,2006(5):71-73.

作者简介: 黄海燕(1985—),女,厦门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阅读与图书馆新技术服务;林少杰(1984—),男,厦门市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智能化。

收稿日期: 2018-07-03

3.3 押金与超期栅栏

(1) 押金栅栏。厦图是全国公共图书馆中少数不采用册数限制而使用等额押金借书规则的图书馆,即读者借阅图书的总金额只要不超过押金数额,其借阅权利就理应得到保障和捍卫。飞鸽下单的核心原理是预借,如果未进行押金判断,可能会出现读者超押金的预借风险,其结果就是馆员打包时,因为押金余额不足而借阅失败。因此飞鸽的设计是读者下订单时,自动累计其订单总额,并与其当前已实际借阅的图书价格总额相加,实时比对押金值进行风控提醒,提高网借成功率。

(2) 超期栅栏。根据厦图的借阅规则,读者证下如果有超期图书,其借阅权限将被限制,只有归还图书后才能再次享有借阅的权利。超期陷阱是指读者在飞鸽系统下单时具有借阅权限,图书被设置为预借状态,但是当馆员找到图书进行打包时,读者证下突然出现了超期图书,导致网借书无法成功借阅。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预借和借阅两个动作的分离,中间可能存在1~2天的时间差。理论上讲,只有将时间差缩减为0天,才能完全杜绝此种风险。但读者当天下单,要当天找到并借到其读者证下,实现的人力成本太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飞鸽前端加入超期栅栏。读者下单时,系统拉取读者的当前借阅记录,预判其未来三天是否存在图书超期风险,并给予提示,由读者自主选择消除风险,还是接受风险并降低预期值。

基于 TIM 在线办公平台的云端共享选书模式实践初探

王玉萍

(武汉轻工大学图书馆 湖北武汉 430023)

摘要: 利用TIM在线办公平台进行云端共享选书,让广大读者参与到图书采访中来,实现了多年的让读者参与图书采访的夙愿。两年的实践表明,云端共享选书受到高校师生的积极响应,读者参与度高,图书采访质量稳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此外,云端共享图书采访方式无需成本投入,实现简单,推广容易。文章对这一选书模式的流程和优势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关键词: 图书采访; 云端共享选书; 在线办公

中图分类号: G253.1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e of Cloud Sharing Book Acquisition Based on TIM Online Office Platform

Abstract Many readers takes part in book acquisition through the TIM online office platform, which achieves long-cherished ambition for library for many years. Every reader can use mobile phones, tablets, and computers to participate in book acquisition at anytime, anywhere, which makes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choose books they really want, avoiding the long-term aimless book choosing caused by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limitations. After two years of practi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ctively joined the sharing book acquisition, which makes the quality of book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bring libraries closer to readers and improve the libraries' service level and service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sharing books acquisition in the cloud is cost-free, and it is easy to carry out and populariz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procedure and advantages of this mode.

Key words book acquisition; sharing book acquisition in cloud; online office

1 引言

图书采访工作是图书馆的生命线,决定图书馆馆藏质量,奠定图书馆服务基石,是评价图书馆价值和绩效的关键^[1]。高校图书馆服务于广大师生,每年图书采访量大、专业面广,而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采访工作主要由一两名采访馆员完成。由于采访馆员专业的局限性,很难为全校各专业采访到满意的图书。尽管各高校图书馆采取各种措施,如读者荐书、电话荐书、组织部分师生参与现场采书等,想方设法让读者参与图书采访,但对于每年采书量达数万册的高校图书馆来说,由于人力和资源所限,只有少数师生能

真正参与到采访中来,大多数专业图书的订购任务仍然由采访馆员完成。在国外,PDA(读者决策采购,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2]比较盛行。但由于书商与图书馆的配合度问题以及中国特有的财务体系,国外PDA模式推广不易,这使得让广大读者参与图书采访工作变得有心无力。有的高校图书馆为了让广大读者参与选书,专门开发了网络共享选书平台^[3]。这些平台可以实现网络选书功能,但是其通用性、操作性、兼容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且专门开发这样的管理系统成本高,维护和更新费用高,不易推广。

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一种互联网在线办公系统。该系统将本地办公软件的主要功能搬到了互联网上,使多人可以共享编辑在线

文档。经过两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笔者利用云端在线办公功能实现了网络共享选书,使武汉轻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近两万师生参与到共享选书活动中来。利用TIM在线办公平台实现读者共享选书的方式受到了本校读者的欢迎,广大师生参与度高、响应积极,图书采访质量明显上升,同时也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该模式易于实现,图书采访员只要熟悉Office办公软件及访问因特网即可,且无需成本投入。

2 TIM 在线办公平台概况

网络共享选书方案的制定需要一套网络共享平台的支持,互联网上有许多免费的在线云端办公平台可以利用。国外在线云端办公平台有谷歌文档、微软OneDrive等,国内有一起写在线办公平台、腾讯TIM在线办公平台、Zoho云端服务、石墨文档、百会云端在线办公平台、WPS协作等。虽然国外在线办公平台起步早,相对稳定成熟,但是在国内使用存在访问速度慢、甚至无法访问的问题。因此国内在线云端办公平台是网络选书平台的首选。在测试多个网络在线办公平台之后,笔者发现,TIM的免费在线办公系统完全适合作为网络共享选书平台。

TIM是腾讯公司QQ团队打造的一款新的QQ分支产品,在保持与QQ互通消息和账号的基础上,增设了邮件、日程、在线文档等办公功能。在线文档功能已经在TIM PC版、TIM手机版、QQ Mac版上实现,能够满足不同终端的协同操作。支持在PC端和Mac端导入和导出文档,而且支持查看历史编辑记录并回撤文档版本。支持多人在线协作编辑word、excel文档,允许用户自行设置文档访问权限。

笔者利用TIM在线办公平台完成了本校的图书采访工作,广大的师生可以利用手机、平板、电脑不受时间、地域、人数的限制自由地选择需要的图书,避免了长期以来因馆员专业局限性而导致的盲目选书。

3 TIM 云端共享选书流程

利用TIM在线办公平台进行云端共享选书需要经过书目收集、书目筛选、书目分类、数据库建立、数据库上传和发布等工作流程,再由读者选书。选书完

成后,图书采访员再进行图书选书数据收集、书目查重、图书订购等工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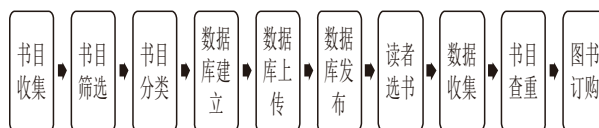


图1 云端共享选书流程图

3.1 书目收集

全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达数十万种之多,要读者参与选书,先要收集好图书书目信息。目前,图书馆获取书目信息主要有3种供应渠道:图书供应商、图书行业报刊(如“三日”、全国新书目、中国图书商报等)以及各图书出版社^[4]。每个图书馆采访员对这3种渠道的熟悉程度不同,书目信息的采选自然各有侧重。一般来说,约有70%的图书馆以图书供应商提供的书目信息为主,且大多数图书馆从图书供应商处获取的书目信息占到总书目信息的一半以上^[5]。各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购政策各不相同。我校目前采取政府招标的形式进行图书采购,中标的书商会将当年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目或次新书目录发给图书采访员。新书目录的收集完成,只是TIM网络选书工作的第一步。

3.2 书目筛选

图书供应商提供的新书或次新书目数量繁多,面向社会各行各业。对于高校来说,不是所有的图书都适合。虽然图书馆要求图书供应商在提供书目信息时要经过筛选,只提供学科类别和读者层次同本馆相符的书目,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书商提供的书目数据中,不宜馆藏的无效数据较多,据统计,书目中适合高校各学科的有效数据比例不足50%^[4]。无论是大型优质图书供应商还是小型供应商都是如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图书的筛选跟个人的知识结构与工作经验有关,图书供应商相关工作人员通常达不到高校相应的知识结构,缺乏对图书进行深层次筛选的能力,同时,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访策略和特点。另外,图书馆对书商提供的书目数量有要求,他们往往为了达标不愿剔除太多的数据,因此,图书书目的筛选不能依赖书商。

基于以上原因,收集完图书书目信息后,采访员要根据本校图书馆馆藏特点对书目进行深度筛选,剔

除无效的采访数据。例如,许多图书馆规定只选用指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为高校图书馆,一些适合于儿童、青少年读者,高职高专、中专等院校读者的图书也需要剔除;另外,有些价格过高或过低的图书也需要清理。不同性质的图书馆有不同的图书筛选原则,图书书目信息进行合理筛选后,才能让读者减少无效信息的干扰,专注于专业图书的遴选。

3.3 书目分类

云端选书的对象是广大的读者,高校的读者主要是在校大学生、教职工和科研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大多关注各自专业相关的书籍。而书商提供的图书书目信息涉及各行各业数万甚至数十万条新书条目。这些书目信息如果不进行专业分类,那么读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查找自己需要的专业图书。因此,采访人员要根据图书分类号将图书按照大学各专业进行专业分类,最后让每位读者只面对本专业的图书进行挑选。让专业的读者选专业的图书,这样才能让广大的读者有选书的积极性。书目信息经过分类后,每个专业建立一个独立的数据表。

3.4 图书数据库建立

一般的网络选书是将后台书目数据库通过多页面方式展示给读者,读者需要一页一页地翻看书目。由于书目数据量通常有几千条甚至几万条记录,采用网页分页方式可能需要数千个html页面才能检索完成。这对于多数读者来说,极少有人有耐心浏览完所有页面的图书书目。而TIM云端书目数据库采用excel方式,使读者在浏览书目数据时不需要翻页,采用鼠标滚轮就可以轻易翻动书目,这样即使书目数量大,读者也不会有翻页的枯燥感。云端书目数据库建立后,读者就像查看本地excel数据库一样方便。该书目数据库的字段包括标记、书名、价格、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内容提要、读者对象、分类号、书号。数据库按照专业分别创建,如计算机类、电子类、机械类、食品类等。

3.5 数据库上传及共享发布

书目数据库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别建立不同的excel数据文件。在PC本地建立好数据库之后,就可以利用云端在线办公平台提供的上传功能转移到云端服务器中。数据库共享发布时,可以设定公开的对象和访问权限,如图3所示。数据库的访问权限为“可以编辑”,一般高校师生都有QQ号码,可以设置特定的

QQ号码用户才能访问数据库,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授权用户的随意性。设置好数据库访问权限后即可分享数据库文件,生成超链接。



图3 共享对象及权限设置

由于不同专业采用不同数据库,每个数据库的发布都有一个超链接。为了让广大的教职工和学生知道数据库链接,需要进行宣传推广。一般推广方法是在图书馆官方主页发布所有选书数据库超链接,然后再将这个链接页面信息通过QQ或微信发送给全校读者。采访馆员可以通过相关人员将数据库链接页面信息发送到全校所有的消息群,每个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各自的专业链接访问专业书目。同时,图书馆员可以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数据库链接。为了扩大宣传,还可以制作海报张贴在学生食堂附近,让更多的学生尽快熟悉云端选书新方式和访问方法,使其参与到网络共享选书活动中来。

3.6 读者网络共享选书及图书荐购

读者利用手机、平板或者电脑通过书目数据库链接就可以随时浏览书目数据库。数据库第一列标记是为读者选书设计。对于需要的图书,读者可以输入Y标记。由于是共享云端办公,多人可以同时选书。当提供的书目信息不能满足读者需求时,读者可以在数据库最后添加自己希望荐购的图书书目。这样,读者选书和荐书工作都可以通过云端办公平台完成。

3.7 选书数据收集、查重、订购

云端书目数据库发布给读者后,可以设置一个相对宽裕的时间让读者尽情地选书。选书时间结束后,采访馆员只需要将云端书目数据下载到本地,提取读者做了标记的书目。利用图书馆的汇文系统生成marc数据,在系统中与馆藏图书进行书目查重。筛除重复

书目数据后,将读者选择的书目以及荐购的书目发给中标的图书供应商,进行图书订购,完成整个云端共享选书过程。

4 TIM 云端共享选书模式优势分析

传统的读者选书方式下,采访馆员与读者间互动的中间环节太繁琐,需要投入极大的热情、精力和耐心。往往由于采访馆员人力的不足,真正享受服务的读者对象非常有限。TIM云端共享选书是一次真正的以广大读者需求为驱动的变革。经过两年的网络云端共享选书方式的实践,大大激发全校教职工和广大学生的选书热情,表1是2016年和2017年我校广大师生利用TIM云端共享选书的统计数据。2016年度和2017年度读者参与网络选书的册数占我校图书馆全年采购册数的44.59%和70.87%。

经过两年的TIM云端共享选书实践,笔者总结其与传统选书模式相比的优势:①满足了读者参与采访的愿望,受到了读者欢迎。在网络普及的今天,云端共享选书工作使所有读者都能轻松参与,图书采访不再是采访馆员少数人的事情。②提高了图书馆藏质量和图书借阅率。由于读者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需要的图书,一方面可以避免新购图书零借阅的现

表1 2016年和2017年各学院网络共享选书册数统计

学院名称	2016年度/册	2017年度/册
食品学院	816	1 627
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747	1 395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952	1 847
机械工程学院	1 206	1 964
动物科学与营养学院	850	1 726
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	1 804	3 137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	2 968	4 476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1 646	2 969
经济与管理学院	5 409	7 651
艺术与传媒学院	3 384	5 097
医学技术与护理学院	1 560	2 036
外国语学院	2 036	3 271
马克思学院	459	768
体育部	239	304
合计	19 782	31 889

象,另一方面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从而提高了图书借阅率。③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知名度,强化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图书采访权由馆员转移到读者,使他们的阅读需求能及时、精准地得到满足,充分体现了图书馆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图书馆与读者的距离,也同时提升了图书馆的知名度。④减少了读者对图书采访工作的负面评价。通过读者网络共享选书让读者参与到图书采购中来,使他们深深领会到图书采访工作的不易,从而增加对图书采访工作的理解与支持,继而减少对图书采访工作的负面评价^[6]。

参考文献:

- [1] 经渊,陈雅.“互联网+”时代的图书采访:一场自救的变革[J].现代情报,2016(10):113-117.
- [2] 王春生.读者主导式采购:案例、争论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1(6):80-83.
- [3] 郭明明.高校图书馆网络选书平台的设计与开发[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3):48-50.
- [4] 樊国萍.高校图书馆中文图书采访的合作:基于书商采访数据特点的视角[J].图书馆学研究,2012(17):45-48.
- [5] 麻娜娜.书目信息与到货率:全国图书馆采购最看重的和最纠结的[N].中国图书商报,2011-04-26(L01).
- [6] 王春生.论图书采访众包[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7(6):72-79.

作者简介:王玉萍(1969—),女,武汉轻工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采访和图书质量控制。

收稿日期:2018-06-19

· 探索与创新 ·

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助力社区“文化养老”的创新实践

朱逸琳

(绍兴市柯桥区图书馆 浙江绍兴 312030)

摘要: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社会问题,公共图书馆助力社区“文化养老”“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绍兴市柯桥区图书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探索社区图书馆运作模式,在推进“文化健康养老”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了老年居民的广泛好评。图书馆依托社区居家养老中心、社区居民学校,从社区支持服务、社区治理等理论研究中探求“文化养老”实验背景、路径和策略,破解发展瓶颈,真正实现“文化养老”在老龄化社会的功能价值,走出一条柯桥特色的公共图书馆助力文化健康养老的新路子。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文化养老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Public Library Boosting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in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is urgent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problem of aging society. The Library of Shaoxing Keqiao distri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istrict library) has emancipated the mind, blazed new trails. It actively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ode of community library, and it has achieved obvious results in promoting culturally healthy supporting the aged, which was widely praised by the elderly residents. The library, based on community home endowment center and community school, has been exploring the experimental background, path and strategy on cultural endowment from 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and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district library has cracked development bottleneck, realized the function value of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in an aging society, thus found a new way of public library boosting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eqiao.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ulture endowment

1 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助力“文化养老”的背景

1.1 服务老龄社会的时代需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老年群体对文化养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截至2016年底,60周岁以上人口是15.09万,占总人口65万的23.07%。柯桥区目前拥有区图书馆一个,现有注册老年读者1万多人,进入区图书馆学习的只占7.3%。从现实情况看,光靠一个区图书馆已远远不能满足老年居民的学习需求,没有地方借书阅读,俨然已成

为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1]。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社会文化机构,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参与发展老龄事业,有针对性地做好老年读者的服务工作,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贡献一份力量。绍兴市柯桥区图书馆(以下简称“柯桥区图书馆”)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多年的努力,不断创新办馆模式,努力将图书馆的触角延伸到社区,探索出一条以区图书馆为中心、以社区分馆为依托的“文化养老”模式。

1.2 服务书香柯桥的现实需要

书香柯桥工作千头万绪,柯桥作为小城市,起步比较迟。柯桥区图书馆以全民终身学习周为契机,探

索以开设社区分馆为抓手来共同推动书香柯桥建设,以老年人带动更多的人读书,提高书香柯桥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实践证明:只要能结合社情,以社区图书分馆为基础,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书香柯桥向纵深方向发展,提升社区居民整体学习兴致。而书香柯桥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化养老”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3 服务社区治理的客观需要

随着绍兴行政区划的调整,大绍兴城市格局的确定和新的规划的实施,柯桥被定位为绍兴大城市的经济和商贸中心。随着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以及本地人口大多数由农民转变成市民的时间也不长,他们无法适应日新月异城市发展的需要,这在客观上对柯桥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老年人社会经验丰富、牵挂少,尤其是图书馆的注册读者,大部分是有思想、有担当、有能力的人,他们肯学习、肯动脑筋、勇于破解社区居民间的矛盾,更能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交通安全、美丽乡村建设等重大活动中出谋划策、出工出力,并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给图书馆服务社区治理迎来新的机遇。鼓励和引导老年人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专长,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使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都大有益处。

1.4 服务和谐柯桥的必然需要

柯桥区图书馆位于柯桥区的主城区,在全区和谐社会建设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服务区域内社会经济、服务老年教育是发挥柯桥区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必然要求^[2]。老年人群一般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一定的社会与家庭地位,社区图书馆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提高老年人群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使老年读者自然而然地成为化解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稳压器,成为和谐柯桥建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之一。

2 新时期公共图书馆助力社区“文化养老”的创新实践

2.1 在先进的社区开设分馆

柯桥区图书馆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综合考量,在硬件和软件条件过硬、社区干部事业心强、物业领导比较热心的社区优先考虑开设分馆。运作的模式为:

在图书馆的具体指导下,社区提供办馆的基本设施设备,根据要求,业委会共同参与分馆平时的管理,同时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图书馆派专业素养强的馆员到分馆指导业务,同时不定期派管理人员到社区全程跟踪服务。柯桥区图书馆率先在大渡社区开设了第一个分馆,目前分馆有注册老年会员120多人,受到老年居民的欢迎。

2.2 配合高档物业开设分馆

柯桥区以轻纺城为依托,吸引了大量外地富商,由此高档社区应运而生。物业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想方设法提高服务档次,提高老年教育服务,这成为他们有力的促销手段。运作的模式为:物业公司提供场地和设施设备,负责管理,柯桥区图书馆负责业务指导和送书上门。例如,柯桥街道玉兰花园社区是由绿城集团开发管理的新型高档社区,居民大部分都是外地到柯桥轻纺城经商的新柯桥人。绿城集团为提升业主的生活品质,实现健康老年、安逸老年、快乐老年、价值老年、幸福老年、完美老年的服务目标,为老年业主提供图书分馆学习活动,受到老年朋友的欢迎。现在每天有几十个老年人来社区分馆看书交流。

2.3 在养老中心开设精品馆

柯桥街道2015年花巨资打造了街道级居家养老服务综合体——颐养园,硬件设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颐养园采用“社工+志愿者”的服务模式,开展曲艺歌舞、阅读健身、培训讲座等服务内容,为街道居民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综合养老服务。目前注册的会员已有八百余人,来自城区各个社区。柯桥区图书馆为扩大影响,充分整合资源,不但开设了精品馆,还成立了由骨干馆员组成的志愿者讲师团,每周固定为他们带去歌咏、舞蹈等课程,深受老年人的喜爱。通过老年学员的积极参与,分馆人气越来越旺。

2.4 采取“三单制”培训模式

柯桥区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采取“三单制”培训模式开展“文化养老工程进社区”活动,即“社区下订单,图书馆配菜单,政府来买单”。运作模式为:社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社区自身的现状和资源,开出满足社区老年人精神需求、受老年人欢迎的课程;区图书馆根据社区订单精心配出菜单,并根据菜单为老年人开展免费培训,使他们真正实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这种

“三单制”培训模式,充分发挥了社区和图书馆的最大合力,整合了需求、培训、管理三方资源,增强了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去年,柯桥区图书馆收到社区的订单近50份,要求培训的内容包括健康知识讲座、生活礼仪讲座、居民时尚类培训等,图书馆根据订单的要求制定出培训计划,每月为社区送餐上门,使没办法到馆的老年人能在家门口享受到社区阅读的免费服务。

2.5 由优秀社团牵头,图书馆骨干辅导

城区有近20个优秀社团,大部分社区都有一个社团,涉及到合唱、舞蹈、空竹、太极拳、瑜伽、棋类等,团员的大部分为老年人。优秀社团来牵头,骨干学员来辅导的运作模式为:社区居民学校提供场地,社区总协调;社团负责人具体负责招生和日常管理;图书馆推荐骨干学员负责辅导,加强社团的跟踪服务。如育才社区的合唱社团就由柯桥区图书馆音乐专业毕业的老师牵头辅导,一周辅导两个晚上,人员从最初的1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40人,为居民们带去歌声与快乐,已经坚持了8年。

3 后续思考

3.1 采用多种形式,吸引老人参与

虽然家门口办起了分馆,但是老年人参与的比例还不高,公共图书馆应采用多种形式与手段动员老年人群走出家庭、走进社区、参加教育活动。如,开展专题讲座、座谈会,进行成果展示、专栏宣传,外出参观等,真正做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只有动员最广大的老年人群参与,才能发挥最强大的集群优势,共同打造书香柯桥。

参考文献:

- [1] 王香瑞.老龄化时代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策[J].图书情报导刊,2012,22(6):11-13.
- [2] 林燕.关于推进老年教育社区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J].镇海老年大学,2012(2):15-17.

作者简介:朱逸琳(1992—),女,绍兴市柯桥区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养老、图书馆文化建设等。

收稿日期:2018-01-09

3.2 加大财政支持,提供经费保障

社区虽开设了分馆,但缺乏供老年人使用的图书。随着社区分馆数量的逐渐增多,部分社区的办馆经费显得捉襟见肘,经费不足成为制约分馆推进的瓶颈。政府层面应提高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增加老年人人均阅读消费经费和必要的公益活动经费,确保文化养老落地生根。

3.3 结合工作要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为确保文化养老落到实处,需紧密结合文化养老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来设立管理标准、规范群众行为、调动积极性,从而促进工作任务达标。在管理团队建设方面,应该考虑成立社区分馆管委会,动员社区里有爱心、有经济实力的人士参与;在制度管理方面,应建立健全社区分馆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工作职责。

3.4 加强理论研究,强化宣传意识

公共图书馆应学习并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区委区政府提出新时代文化领域深入开展文化养老的文件精神,结合图书馆实际,充分诠释含义,提炼通俗易懂、可学可用的理论知识,更好地指导文化养老工程。同时,公共图书馆应通过广泛有效的宣传,使文化养老深入广大老年人,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文化养老工程之中,使工程的推进、深化更可持续性。

3.5 进一步盘活载体,推进数字化发展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其在文化养老工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切身要求,开展广泛的调研,建立能够助力文化养老工程发展和老年人兴趣成长的多元化、正规化、灵活性强的载体和活动平台;加强数字化网络建设和智慧图书馆的运用,逐步完善网上学习资源库,建立老年人的学分银行。

· 探索与创新 ·

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实践和思考

季彤曦

(丽水市图书馆 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 丽水市属于浙江省欠发达地区。丽水市图书馆通过多种创新举措努力在困境中突围: 第一, 统筹资源, 成立了“学而”读书会、开展“我是角儿”——亲子角色阅读; 第二, 开辟服务场所, 如在行政中心设立“阅读吧”以及打造“城市书房”; 第三, 紧抓平台建设, 如举办“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提升“未成年人读书节”品牌活动、成立“丽水朗读团”、推出“书篮子计划”、制定“蒲公英计划”; 第四, 关注弱势群体, 为视障读者、老人及留守儿童提供按需服务等。并作如下思考: 资源应统筹共享, 阅读需营造氛围, 服务要按需精准。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服务; 丽水市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9.27

文献标识码: A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bstract Lishui City belongs to the underdeveloped area of Zhejiang Province. Lishui Library trie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through various innovative measures: first, coordinating resources, set up a "Learning and Reading" book club, and carried out a parent-child role reading; second, opening up service place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Reading Bar" and "City Study Room" in administrative center; thir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such as host the series of activities of "4.23" World Reading Day, enhance the "Juvenile Reading Festival" brand activities, establish "Lishui reading group", launch the "Book Basket Project" and make "Dandelion plan"; fourth, pay attention to vulnerable groups and provide on-demand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readers, the elderly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s: resources should be coordinated sharing, reading nee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and the service should be precise as needed.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library service; Lishui Library

1 背景

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地标的图书馆, 不仅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也是公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场所。图书馆的价值体现, 不在于馆舍的新旧、高大宽敞与否, 而在于它所承载的内容。

丽水市图书馆馆舍系20世纪80年代末的建筑, 共6层, 面积1 171.91平方米, 如今已成为城市的幽静一隅。大门两侧的马赛克墙柱、小院里的石桌椅和记录岁月的繁茂大树, 满满地承载着丽水市民曾经的记

忆。目前, 全馆在编人员14人, 编外用工4人, 藏书36万册。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需求的增加, 现有简陋馆舍已远远跟不上服务需要, 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2 丽水市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实践

面对现状, 丽水市图书馆人没有气馁, 想方设法借力借场, 在争取、筹备新馆建设的同时, 努力克服馆舍“老旧破小”现状, 积极挖掘和统筹社会资源, 主动与民间公益教育机构、新华书店、报社、学校等部门单位合作, 紧密结合读者需求创新服务项目, 全

面铺开全民阅读系列活动,致力于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让阅读成为城市的最美风景。

2.1 统筹资源,加强合作

(1) 成立“学而”读书会

为进一步引导、推动和实践全民阅读,丽水市图书馆主动联合社会资源“万象书院”打造“学而”读书会,于2017年3月份正式启动,迄今共举办不同主题读书活动30余期,参与人员7 000多人次^[1]。

读书会以“交流、分享、传承、践行”为宗旨,每周选定一个主题,以书法、古琴、国画、太极等传统文化艺术为主,每周六下午在万象书院开展活动。读书会特别邀请了丽水市本土专家、各界知名人士及艺术界名家担任指导老师,共同关注全民阅读,助力“书香丽水”打造,旨在通过形式多样的读书学习活动,引导市民走进经典,亲近书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

(2) 开展“我是角儿”——亲子角色阅读

为培养孩子阅读兴趣,加强亲子阅读互动,丽水市图书馆策划了“我是角儿”——亲子角色阅读。因馆舍小、无场地,丽水市图书馆主动联合新华书店,将活动场地设在新华书店,并邀请专业老师现场点评和指导。此项活动的开展,是对亲子阅读的创新和提升,不仅增添了孩子的阅读兴趣,而且提高了其阅读质量,同时也锻炼了其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该活动通过故事角色的语言表达,生动呈现故事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让阅读变得极为有趣,得到家长和孩子的一致喜爱,为家庭阅读兴趣的培养搭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平台。目前,此项活动已形成一定影响力,并已延伸到农村文化礼堂。

2.2 开辟场所,提升服务

(1) 驻点机关,设立行政中心“阅读吧”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公益性阅读”。“十三五”期间将推荐500个“书香机关”,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读书学习、全面增强素质,有效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

为进一步浓厚机关阅读氛围,满足干部职工阅读需求,2017年6月2日,丽水市图书馆开办的丽水市行政中心“阅读吧”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浙江省11个地级公共图书馆在市行政中心开放的第一家自助服务阅读吧。“阅读吧”设计风格温馨舒适,虽面积不大,但书

香氛围浓厚,采取全自助服务,无人值守。配备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自助饮水机、捐赠书架以及无线网络,以“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机关”为主旨,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更便捷地享受阅读。并设“读者推荐书单”,第一时间根据读者需求提供服务。

(2) 推进阅读,打造“城市书房”

为营造更舒适便利的阅读环境,丽水市图书馆打造了市区首家城市书房,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书房周边居民区密集,交通便利,面积近140平方米,市民凭身份证刷门禁进入。书房内装修设计别具一格,注重细节布置,共设阅览座位42个,藏书8 000余册,内容涵盖经典文学、名人传记、少儿读物等十几个种类。配有自助借还机、自助办证机、自助饮水机、应急药箱等设备设施,实现无人值守,通过门禁监控系统进行管理,为市民提供一个全新的阅读空间,让读者享受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2]。

据统计,城市书房开放以来,平均每个月接待读者达1万人次,得到市民一致点赞。城市书房的开放,不仅提升了城市品位,也培养了市民的文明阅读习惯,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2.3 紧抓平台,引领读书

(1) 举办“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丽水市图书馆创新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紧抓“两会”契机,与丽水日报社联合举办“与书结缘、馨香人生”作家读书会,让“4·23”读书活动从4月20日起就拉开序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作家读书会参加人员涉及各部门各层面,有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有各级机关干部,有学生老师代表,还有企业人员。4·23活动当天,开展了“阅读马拉松”挑战赛、小书友读书分享会、“图书馆之夜——读者朗读会”等系列活动,对阅读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推广作用。

(2) 提升“未成年人读书节”品牌活动

丽水市图书馆连续14年举办未成年人年度阅读“琅琊榜”,对年度借阅前60名的读者进行张榜公布并表彰奖励。同时,举办丽水市未成年人读书节之朗诵大赛,选送的作品分获浙江省第十三届未成年人朗诵总决赛一等奖和二等奖。

(3) 成立“丽水朗读团”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国语之美在更广泛的空间延伸,同时也为广大朗读爱好者搭建朗读交流平台,感受和传递文字更丰富的内涵,从而进一

步带动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丽水市图书馆、处州晚报、丽水网联袂打造了“丽水朗读团”,于2017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并举办了红色经典朗读会首秀活动,喜迎十九大^[3]。目前,朗读团成员400多人,举办线上线下交流互动、沙龙讲座等活动。

(4) 推出“书篮子计划”

按照读者需求提供服务,推出“读者现场选书,图书馆幕后买单”的“书篮子计划”。读者可在新华书店挑选喜爱的书籍,在新华书店前台直接办理相关借书手续,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直接把新书带回家,只需日后将所选书籍归还至市图书馆即可。

(5) 制定“蒲公英计划”

积极开展优秀阅读推广人、阅读推广活动品牌评选活动。在“学而”读书会每期活动开始之前,特意安排“阅读推广”专门板块,请热心读者分享好书好文,并进行现场朗读推送,积极培养“阅读推广人”。

2.4 关注弱势群体,按需提供服务

(1) 开展特殊读者(视障人士)订单服务

针对特殊读者(视障人士),上门开展订单服务,按需配送盲文图书、集体借阅听书机等。丽水市图书馆推荐的刘慧、项伟强获浙江省盲人“阅读之星”。在“书香承载梦想 阅读点亮人生”——全国优秀盲人读者评选活动中,丽水市图书馆获得优秀组织奖,推荐的候选人项伟强荣获全国“优秀盲人读者”称号。

(2) 老年读者服务

丽水市图书馆从2012年开始举办“老年读者电脑知识免费培训班”,培训学员最大年龄89岁。培训内容为:计算机基础知识、网页浏览、文字输入、视频观看、QQ和微信的使用等。介绍适合老年读者使用的图书馆数字资源,同时增加培训的趣味性,深受老年读者欢迎。

(3) 关爱留守儿童

组建书香志愿队,走进农村文化礼堂、乡村学校,和孩子一起阅读。所有志愿者给留守儿童当“陪读爸妈”,让孩子体会阅读的快乐、感受阅读的温暖,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3 思考

丽水市图书馆的一系列创新发展举措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得到市民一致好评。不仅推动了全民阅读的开展,浓厚了阅读氛围,提升了城市品位,更成为文明城市创建中的美丽风景。丽水市在浙江省范围内尚处于欠发达地区,丽水市图书馆在开拓创新、突破各种限制、努力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文化先行的成效。为此,笔者对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实践作如下思考。

(1) 资源应统筹共享。正能量的社会资源,不论是活动举办、场地使用,只要可被我们所引导、所掌握,就可联合运用,实现资源共享。公共文化是全社会的文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进,需要全社会力量的支持。只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公共文化事业、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才会越做越强。

(2) 阅读需营造氛围。全民阅读,不光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全民的阅读实践。阅读氛围是需要营造的,是需要带动的。只有有了浓厚的阅读氛围,人们的阅读兴趣才会被进一步激发,全民阅读习惯也才会逐渐养成。

(3) 服务要按需精准。所有的服务,必须是按照读者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服务会收到最大化的社会效益,也才是让读者更加信任图书馆、更加喜欢图书馆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与春天一起阅读——丽水“学而”读书会启动[EB/OL].[2017-11-01].<http://www.lslibrary.com/xw.asp?id=589&cid=15>.
- [2] 丽水市区首家自助城市书房即将粉墨登场[EB/OL].[2017-11-01].<http://www.lslibrary.com/xw.asp?id=624&cid=15>.
- [3] 丽水朗读团分班活动开启阅读新模式[EB/OL].[2017-11-09].<http://www.lslibrary.com/xw.asp?id=639&cid=15>.

作者简介:季彤曦(1978—),女,丽水市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7-11-13

基于图书馆 APP2.0 的阅读推广模型探究

蔡豪源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623)

摘要: 近几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民对自身阅读情况并不满意,智能手机已取代个人电脑成为当今人们获取资讯最重要的工具。目前国内很多图书馆已相继推出了手机APP作为延伸服务,但其思路仍以单方面向读者提供移动阅读为主。笔者从读者心理与情感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了纸质阅读对改善国民阅读状况的效果,论述了图书馆APP在阅读推广工作中可发挥的作用,并在图书馆2.0的基础上提出APP2.0的思路。文章引入钩瘾效应理论,以抽象图书馆要素理论为框架,设计出一个基于图书馆APP实现的阅读推广模型。

关键词: 阅读推广;图书馆2.0;图书馆APP;钩瘾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Library APP 2.0 Based Reading Extension Model

Abstract The national reading survey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people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current reading situation. Smartphones have replaced personal compute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peop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At present, many libraries in China have launched the mobile APP as an extension service, but they remain providing readers with mobile reading in a single way. The author carries out the research on readers'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level,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paper reading to improve national reading status, and what role APP can play in reading promo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APP2.0 based on Library 2.0.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heory called hook model.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bstract library elements, a reading promotion model based on Library APP is designed.

Key words reading promotion; Library 2.0; Library APP; hook model

随着“全民阅读”被列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已进入一个新方位。目前,关于阅读推广的研究在国内图书馆界方兴未艾,各种展览讲座、读书沙龙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中国知网以“阅读推广”进行主题检索,得到的文献足有8 000篇之多。相关研究从2004年开始,在数量上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综观已有的研究,多采取的是图书馆本位范式,着眼于推广形式上的创新,包含大量叙事、报道性内容,具有强烈的活动化特征,故当前探讨怎么做、做了什么的研究占有极大的比例^[1],而站在读者角度对阅读推广工作进行思考与分析的研究则并不多见。以笔者之见,由于阅读推广本身是对读者行为的一种干预和引导,同时也是对读者需求的

一种满足,如能适度融入产品理念,尝试从读者体验和使用的层面进行研究,将有利于阅读推广理论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钩瘾效应理论提出一种基于图书馆APP的阅读推广模型,研究如何通过变动奖励、用户投入等要素自然地引发读者的主动参与意识。

1 阅读危机与阅读推广

现代阅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形式上的多元化,数字化方式的阅读已相当普遍。为理清不同阅读方式之间的对比关系和变化趋势,笔者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1—2016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关于国民阅读形

式倾向研究的数据加以整理^[2]，绘制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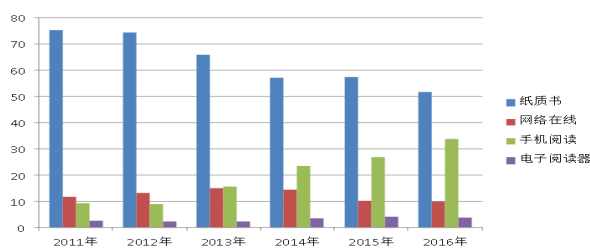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16年各阅读形式所占百分比

图1主要反映出两个现象：一是倾向于纸质阅读的读者人数呈现下滑趋势，二是倾向于手机阅读的读者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图书馆阅读推广如今成为业务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全民阅读背景下图书馆肩负的社会使命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近年馆藏文献借阅量持续下滑的阅读“危机”使然。这种危机在图1中也得到了印证，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阅读方式大有取代传统纸质信息资源成为国民阅读主流的趋势。据2018年1月3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7年12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3]。“低头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鲜明的群体，智能手机正在支配着他们的碎片时间。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数字信息资源以其内容丰富、容易获取的特性，是否比纸质资源更好地满足了现今国民对阅读的需求？

阅读需求的满足程度通常由个人对阅读质量与阅读数量的评价来反映。阅读质量很大程度上依据个人主观标准而定，涉及诸多因素，难以进行横向对比，而阅读数量的标准则较为单一。笔者整理2013—2016年全民阅读调查关于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的研究数据，发现4组数据反映的情况大体一致，均显示只有不足10%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或比较多，有超过80%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很少或比较少。在实体书店相继结业、数字化阅读大行其道的今天，国民的阅读需求似乎普遍受到了压抑。同时，即使纸质阅读占比逐年下滑，仍有超过半数人希望回归传统的纸质阅读。

国民希望进行更多的纸质阅读，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变迁促使阅读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情感上的因素使然。传统的纸质阅读能在过程中提供比移动阅读更为愉悦的知觉，有助于读者代入情景、吸收知

识，从而更大地满足人对阅读的需求。心理学家曾提出一种“框架效应”理论，认为所处的情景能反过来塑造人的知觉。纸质书作为阅读载体同样发挥着框架效应：精美的装裱，厚实的书身，翻页时挥发的幽香，这是移动阅读所替代不了的。同时，图书馆里充满文化气息的空间氛围能进一步放大这种效应，帮助读者进入沉浸式体验。近年来国民到馆借阅图书的数量趋于下降，而在移动端囫圇吞枣式的阅读效果又未如理想，阅读饥饿感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认为，当下图书馆阅读推广一个明确的任务与目标，就是力争扫除信息泛滥时代所产生的阅读“障碍”，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帮助国民走出阅读困境。无论是基于这一点，还是基于促进纸质图书资源流通率的直接目的，阅读推广工作都应以能带来沉浸式体验的深阅读为主。

2 图书馆 APP 阅读推广：从 APP1.0 到 APP2.0

互联网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图书馆APP可以尝试改变着重为读者提供浅阅读、碎阅读的思路，在客户端设计上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阅读推广的想法萌生于2009年。彼时，图书馆2.0研究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正受到空前的关注。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将Web2.0技术、开源软件与图书馆进行融合，也有人开始意识到更深刻的变化来自用户。陈若韵研究了图书馆博客为阅读推广带来的实践效用，认为图书馆博客应围绕目标用户的需求持续提供原创性内容^[4]；谢蓉、张丽将互联网阅读推广定义为“阅读2.0”，提出将Web2.0的理念与方法应用于社会阅读，并认为手机平台提供的图书馆服务让读者利用馆藏更便捷^[5]；白才进认为图书馆在2.0时代要重新构建阅读学理论，倡导全民阅读，创建知识型社会，并提出利用网络平台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6]。近几年，图书馆2.0的研究停滞不前，马智娟、陈永刚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差强人意的实践效果，并且相关的反思鲜有真正从用户角度去研究图书馆2.0的应用，提出应从心理学层面对读者心理和情感进行图书馆2.0解析^[7]。从2011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上线了自己的手机APP，部分学者开展了有关图书馆APP的专门研究，包括国内外对

比分析和系统设计实现等。谢蓉指出,目前移动图书馆的功能主要是在手持设备上检索和查看图书馆内的各类数字化资源,真正实现了移动阅读,但在与各类网络应用双向融合及结合Web2.0的交互式功能和用户创建内容方面,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8]。

关于图书馆APP阅读推广的研究并不多。张丹通过对我国多所高校图书馆的APP进行调查,发现普遍存在服务界面雷同、忽视APP阅读推广能力和缺乏个性化订制等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界面设计、个性化、社交分享和阅读激励等对策^[9];陈鹏总结出iReader在阅读体验、社交分享和营销推广三方面的优点,提出功能设计和互动式阅读的相关建议^[10];李雁行和王志国则对主流阅读APP进行了调查,从阅读界面模式、社交分享服务、营销推广模式三方面进行了特色分析与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化阅读环境下移动图书馆APP的改进意见,即加强用户界面设计、注重UGC和PGC内容的开发、打造个性化推荐模式、建立用户成长体系等^[11]。已有学者意识到图书馆APP在阅读推广方面的潜力,通过对比分析指出了图书馆APP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对于如何改进也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更多的是对规律的探索、理论的借鉴与经验的运用,在理论建构方面却是浅尝辄止,并未明确提出一个阅读推广的理论模型。

尽管目前关于图书馆2.0的讨论已归于沉寂,但笔者认为其蕴藏的几个理念,在智慧图书馆APP的建设中将焕发新的生命力。美国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研究发现,人们对自己制造或参与制造的物品会抱有更多好感,且在制造的过程中投入的感情越多,物品对制造者的意义就越大。这种消费者对于一个物品付出的劳动或情感越多,就越容易高估该物品价值的现象被称为“宜家效应(The Ikea Effect)”^[12]。图书馆2.0代表人物Michael Casey指出,图书馆2.0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变革,这是一种鼓励持续和有意识变化的图书馆服务模式,邀请用户参与创建自己所期望的服务^[13]。如果说目前以提供传统个人图书馆和各类数字化资源等单向服务为主的图书馆APP是1.0版本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融入图书馆2.0理念,同时提供专业生产内容(PGC)与用户贡献内容(UGC),使用户从单纯的知识接收者向知识创造者和传播者转变的智慧移动图书馆服务将可称为APP2.0。与当年Web2.0刚提出时相比,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

具备了相对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APP2.0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移动服务端,同时也是读者阅读行为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器。

3 以钩瘾模式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可行性

钩瘾模式由尼尔·艾欧在《钩瘾效应》一书中提出,是指设计出一种体验,将用户遇到的问题和设计者的解决方案频繁联系在一起,以帮助用户形成一种习惯。有效的钩瘾模式能让用户从依赖外在触发转变为受到内在触发而产生心理联想。用户的状态会由低度参与进入高度参与,从低度偏好变为高度偏好。钩瘾模式包含4个步骤:触发、行动、变动奖励和投入(见图2)^{[1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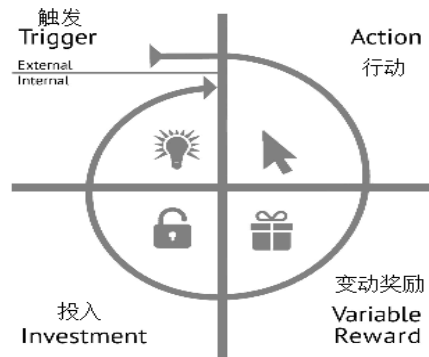


图2 钩瘾模式的4个步骤

要将钩瘾模式引入阅读推广理论,首先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1) 真正建立“服务即产品”的意识。图书馆业内一直有意回避“营销”的字眼,“因为总认为它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与图书馆的公益性格格不入,尤其在我国的图书馆界更是如此。”^[15]在以往,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公益理念的确深入人心,然而互联网时代发展至今日,信息的泛滥正在迫使人们作出大量的决策和选择,已可认为“时间+精力=金钱”。若图书馆再以服务免费、阅读的自发性等理由拒绝承认用户就是“消费者”,不真正以产品视角看待自身提供的服务,无疑将导致阅读推广工作陷入被动的境地。图书馆APP作为图书馆的直接产品,承载的不仅是虚拟图书馆,更是良好的用户体验。因此,有必要将营销传播的理念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

(2) 操纵行为是否合乎伦理。引入营销传播理念,必然会涉及操纵行为的问题。关于操纵行为是否

合乎伦理, 尼尔·艾欧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决策协助工具——操纵矩阵(见图3), 向用户习惯的制造者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 制造者自己会使用产品吗? 第二, 这个产品能否帮助用户明显改善生活^{[14][173]}? 首先, 阅读推广产品的制造者(图书馆员)与用户(读者)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一方面, 图书馆员为制造出优秀的阅读推广产品, 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必须研究如何将图书馆现有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成知识价值以供给用户。这种研究是随着技术的应用和社会的变迁而动态发展的。因此, 图书馆员本身同样需要产品提供的知识服务。另一方面, 读者良好的反馈行为对阅读推广工作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 图书馆可通过用户成长体系中的积分系统分析用户的个人积分变化及使用情况掌握用户对资源的使用倾向, 从而及时调整阅读推广工作的策略、重点。其次, 图书馆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的公益性, 决定了其阅读推广行为的根本目的不是商业盈利, 而是传播正能量, 培养良好的习惯,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 图书馆无疑是操纵矩阵中的促进者。

显著改善使用者生活	推销者	促进者
未改善使用者生活	行商者	娱乐者
	制造者本身不使用	制造者本身使用

图3 操纵矩阵

(3) 对公平服务原则的理解。钩瘾行为的核心是变动奖励, 当图书馆落实对期望中用户借阅行为的奖励, 则必然会在读者人群中推行具有差异化的服务。应该看到的是, 只要是建立于起点一致、奖惩公正的基础上, 这种差异性与图书馆的信息公平原则并不相悖。在“时间+精力=金钱”的前提下, 当合乎图书馆期望的反馈行为成为用户自身的“资本”, 这种“市场化”运作便有了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 只有当借阅行为能为用户带来实在的价值储存时, 钩瘾行为才能发挥其寄宿和传播的最大效应。

4 基于图书馆 APP2.0 的阅读推广模型构建

4.1 阅读推广的钩瘾效应

4.1.1 触发用户

目前, 国内开展阅读推广工作的思路集中表现为以图书馆为本位的宣传与推介, 即通过策划各种形

式新颖的读书活动、讲座展览等, 组织方式、过程设计的创意层出不穷, 近年来已积累了大量优秀的阅读推广案例。但从实际开展的情况来看, 仍存在某些误区或局限: (1) 服务边界模糊。很多阅读推广活动无疑是新颖潮流、引人注目的, 却没有塑造出强烈识别性; 一些图书馆把所有活动都归为阅读推广服务^[16]。阅读推广的直接目的始终是促进现有馆藏的流通率和利用率, 尤其是纸质图书资源。另外, 热衷于参与活动的往往是图书馆的忠实读者, 很多潜在读者常常由于不了解、不知情而错失爱上阅读的机会。(2) 机制的长效性。图书馆固然可凭借馆员的创意迸发推出高水准的阅读推广活动, 成功带给读者惊喜, 但一味追求形式创新同样会带来锚定效应(指人们在对其人某事作出判断时, 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 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活动的水准越高, 带给读者的新鲜感越强, 产生的锚定效应就会越显著。一旦阅读推广活动的水准有所下滑, 或者同一个形式用得久了, 达不到读者的预期效果, 读者参与活动的意欲就会慢慢减退。要将服务活动化, 使高水准活动成为常态, 维持读者的忠诚度。图书馆要培养用户的阅读“瘾症”, 并最终建立他们对阅读行为的依赖性, 仅靠几位馆员的灵光一闪并不足够。

应该说, 图书馆优雅的馆舍空间、新颖的推广形式已在读者人群中形成了良好的印象与口碑, 但若实施钩瘾, 这只是第一步: 外在触发。还需要一款经过合理设计的图书馆APP, 将读者内在的阅读需求与馆藏资源连结起来, 使阅读推广对读者形成影响力更为强大的内在触发。目前智能手机APP的种类众多, 一部分热门应用更是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动态评论、发送红包等功能大获成功揭示出人们对来自他人的关注和自身行为带来的奖赏的渴望。图书馆如果也能推出一个让用户上瘾的APP, 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展的阅读推广工作定将事半功倍。这样就能有效减轻馆员在形式创新方面的压力, 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阅读推广内容的经营与开发上。

4.1.2 用户行动

要使读者的行动得以真正开展, 就要将到馆借阅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 在区建立以区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以镇(街)公共图书馆为分馆的总分馆体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总分馆制是国外公共图书

馆普遍采用的发展模式,国内苏州、嘉兴、杭州以及深圳福田区等均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总分馆体系,成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模式典范。近年来广州地区在总分馆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2015年颁布与实施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第二章第十条指出“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体系”^[17],为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1.3 变动奖励

图书馆应对期望中的读者行为进行奖励,以此来强化他们到馆借阅的动机。如已有学者提出的“阅读成长体系”,就是通过APP将读者在线上的活动转化为积分或等级,然后在线下或线上换取相应的奖励和等级提升。图书馆对读者提供的鼓励是丰富多样的,如允许读者用积分抵消贵价书、电子设备的押金,或者是针对新到书、畅销书和一些知名度较低的好书组织“秒杀”活动,让积分达到一定等级的用户参加。由于这些奖励与机会是读者用自己的阅读行为换来的,即使不涉及金钱消费,读者仍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来自其他用户的评论、留言和关注,也将持续地抓住读者对图书馆APP的注意力。

4.1.4 用户投入

用户投入是钩瘾模式的核心。笔者认为,引入用户贡献内容(UGC)是图书馆APP从1.0向2.0转变的关键因素,包括允许用户在馆藏资源页面进行公开评论,同时可对其他用户的评论进行留言,还有建立讨论社区等。现阶段图书馆APP除了提供传统的个人图书馆服务,更多地扮演着数据商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角色。过去图书馆作为信息贮藏场所,在知识供应链中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互联网发展的冲击下已不复当年。他人的阅读心得与体会对阅读推广同样意义重大。读者可以加入到信息的创造与提供中来,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是数字时代对图书馆地位的冲击,也是数字时代为普罗大众带来的积极意义。图书馆APP的价值不一定要靠资源组织来体现,它也可以是一个交流与创造的平台。

4.2 基于钩瘾效应的图书馆 APP2.0 阅读推广模型构建

阅读推广理论是对实体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统一分析。理论模型的构建既要为阅读推广工作提供

参考,也要方便日后相关的效果评估和分析。

叶鹰在《书理学论纲》中提出了图书馆内观抽象模型,认为图书馆员和图书馆馆藏中蕴涵的知识以及设备中体现的技术等,都是知识和技术的象征,故可以用知识K和技术T作为表征图书馆内部构成和性能的抽象指标^[18]。在阅读推广中,馆员可凭借学科专业知识和对馆藏资源R的理解生成类似精彩书评与书目推荐等PGC信息,其中表现优秀、有较多用户关注的个人还可以在社群中担任阅读领袖的角色。如前所述,UGC与PGC在内容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纯粹从生成的主体上作出区别。在图书馆APP2.0构建的阅读社区中,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两者的互动也将变得前所未有的频繁。曹旼分析图书馆在互联网+新环境下的崭新面孔,探讨了如何利用最新的技术升级目前的阅读推广模式^[19]。人工智能技术将在读者阅读行为大数据分析中以及用户个性化内容推送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技术T所代表的内涵。除了图书馆本位要素R、K与T外,笔者还引入了读者反馈要素P。P可直观地理解为用户阅读成长体系中的积分,为用户对实体馆藏流通的贡献值P₁与在虚拟阅读社区中的贡献值P₂之和。图书馆可在阅读推广的不同时期调整P₁与P₂的权重或添加组成因子。P值既可以作为图书馆对读者奖励的依据,也可以作为APP阅读推广绩效评估的参考。显然P值与推广成果成正相关。基于图书馆APP2.0的阅读推广模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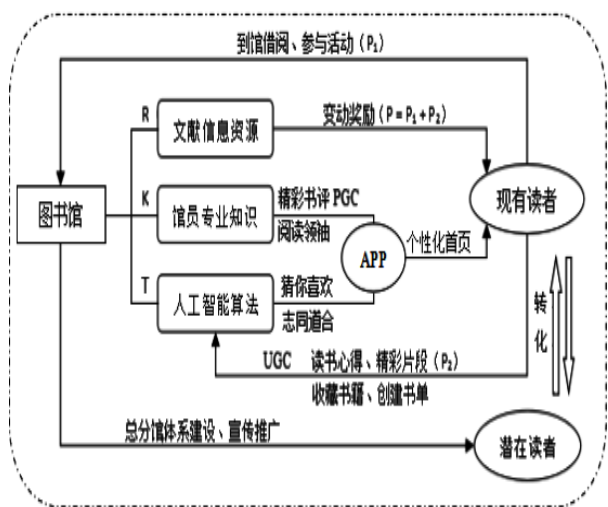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图书馆 APP 的阅读推广模型

5 结语

引入钩瘾效应的相关理论,使我们得以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可以带来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改变,这种改变影响着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基于图书馆APP的阅读推广完全可以与形式多样的现

场推广活动互补配合,促进国民阅读状况的改善。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其探索性质,用户反馈指标的权重和因子仍有待于相关实证研究确立,其实际价值有待于继续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在图书馆业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作用与地位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陈幼华.论阅读推广的研究范式[J].图书馆论坛,2018(3):81-89.
- [2] 中国出版网:全民阅读调查专题[EB/OL].[2018-02-16].<http://www.chuban.cc/zjj/yddc/>.
- [3]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8-02-16].<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1/P020180131509544165973.pdf>.
- [4] 陈若韵.图书馆博客的实践效用及其隐忧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157-160.
- [5] 谢蓉,张丽.阅读2.0:一代的图书馆阅读推广[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6):16-20.
- [6] 白才进.新阅读时代图书馆服务对策研究[J].晋图学刊,2011(2):1-3.
- [7] 马智娟,陈永刚.图书馆2.0发展趋势研究[J].情报探索,2016(9):63-66.
- [8] 谢蓉.数字时代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2(3):23-27.
- [9] 张丹.我国高校图书馆APP阅读推广服务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9):175-176.
- [10] 陈鹏.图书馆移动阅读APP建设探讨:以掌阅iReader为研究分析对象[J].新世纪图书馆,2015(7):55-58.
- [11] 李雁行,王志国.社会化阅读环境下移动阅读APP对移动图书馆APP建设的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14(20):54-57.
- [12] MBA智库百科:宜家效应[EB/OL].[2018-02-18].<http://wiki.mbalib.com/wiki/%E5%AE%9C%E5%AE%B6%E6%95%88%E5%BA%94>.
- [13] Michael Casey Library Crunch[EB/OL].[2018-02-18].http://www.librarycrunch.com/2005/09/librarians_without_borders.html.
- [14] 尼尔·艾欧.钩瘾效应——创造习惯新商机[M].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5.
- [15] 张忠凤.基于内容营销的图书馆深度数字阅读推广研究:兼以高校电子期刊深度数字阅读推广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17(9):60-63.
- [16] 王宁,邓朝全,杨新涯.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探索与构建——第一届全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研讨会综述[J].图书馆论坛,2017(6):91-101.
- [17]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EB/OL].[2018-02-18].<http://www.gzlib.gov.cn/policiesRegulations/78168.jhtml>.
- [18] 叶鹰.书理学论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8(1):22-26.
- [19] 曹旻.试论“互联网+”下的智能阅读推广[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8):94-96.

作者简介: 蔡豪源(1987—),男,广州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智慧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18-05-08

读图时代的光影立体阅读：“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实践

刘紫丹

(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浙江温州 325000)

摘要：文章以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雨少年电影学院”为例，阐述该品牌构建策略，包括组建导师团队、确定活动对象、确立选片标准、科学设置模式、完善项目体系，为图书馆创立创新品牌、引导儿童阅读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图书馆；少儿影视品读；品牌构建；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光影立体阅读

中图分类号：G258.7 文献标识码：A

Light and Shadow Stereo Reading in the Era of Reading Pictures: the Practice of "Xinyu Juvenile Film Academ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Wenzhou children's library "Xinyu Juvenile Film Academy"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its brand building strategy, including assembling mentor teams, deciding activity objects and standard for film choosing, setting modes scientifically and optimizing program system. This library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for building innovative brand for libraries and leading children into reading.

Key words library; children's film reading; brand building; Xinyu Juvenile Film Academy; 3D light-shadow reading

1 引言

人类电影发展进程中积淀了诸多经典之作，同时，电影也是当下最年轻、发展最快、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潜藏了丰富的活动素材。自2013年起，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开展了“新雨少年电影学院”，旨在依托优秀的儿童影视作品，通过导师引领解读、启发互动，开创一种观影品鉴、书影共读的新型阅读活动。影视品读将引领少儿学会“品”“评”电影：品出文外之意、画外之音（情节寓意、角色情感、隐喻、哲理等），让孩子在表述、判别、评说、论证的交互活动中与影视艺术进行精神对话。它是对光影声色多元信息的立体、深度阅读，是阅读推广中对文本阅读的延伸与补充，是新阅读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多维情境阅读方式。

2 “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品牌构建策略

2.1 组建导师团队，保障活动品质

我馆通过招募、遴选，组建“新雨少年电影导师团”，为导师开展研究与实践提供平台支持、策划运作与后勤保障。导师团定期召开会议，共享影视资源，并探讨影视品读的活动模式、流程与策略。另聘请本土、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开展定期培训，逐步打造具有凝聚力与研发力的导师团队。

2.2 根据对象年龄，注重因材施教

我们将影视品读活动对象设定在9~12岁读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①少儿心智特点。影视品读活动由“观影”与“品鉴”两部分组成，需要孩子具备较强持续关注力。9岁之后，儿童由形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感受力、理解力、表达力增强，想象能力由模仿性、再现性向创造性想象过渡，道德感、正义感、自我意识、评价能力都进入萌发阶段，是进行影视品读的黄金时期。②读者到馆率。调查显示，少儿读者到馆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2~7岁读者活跃度最高，小学中、高段其次，中学生到馆率最低。少年阶段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影视品读能够吸引他们走进并爱

上图书馆。③项目研究实情。相比纸质文本阅读,影视品读可参考经验较少,为在一定时间内使研究更深入透彻,暂锁定9~12岁读者,抓住这段“领悟感受力增强,学业之余尚有空闲”的阅读黄金期。

2.3 确立选片标准,定制儿童片单

我国目前尚无电影分级制度,家长为孩子择片具有被动、单一、狭窄的特点。导师团根据儿童年龄认知及成长需求建立审片标准,搜集整理片源。基本标准如下:①具有较高思想性、人文性,能引发儿童对人生、社会、教育进行反思,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与价值观;②内容情节、叙事风格充分符合儿童年龄层次与认知水准;③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价值,能让儿童进行艺术体验,提升品鉴能力;④具有丰富想象,能拓展儿童视野,激发思考力、创造力;⑤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优秀影片的电影(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或奥斯卡获奖影片)^[1]。

基于以上标准,再进一步归类,如根据年龄段(3~6岁幼儿,小学低段1~2年级、中段3~4年级、高段4~7年级,初中段等)、影片类型(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动画片)、情感元素(友情、亲情、师生情、勇气、梦想)、节庆主题(父亲节、母亲节、传统节日、地球日、读书节)等,使片单逐步丰富、完善。2016年上半年为3~4年级少儿预设的“友谊”主题片单及相应书单,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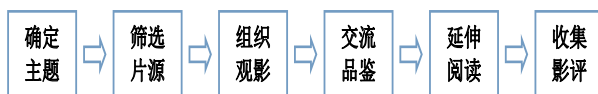
表1 3~4年级少儿“友谊”主题片单及相应书单

年龄	主题	品鉴重点	观影片单	补充书单
3~4 年级	动物朋友	感受动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受人与动物的真挚情感。初步了解电影叙事的策略、结构及其象征意义。	《忠犬八公》《奇幻森林》《天空之城》《龙猫》《灵犬莱西》《导盲犬小Q》《风之谷》《战马》《驯龙高手》《怪物史瑞克》《一条狗的使命》	《野性的呼唤》《战马》《丛林故事》《忠犬八公》《有只小狗叫小Q》《怪物史莱克》《DADA 全球艺术启蒙系列第2辑:宫崎骏》
	温暖友情	感受朋友真挚的友谊,树立正确的友情观。关注人物,体会敢于探险,追求自由的冒险精神。初步了解电影改编与文学原著的关系。	《夏洛的网》《绿野仙踪》《纳尼亚传奇》《仙境之桥》《小王子》《天堂的颜色》《极地特快》《泰山》《当幸福来敲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夏洛的网》《绿野仙踪》《纳尼亚传奇》《仙境之桥》《小王子》《极地特快》《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2.4 科学设置模式,确保专业引导

影视品读是关乎素养、审美的“慢”教育,对儿童没有具体的知识技能要求,但亦需有合理科学的引导

策略与模式。如故事片、动画片,重点关注作品的情节叙事美、台词文学美、人物情感美等;而记录片、科教片,则需注重启发儿童的观察思考、逻辑判断、辩证分析等能力。常见影视品读流程如图1所示。



注:影评不作硬性要求。

图1 影视品读流程

常见观影导读策略如下:

(1)观影前导引。背景介绍式:对导演、主演、原著、获奖情况等背景资料作简要介绍,丰富少儿对该片的了解和认知。情节概述式:对影片内容作梳理简介,激发观影兴趣。抛出问题式:根据主题进行设问,让孩子带着问题观影。

(2)观影中插入。选择式提问:在情节矛盾冲突处、剧情转折抉择处,引发思考,甚至引发正反方激辩。例如,若你是比尔博,是否愿意离开舒适的家去加入一场本与你无关的冒险?开放式提问:对即将发生的情节进行猜想,启发想象。但需注意的是,为保持观影连贯性,插入法使用一般不超过2次。旁白注解法:影片出现儿童较为陌生或较难理解的情节事物时,导师用简明精准语言进行即时讲解。如《孔子》观影活动中,导师对片中出现的春秋时代礼仪进行阐释,促进孩子对内容的理解。

(3)观影后交流。追忆情节:引导儿童回顾、概述情节,提取最关键、最受关注的情节进行解析、探讨(必要时进行片段回放或画面截屏)。走近角色:围绕人物进行交流,走入角色内心,使儿童学会观察、同理、剖析,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联系生活:由影片联系生活,以小见大,建立哲学理性的思考。如《风之谷》镜外音——环境保护问题及现状。感悟情感:抓住影视作品核心主题词,引导孩子品读影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触发审美:从影片画面、剪辑、色彩、音乐、语言等角度进行交流,感受、表达美,培养初步的审美情趣。捕捉兴趣:从儿童兴趣点出发展开交流,充分尊重观影活动中的独立思考与见解。

(4)延伸后续:少儿影评、导师手记、延伸荐书及荐影(同名作品或类似题材)。

2.5 完善项目体系,细化精化深化

在实践中，我们逐渐完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序列化进程，完善的体系包含以下几点。

(1) 活动序列化。从最初的散点化选片到系列化开发，已有影视德育、童年映像、影往情深、名著与名片、战争与和平、梦幻迪士尼、皮克斯经典、魔幻与现实、宫崎骏魔法世界等系列活动。并连续举办2次新雨少年电影节（温州地区首个电影节）。

(2) 形式多元化。从少儿影视读书会衍生发展出亲子读书会、家长影视文化沙龙等。除观影品读活动外，又衍生了将同名书籍与电影进行对比阅读的“书影共读”系列，将书、电影、儿童剧、音乐会串联的“立体阅读”系列，以及邀约温州大学教授为教师及家长开展的“教授约你看电影”系列活动。

(3) 导师梯队化。以资深导师为核心，以新锐团队为补充，另聘请相关专家为顾问，请鹿城区教育研究院把关导师培训，形成“专家领衔、资深导师主导、新锐团队补充、科研机构保障”的梯队，确保坚实的理论研究与扎实的活动实践。

(4) 合作跨界化。我馆相继与教育研究部门、影院、媒体达成合作，各机构围绕该项目形成一个多元互补的共同体，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品牌发展。

(5) 基地网络化。初步建立1馆+2校+4院的少儿公益影视活动服务网络。“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在温州市4家影院设有专属活动厅，在两所小学设有少图电影分馆与新雨分院。

3 品牌创建成效

(1) 为图书馆少儿服务提供了有趣、有益、有效

的新模式，影视作品本身的魅力结合专业品读引领，使其成为我馆乃至全市知名度、美誉度极高的公益品牌项目。(2) 助力儿童原创开发系列影视品读课程。科学系统的影视资源库、专业细致的导读指南、原创开发近200个影视品读案例，引发了教育系统对电影教育的关注。2016年温州市教育深化改革研讨会上，电影教育作为温州市中小学课程改革重点项目。(3) 为人才提供平台，发掘打造本土明星讲师。通过我馆、媒体的宣传报道，构架网络将活动送到学校、影院、县市区图书馆，“新雨电影文化墙”出现在温州4家影院、2个学校基地。多位导师受邀在上海、杭州、厦门、舟山等地开展影视品读讲座，由此成为本土乃至全国名师，导师团被评为温州市“爱阅读”十大社团。(4) 为家长提供了一种新的亲子陪伴方式。父母在亲子影视品读活动中初步学习了儿童电影择片、审美、互动交流技巧，感受阅读与观影结合带给孩子无与伦比的深刻趣味。导师对电影的剖析诠释，也同样让家长感叹“重读电影，受益匪浅”。(5) 促进了馆社合作，提升了图书馆品牌影响力与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通过“新雨少年电影学院”品牌的创建实践，图书馆+学校+影院+教科研机构+本土权威教育杂志及媒体，建立了多机构跨界融合模式，充分带动社会力量加入我馆服务。

在现代社会，儿童影视已成为最具影响力、感染力的儿童精神产品之一^[2]。“新雨少年电影学院”为儿童及家长提供了一种正向积极的多媒体阅读模式参考。作为文本阅读的补充与延伸，影视品读嵌入到儿童深阅读活动之中，与文学阅读并肩为儿童打开了一扇更为宽阔的心窗，使阅读更贴近童心。

参考文献：

- [1] 夏昆.教室里的电影院[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7.
[2] 郑欢欢.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1.

作者简介：刘紫丹（1980—），女，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少儿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2017-12-09

· 阅读文化 ·

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阅读行为比较与解读

——以浙江图书馆为例

宓永迪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要: 外来人员是杭州城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外来读者进行分析,有助于图书馆更好地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文章从年龄和性别、借阅时间、人均借阅量和到馆次数、阅读兴趣方面对浙江图书馆外来读者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分析,并与本地读者比较,根据相关特征尝试为外来读者建立初步的画像。

关键词: 外来读者; 阅读行为; 图书馆; 读者画像

中图分类号: G252.0 文献标识码: A

Comparis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xternal and Local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Taking Zhejiang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Migrants are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angzhou. The analysis on external readers can better serve them in librar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external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according to age, gender, borrowing time, borrowing amount per capita, library visiting frequency and reading preferences. It compares the three aspect to local readers' and tries to describe persona of external readers.

Key words external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library; reader's portrait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步增长至2.91亿,年均增长600万人左右^[1]。杭州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据杭州统计信息网统计,2015年杭州市常住人口为901.8万,其中户籍人口为723.55万,即5人中有1人为外来人员,而市区的比例则更大^[2]。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中,外来人员也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本文以浙江图书馆流通数据为依据,对外来读者的年龄、性别、阅读兴趣等进行统计分析,以为图书馆开展个性化服务提供第一手数据。

1 数据的定义和来源

外来人员的通用定义,一般是指在非户籍地生活的人员,由于图书馆缺乏读者的户籍资料,在本研究中外来人员包括所有身份证号码显示为非杭州市

的人员。数据来源于浙江图书馆的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为了更好地反映读者实际使用图书馆的情况,主要以最近一年内在图书馆有借阅记录的读者,特别是占读者大多数的21岁~39岁的年轻读者作为研究对象。

2 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阅读行为比较

2.1 年龄和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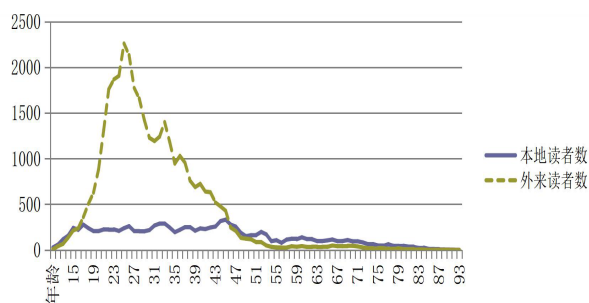


图1 读者年龄分布图

图1是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的年龄分布图。从图1

中可以发现,在浙江图书馆的读者中,外来读者占了大多数,大约达到75%,年龄分布与本地读者相比差别很大。从22岁开始明显增加,其最高峰出现在26岁,随后又迅速回落。因此,外来年轻读者是利用图书馆的主要人群。而本地读者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在年龄分布上更加平均,基本显示为一个平台形状,最高峰出现在46岁。从性别情况来看,外来读者和本地读者男女比例基本平衡,为49:51。

2.2 不同借阅时间的借阅量

2.2.1 按月份的借阅量分布

图2是外来读者和本地读者一年中各月份的借阅量统计,从中可以发现两者的借阅高峰都为7月,而低谷则不一样,外来读者在2月有明显的低谷,本地读者的借阅低谷出现在9月。外来读者的借阅情况随时间的变化比较显著,本地读者借阅情况随时间的变化要平缓得多,波动幅度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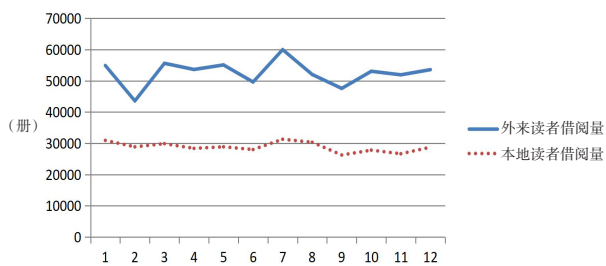


图2 读者按月份借阅量分布图

2.2.2 一周的借阅量分布

考虑到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闲暇时间差别较大,而外来读者中年轻人比例较本地读者高得多,为了防止由此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只取21岁~39岁相同年龄段的读者进行比较。从图3中可以发现,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在一周内借阅数量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即星期一由于图书馆大部分外借关闭,借阅数量最少,星期二出现反弹,随后略微下降并趋稳,到双休日则迅速增加,星期日达到最大值。外来读者在工作日的借阅比例稍低于本地读者,在双休日出现反超,两者最大差距出现在星期日,差值为其他日期的2倍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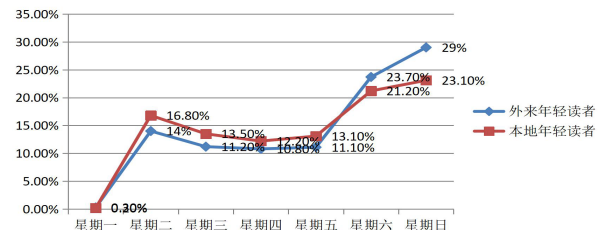


图3 读者一周借阅量分布比例图

2.2.3 一天的借阅量分布

同样考虑到不同年龄段读者的作息、闲暇时间差别较大,在考察一天的借阅时间分布时也只是对21岁~39岁相同年龄段的读者进行比较。图4表明,外来读者借阅时间相比本地读者明显偏迟,借阅高峰出现在16时,比本地读者推迟1小时,特别是晚上非工作时间(17时—20时)的借阅比例要高于本地读者,这一时间段的借阅比例占到全天的近20%,比本地读者高了几近1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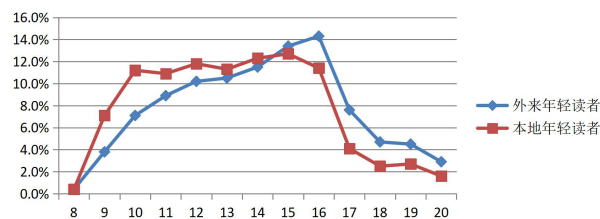


图4 读者一天的借阅量分布比例图

2.3 人均借阅量和到馆次数

外来读者一年借阅的书刊总数为63万多册,人均大约18册,本地读者一年借阅的书刊总数为34万多册,人均大约29册;到馆借阅次数外来读者人均均为4.3次,本地读者为6.3次;每次到馆借阅的书刊数量两者相差不大,外来读者为4.1册,本地读者为4.6册。由于外来读者到馆次数明显少于本地读者,导致其人均借阅数量比本地读者少了11册,差距不小。因为闲暇时间和年龄关系较大,为了排除外来读者与本地读者不同年龄段比例不同对于结果的影响,只选择21岁~39岁年龄段的读者进行统计,情况基本一致。其中外来年轻读者人均借阅量约为16册,本地年轻读者为20册;到馆借阅次数外来年轻读者人均均为4次,本地年轻读者为4.9次;每次到馆借阅的书刊数量两者差距缩小,外来年轻读者为3.9册,本地年轻读者为4.2册。可见最终排除年龄影响后,同一年龄段外来读者的人均借阅量和到馆次数仍然低于本地读者。

2.4 阅读兴趣

对外来读者和本地读者阅读兴趣的研究比较同样集中在21岁~39岁这一年龄段,分成外来年轻男性读者、本地年轻男性读者、外来年轻女性读者和本地年轻女性读者4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以尽量排除年龄的干扰,更好地比较相同年龄段读者由于地域而产生的阅读兴趣差异。

图5是年轻男性读者阅读爱好分布图。在外来年

轻男性读者中,借阅占前6位的分别是工业技术、文学、经济、历史地理、哲学和艺术;而本地年轻男性读者借阅量排前6位的是文学、工业技术、经济、历史地理、艺术和文化教育。其中,工业技术和文学的次序正好相反,而且文学类的借阅比例二者相差达到12%,是所有类别中差距最大的,特别是男性青年读者借阅文学类书刊的比例远小于其他文献统计的平均值^[3],也和浙江省全省的统计情况相差很大^[4]。另一差距较大的是工业技术类,达到7%,经济类则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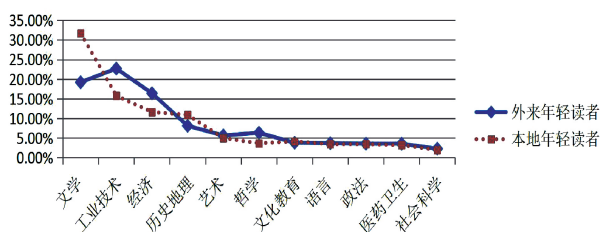


图5 年轻男性读者阅读爱好排列

图6是年轻女性读者阅读爱好分布图,其差别仍然存在。在外来年轻女性读者中,借阅量占据前6位的为文学、工业技术、经济、历史地理、艺术、哲学;本地年轻女性读者借阅量排前6位的为文学、历史地理、工业技术、经济、艺术和哲学。虽然总体上女性读者对于文学的兴趣大大高于男性,但是外来年轻女性读者与本地年轻女性读者在文学类的借阅比例相差也达到11%。从排名顺序上看,本地年轻男性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外来年轻女性读者的兴趣爱好相对一致,差距最大的是外来年轻男性读者和本地年轻女性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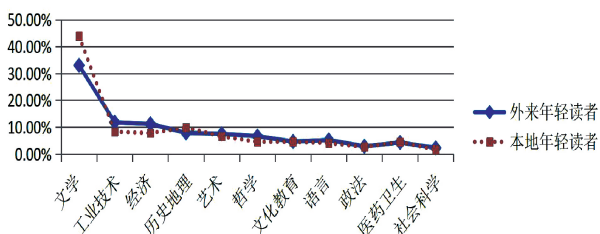


图6 年轻女性读者阅读爱好排列

进一步对借阅量占前6位的文学、工业技术、经济、历史地理、艺术和哲学类书刊分别进行细分。在文学类方面,上面4个群体的兴趣高度集中,最感兴趣的均是中国当代社会言情小说,随后是散文和杂文,以及日本和美洲文学作品。在工业技术类方面,本地年轻男性读者和外来年轻男性读者的兴趣都主要集中于软件编程、软件应用类,外来年轻女性读者借阅排在前几位同样是软件编程、软件应用类;本地

年轻女性读者的借阅排行除了软件应用类外,占据2到4位的均为菜谱、化妆,可见其兴趣与其他几类人群差别较大。经济方面,年轻读者的主要爱好基本一致,都包括电商、证券投资、企业经营。历史地理方面,最受本地年轻男女欢迎的都是日本旅游类视频资料。外来年轻男女的兴趣则集中于中外各类人物传记,占第1位的则是中国企业家传记。艺术方面,年轻读者的爱好集中于摄影、漫画和素描等。哲学方面,年轻读者的兴趣完全一致,最喜欢的是励志、人生哲学等主题的文​​献。

3 解读

3.1 年龄

从年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外来读者以年轻人为主,而且变化非常剧烈。从18岁时的外来读者数量刚刚超过本地读者,到26岁外来读者已经几乎是同龄本地读者的10倍,而47岁的外地读者绝对数量又开始少于本地读者。对于这个年龄结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外来读者的主力基本是高中、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学习工作的人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不断有许多外来读者流出杭州,导致其年龄分布出现“过山车”。

3.2 借阅时间

外来读者的借阅量随着月份呈现明显变化。2月由于春节大批外来人员返乡,借阅量为全年最低,而高峰出现在7月,这可能与暑假开始有关,8月的借阅量又迅速回落,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外地学生回家导致。本地读者的借阅情况基本上与月份无关,比较平稳,春节等假期对于借阅数量的影响不大,2月的借阅量排在全年的第6位。7月借阅数量最多,但是增加并不显著,8月也无剧烈下降。可见读者地域对于借阅的时间分布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外来年轻读者的借阅集中在双休日,特别是星期日,而本地年轻读者虽然也是双休日借阅量最多,但是变化相对不那么剧烈,两者差距在星期日达到最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在相同的年龄段,总体上外来读者的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比较少,两者在星期日借阅差距最大似乎进一步表明较多的外来读者并没有享受到双休日,或者需要更长时间的加班。一日内各时间段借阅量证明了这一问题,外来年轻读者晚上

的借阅量是本地年轻读者的几乎1倍,也反映出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员缺少白天的休闲时间,更需要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图书馆,所以图书馆延长开放时间对于这部分读者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外来读者和本地读者的借阅次数和人均借阅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本地读者的粘度更高,主要表现在人均借阅量和到馆次数都高于外来读者,而每次借阅的数量两者相差较小。导致外来人员人均借阅量少于本地读者的主要原因是到馆次数少,和每次借阅量关系不大,联系前面的分析,这应该同样归结于整体上外来读者休闲时间的缺乏,也可能是因为住地较远,交通不便。

3.3 阅读兴趣

文学类书刊、多媒体一直是公共图书馆读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其借阅量遥遥领先于其他门类,国内外都是如此^[5]。但是,在外来年轻男性读者中,文学类的借阅量只排在第2位,可见虽然总体上文学类仍然是借阅量最大的门类,在不同细分人群中却存在不小的差异。进一步细分文学类书刊,可见外来年轻男女读者和本地年轻男女读者的兴趣爱好十分接近,性别差异不明显。

此外,外来年轻读者相比本地同龄读者,在工业技术、经济、哲学方面的兴趣更大,对于历史地理方面的兴趣则较低。再考察他们对各门类的具体爱好,可以对其的大致情况有一个较准确的画像。如工业技术类,除本地女性外,主要的关注点都在编程和软件应用,说明IT行业是许多年轻读者的职业所在;和其他群体不同,本地女性排在2、3位的是菜谱、化妆,明

显体现对自身生活品质的注重,与职业关系较弱。经济方面,对于电商、证券投资、企业经营的偏好,表明外来年轻读者希望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愿望更加强烈。在历史地理方面,本地年轻读者最爱好的是日本旅游介绍,这符合国人旅游的热点,呈现强烈的休闲趋势;而外地年轻读者喜欢中国企业家传记,表达了对成功的渴望。外地年轻读者感兴趣的哲学书籍的主题主要是有关励志和人生哲理,反映其盼望融入社会、不断进取的心态。

4 结语

外来读者,特别是其中的年轻读者,是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读者群体。因此,公共图书馆需要针对这部分读者群体,了解他们在阅读需求等方面和其他读者群体存在的差别,并做好个性化服务。例如,在一些离传统市中心较远而外来人员较多的周边地区开设分馆,减少他们来回路上的奔波;位于外来读者聚集地的分馆,不妨在文献资源配置上,增加计算机、传记、经济等方面外来读者比较喜爱的书刊,适当减少休闲类文献,使得他们可以就近借到感兴趣的文献;还可以根据外来读者的作息时,调整分馆开放时间。另外,考虑到外来读者的空闲时间偏少,而年龄则较小,应该向他们重点介绍各类移动图书馆、“互联网+”服务,如通过支付宝、微信的图书馆平台开通借阅借还服务,即可享受网上选书、快递免费送书服务。总之,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对读者进行细分,实现精细化服务。

参考文献:

- [1] 国家卫计委: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或增至2.91亿[EB/OL].(2015-11-12)[2018-01-17].<http://news.163.com/15/1112/03/B86KE4EN00014Q4P.html>.
- [2] 杭州统计信息网[EB/OL].[2018-01-17].<http://www.hzstats.gov.cn/>.
- [3] 李海燕,宓永迪.公共图书馆流通数据挖掘与藏书结构调整[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2(1):55-57.
- [4] 朱晔琛,陆祝政,宓永迪.浙江省公共图书馆2015年度阅读报告[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4):85-92.
- [5] 宓永迪.大陆、台湾和美国阅读行为比较、解读与思考[J].图书馆,2014(6):81-84

作者简介: 宓永迪(1962—),男,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发表文章20多篇。

收稿日期: 2018-05-02

· 文献学研究 ·

贾谊《新书》结集及版本考述

陈功文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新书》是研究贾谊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来颇受学者的重视。但该书的最终编纂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新书》自宋以来,刻印不绝,出现了多种版本,其渊源关系亟需梳理。文章通过梳理后认为刘向父子是该书的最终编者,书名也是刘向父子命名的。宋元明清诸刻本中,影响较大的当属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后世版本多源于此。阎振益、钟夏的《新书校注》是目前研究贾谊及《新书》非常重要的版本。

关键词:《新书》; 结集; 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s and Versions of Jia Yi's *Xin Shu*

Abstract *Xin Shu* is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study on Jia Yi's life and thoughts, and has always been highly valued by schol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major dispute over its final compiler. Beside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many engraved versions of *Xin Shu*,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s and evolutions deserve our close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a careful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compiled it and gave it the title of *Xin Shu*. *Jia Yi Xin Shu*, which was revised by the Qing-dynasty scholar Lu Wen-chao, must be the most influential engraved version, while *Xin Shu Jiao Zhu*, which was revised and annotated by both Yan Zhen-yi and Zhong Xia, has become a most important version for today's scholars.

Key words *xin shu*; compilation; version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其在短暂的一生中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些文章就体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专题论文、辞赋、奏疏等,其中专题论文及奏疏结集成书,名曰《新书》。该书是研究贾谊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来颇受学者的重视。但该书的最终编纂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争议,其书版本渊源关系也亟需梳理,本文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补此方面研究之不足。

1 《新书》之整理者

贾谊《新书》,《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1]1726}。《汉书·贾谊传赞》也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者著于《传》。”^{[1]2265}其中因

《问孝》与《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故今传本惟五十六篇。关于《新书》的编纂成集者,学界基本认为最终将此书整理成集的不是贾谊,而是另有其人。如王洲明通过对历史的检讨,认为:“完全能证明,《新书》自问世以来,各代一直流传;完全能证明,今本《新书》的篇目次序和古本《新书》的篇目次序基本一致,它们同出一个系统;也完全能证明,今本《新书》基本保存了古本《新书》的内容。虽然宋代以后,有人对《新书》的真伪提出了疑义,但是,或者没提出确凿的证据,或者虽提出了证据,又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并且前人已辩驳得甚详甚确。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新书》系后人伪造,倒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它不是一部伪书。”^[2]他又说:“我初步认为,《新书》中的事势部分出自贾谊之手,其连语、杂事部分,除《先醒》、《劝学》篇外,也基本肯定

出自贾谊之手。《新书》不是一部伪书。决不是后人杂抄《汉书》而纂成，相反，倒是《汉书》选用了《新书》中的材料。但最后编定者不是贾谊自己，而编定者又离贾谊的时代不远。”^[2]王洲明先生所言是很有道理的。

1.1 关于《新书》整理者之梳理

目前，关于《新书》之整理者，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1) 观点之一，由贾谊之子整理成书。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吴松庚。他从称谓出发，认为《新书》称贾谊为“贾君”是一个特例。他通过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考辨，认为铭文中的“君”字，是子女对已逝父母的敬称。因马王堆三号墓下葬年代与《新书》产生的时代基本相同，所以，吴松庚认为《新书》中“贾君”之“君”亦可用相同的意义来解释。因此，《新书》称“贾君”也应该是贾谊子女在整理贾谊著作时对贾谊的敬称。《新书》中的《先醒》一篇为贾谊生前与梁怀王的对话，保留了贾谊的部分思想主张，其子女将其整理成一篇收录于贾谊文集中。为了避讳，整理者按当时惯例，使用了“君”的尊称，之所以在“君”前加上“贾”字，因为“君”还有“天子”之意，梁怀王系汉文帝爱子，恐后人理解为“怀王问于文帝曰”，故加上“贾”字以区分。就这样，吴松庚断定《新书》的实际整理者就只能是贾谊的独子贾璠无疑。此外，吴松庚还给出了几条理由：贾谊去世后，贾璠已具备整理《新书》的能力；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活中，整理父辈的著作已成习惯，汉代以孝为先，贾璠将其父的作品整理并使之传播，也是对父亲尽孝的一种表现；由于贾谊系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33岁，其父贾回很可能还在人世，贾回帮助其孙贾璠整理《贾谊新书》的可能性也同样存在^{[3]176-180}。

(2) 观点之二，由贾谊之孙或曾孙整理成书。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徐复观先生，其云：“《新书》的内容，虽全出于贾谊；但他三十三岁便死了，将其编成五十八篇，并冠以《新书》的书名，并非出自贾氏自己，可能是出自‘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的他的孙贾嘉或是出自他的曾孙贾捐之手。”^{[4]73}吴松庚认为，这种观点“应该是最接近于事实的分析了”。他还认为，徐氏的看法源于“贾嘉最好学，世其家”，贾捐之亦为元帝鸿儒，且为《汉书》所载贾谊直系后裔，故推测之^{[3]175-176}。当然，这种观点只是推测而已，目前还没有相关支撑材料予以证实。

(3) 观点之三，由刘向整理成书。《崇文总目》卷三记载：“《贾子》十九卷。原释。汉贾谊撰，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5]《崇文总目》的这段记载，徐复观早已指出其有不实之处，他说：“按《汉书》本传只言五十八篇，《汉·艺文志》亦只列‘贾谊五十八篇’；所谓‘本七十二篇’之说，毫无根据。而《隋唐志》皆作十卷，更无所谓‘皆九卷’之事。不知《崇文总目》何以讹误至此。”^{[4]70}但徐复观并未否定“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之说。目前，学界多认为《新书》为刘向整理而成。如汪耀明认为“‘新书’之称源于刘向，他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没有校定的称为‘故书’，已经校定的就称为‘新书’。自然，经过整理的贾谊散文就称为《贾谊新书》”^{[6]74}。杨鹤皋也认为：“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比较完整地搜集了贾谊的作品，加以整理编纂，校定为《贾谊新书》，亦称《贾子》。东汉时，班固撰写《汉书》他采用《新书》很多材料，……《汉书·艺文志》说有‘贾谊五十八篇’，大概就是刘向整理编纂的《贾谊新书》。”^[7]显然，汪耀明与杨鹤皋等人是继承了孙诒让的观点。可见，此说影响较广。

1.2 刘向父子为整理成书者

上述三种观点中，以刘向整理成书说影响较大。当然，《新书》由刘向整理成书之说也并非定论，也有学者持否定观点，如吴松庚认为：“关于刘向整理《新书》，亦难以说通。虽然刘向的主要贡献在于校讎，但其是否校订了《新书》却无明证。从贾谊去世到刘向校书，相距百余年，如果贾谊《新书》要到刘向时才校订成型，那就无法解释班固‘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一两汉独特现象。”^{[3]175}其实吴松庚的这一说法，仅是一家之言。他提出的“虽然刘向的主要贡献在于校讎，但其是否校订了《新书》却无明证”，是有道理的；而“如果贾谊《新书》要到刘向时才校订成型，那就无法解释班固‘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一两汉独特现象”这一说法，是有不周之处的。一方面，“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出自《后汉书·贾逵传》，而非班固所言。另一方面，历史上“郑贾”并称，主要是从儒学的角度而言的。“郑贾之学”主要是指郑氏、贾氏之儒学。郑氏，主要包括东汉的郑兴、郑众、郑玄等人。郑兴、郑众父子均通《春秋左传》学，且各著《周官解诂》。郑玄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大师，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经

文经学，遍注儒家经典，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贾氏，主要包括贾徽、贾逵父子等人。贾徽为贾谊八世孙，曾师从刘歆，受学《左氏春秋》，兼习《周官》《国语》；又师从涂恽习《古文尚书》，师从谢曼卿习《毛诗》，撰著《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徽之子贾逵悉传父业，兼通今古文经，时称“通儒”。贾逵深明《左传》，作《春秋左传解诂》五十一篇。后奉章帝诏，撰《春秋左氏长经》《周官解诂》《齐鲁韩毛四家诗异同》等。郑氏、贾氏之儒学在当时颇为闻名，故《后汉书》郑兴本传云：“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8]1223}《后汉书·贾逵传》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8]1241}郑、贾之学历经西汉末年至东汉，符合《后汉书》所说的“行乎数百年中”。而在两汉之际贾谊的后代中，真正能与“郑学”相提并论且称得上“贾学”“为诸儒宗”的人物，只能是贾徽、贾逵父子。尽管贾谊孙子贾恽、贾嘉同为武帝时期的太守，曾孙贾捐之曾任待诏金马门，但他们在学术上是不能与“郑学”相提并论的，是称不上“贾学”的。所以，吴松庚的这段话是不严谨的。

当然，尽管贾谊的儿子、孙子、重孙在学术方面赶不上他们的后人贾徽、贾逵，但他们还是有可能整理贾谊作品的。我们知道，贾谊十八岁时，“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这说明贾谊的家族应该具有家学渊源的。正如吴松庚所说的：贾谊生活的那段时间，“正是西汉立国之初，民力凋弊不堪，国家百废待兴，普通人家的子弟不要说通诸家之书，即使识几个字也为不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和优良的家学传统，一般人家根本无法做到”^{[3]179}。在优良的家学传统的影响下，贾谊后人确实是有能力整理贾谊遗作。所以，吴松庚及徐复观的说法都有可能为事实。

综合而言，本文认为刘向父子是《新书》的最终编成者。其一，刘向父子有亲手校理《新书》的机会。当年汉成帝即位后，即安排刘向以光禄大夫的身份整理皇家藏书，刘向便携幼子刘歆主持了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汉书》记载：“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1]1950}，“河平中，（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1]1967}刘向主持这项过程持续十八年，去世后，剩

余工作由其子刘歆奉帝命得以卒业。刘歆完成此项工程之后，“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1701}。后来，班固撰《汉书》，以刘歆《七略》为蓝本撰成《艺文志》，并于“儒家类”著录“《贾谊》五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作了增删、改移等工作之后而成的。那么，《贾谊》一书是刘向父子经过校理之后著录于《七略》中后被班固沿用的，还是班固经过增删、改移之后著录于《艺文志》的，答案应该是前者。班固不可能再去重复一遍刘向、刘歆父子的工作，他的增删、改移工作，主要是对《七略》原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所以，刘向父子对《贾谊》一书进行过整理，并著录于《七略》之中，后被班固《艺文志》继承。

其二，从《新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来看，该书应是刘向父子仓促整理结集而成。其实，《新书》今传本存在较多问题，如《问孝》与《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其余五十六篇文章，有的残缺失次，有的文字错讹较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脊乱条理。”^{[9]2338}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了当初整理《新书》的并非贾谊本人。造成《新书》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要么可能是当初的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没有对此书进行认真的校理；要么是经过整理后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问题而导致现在的面目。就《新书》而言，出现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如果是后者，较难解释此书在流传过程中一下子出现这么多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应该归结为整理者的问题，那就是整理者在整理时仓促成书，未及认真校理。从这一点来看，其整理者也应该是刘向父子。刘向父子奉旨整理皇家藏书，不仅要整理、分类经、传、诸子、诗赋等藏书，而且“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1701}。可见，刘向父子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对部分书简未及认真校理而仓促结集在所难免。《新书》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下结集而成的。而《新书》中出现问题较多的文章，多是贾谊的奏议。这些奏议，在贾谊死后应该成为皇家藏书的一部分。由于年代久远与脱简现象的存在，刘向父子在整理时未及

认真校理,故而出现了如今之面目。如果说《新书》是贾谊后代结集而成的,那么,他的受优良家学熏陶的后代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与相应的学术素养来进行此项工作的,不至于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新书》应该是由刘向父子整理结集而成的。

2 《新书》之命名

关于《新书》命名的由来,清末学者孙诒让曾认为:“《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可缮写者为新书。杨倞注《荀子》,未载旧本目录,刘向《序录》前题‘荀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殷敬顺《列子释文》亦载旧题云‘列子新书目录’。又引刘向上《管子》奏称‘管子新书目录’,足证诸子古本旧题大抵如是,若然,此书隋、唐本当题《贾子新书》。盖新书本非贾书之专名,宋、元以后,诸子旧题删易殆尽,惟贾子尚存此二字,读者不审,遂以新书专属之贾子,校槧者又去贾子而但称新书,辗转讹省,忘其本始,殆不可为典要。”^[10]孙氏之言是有道理的。刘向父子校理诸子之书后,常以“新书”称之,以区别于未校之故书。如此,则刘向父子在校理贾谊之书后,实亦应命名之曰《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东汉班固撰著《汉书》时,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艺文志》,著录图书596家,其中有贾谊《新书》,录之为“《贾谊》五十八篇”。可见,班固称名《贾谊》而略去“新书”。按说,班固与刘歆所处年代相距不远,且其《艺文志》又是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的,那么,刘向父子所命名的《贾谊新书》或《贾子新书》,班固应该遵循才是。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要么,刘向父子当初辑《新书》后即著录为“《贾谊》”。要么,班固《艺文志》对刘歆的《七略》进行了改编。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就《七略·诸子略》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刘歆撰《七略》,于书目后常列序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情况、作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及刘歆的评论等。而班固《艺文志》只著录书目篇名及篇数,略去其他。可见,《艺文志》是在继承《七略》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成的。此外,《艺文志》在书目名称方面也有改动之处。如《荀子》一书,《艺文志》著录为“《孙卿子》三十三篇”,清代学者

姚振宗所辑《诸子略佚文》著录为“《孙卿新书》十二卷三十二篇”^[11]^[4]。无独有偶,再如《楚》一书,《艺文志》著录“出《楚》一家,二十五篇”,《诸子略佚文》著录为“《楚新书》二十五篇”^[11]^[68]。照此分析,上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初刘歆撰《诸子略》著录贾谊之书实为《贾谊新书》。只是后来班固撰《艺文志》时对书名进行了改动,便有了《贾谊》之名。

当然,《新书》之命名也一直存在着变化,如:《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五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贾子》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贾谊新书》十卷”,《崇文总目》著录“《贾子》十九卷”……

综合上述观点及史志的记载,笔者认为:西汉刘向整理贾谊作品时,即命名为《贾谊新书》,后来班固简称为《贾谊》。隋唐时期,或称《贾子新书》,或称《贾谊新书》,或称《贾子》等;宋代始以《新书》为贾谊作品集之专名。后便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

3 《新书》之版本流传

《新书》自宋以来,刻印不绝,出现了多种版本。下面结合不同时期的版本状况,谈谈各自的渊源关系。

3.1 宋刻本

《新书》最早的刻本为宋刻本。学界认为宋刻本凡4种,分别为程漕使本、重雕程漕使本(简称潭本,也叫潭州本)、建宁本(简称建本)和陈振孙所见本。

宋刻本至清代时皆遗失,从传世的相关序跋之文中仅能略知一二。南宋淳熙八年辛丑(1181年),胡价刻《贾谊新书》,并撰《贾子跋》云:“提学漕使给事程公先生暂摄潭事,乃取棧中所藏谊《新书》十篇,俾刻之学宫。价既承命,窃考谊所著《过秦论》所陈《治安策》,虽繁简与是书不同,要皆椎轮子斯也。……顾遐方无他善本可参校,字多讹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门生从事郎充潭州州学教授南昌胡价谨题。”^[12]^[516-517]按理说,程漕使本即为程漕使藏本,胡价承命而刻于潭州之本,应称潭本,或为胡价刻本。李书玮曾根据胡价的跋文也曾这样认为:“据此可以推知,此程漕使本应该是漕使程公旧藏的一部抄本。由于原貌已不得见,此本是唐本抑或

宋本,难以知晓。我们姑且将其作为宋本系统中的祖本来对待。潭州本:即上面所提到的胡价的刻本。此本是所知宋刻本中时代较早的。”^[13]李梦阳当初提及的“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12]519},所指即为胡价刻书一事。但后来此书于南宋淳祐年间又曾重刻,李梦阳也曾指出:“此书宋淳熙间尝刻潭州,淳祐间又刊刻修焉。”^{[12]519}清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时曾依据谭本,并自注云:“宋淳祐八年长沙刻,即从淳熙八年程漕使本重雕者,题《贾子》。”^{[12]532}显然,卢文弨认为淳熙八年胡价所刻本为程漕使本,淳祐八年重雕本为谭本。如此一来,程漕使本与谭本都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淳祐八年刻于长沙的重雕本是以胡价刻本为底本,应该称之为长沙本才合适,而不应该称为谭本。可事实上是,长沙古亦称潭州。如此一来,则刻于潭州的《新书》就存在两种版本:其一为当初胡价刻于潭州的版本为潭州初刻本,亦即学界所说的程漕使本;其二为淳祐八年的重雕本即为潭州重雕本,亦即为前文所提及的谭本。照这一思路,则当初胡价所见程漕使所藏本很可能就不是刻本,而是抄本。程漕使本是依据程漕使所藏抄本为底本经胡价刻成的本子。胡价初刻时因“无他善本可参校,字多讹舛,姑存之”,因而该版本存在较多讹误。

建宁本是宋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刊本。清邵懿辰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谓:“宋建宁本,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曾见盛意园藏黑口本,八行十八字,字大而疏,疑元刊。”^{[14]379}

陈振孙所见本。据前引《直斋书录解題》记载:《新书》“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余皆录《汉书》语,且节略谊本传于第十一卷中。”可知,此版本已收录贾谊之赋。

对于上述南宋的几种刻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予以概括,他认为:“南宋时《新书》自有三本,一则合《过秦》中、下二篇为一,而以《汉书》本传为第五十八,王应麟所见及建本是也。一则《过秦》分上、中、下仍为五十八篇,虽附本传而不入篇数,谭本是也。一则首《过秦》,末《吊湘赋》,以本传为卷十一,陈振孙所见本是也。”^{[12]540}宋版4种目前均佚,清代卢文弨校本保留了谭本、建本的部分异文,对了解《新书》宋本概貌有一定的帮助。

3.2 明刻本

《新书》在明代出现了较多的刻本。北京大学中

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贾谊集整理小组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对北京、上海地区所存的《新书》版本进行过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共发现明刻本16种^①。此次调查,他们未见到比较著名的明刻乔缙本和陆良弼本。现按年代先后顺序,对几种比较重要的明刻本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乔缙本。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年)刻于长沙。该版本乃乔缙在公务之暇取《史记》《汉书》中所载贾谊之文,以及贾谊平时所为论、赋,略加隐括,结为一集,题《贾长沙集》,附乔缙成化癸卯七月朔旦所撰《贾生才子传序》。此版本为明代较早版本,弘治年间的都穆本及正德八年(1513年)的李梦阳本均以此本为底本而进行翻刻的。

沈颀本。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刻于吴郡,题《贾长沙集》。此版本经沈颀对照明“洛本(不详刊刻年月)与他本三复参校”而后刊刻的,书前附沈颀所撰《贾谊新书题志》。此本很受汲古阁主人毛扆的看重。

陆良弼本,也称陆相本。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刻于长沙,题《贾太傅新书》。时陆良弼守长沙,“检阅郡斋故牍中,得《(新书)》版刻数十片,计其脱落尚多”,便问询于家居长沙的黄宝,黄宝取于京国书肆中偶得之《贾太傅新书》抄本以补刻,遂成完书。陆心源《宋刊明补本〈贾子新书〉跋》指出:“《贾子新书》十卷,明正德九年长沙守陆宗相补刊本,每页十六行,行十一字,自序至跋凡二百七页,前有黄宝序,后有淳熙辛丑胡价跋”^[15]。清代邵懿辰所见莫邵亭所藏陆相本,与陆心源所述有别,其云:“见莫邵亭藏正德陆相本,十行十八字,字大行疏,颇有古拙之致,前有黄宝序。”^{[14]379}今查国家图书馆所藏贾谊《新书》明代诸刻本,未见有“行十一字”的本子,而多为“行十八字”。另外,正德十年刻于长沙的吉府本是据陆良弼本重刊的(详后),此版本就是半页八行,行十八字。邵懿辰说它“十行十八字,字大行疏”,如果是半页十行,就算不上“行疏”。如此,陆相本应该是八行十八字。

吉府本。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刻于长沙。此本实据陆良弼本重刊。时吉王朱见浚因“知其《新书》有益于天下国家,而虑其传布之未广”,故“命工重刻”^{[12]522},残缺部分以建本补入,“册首盖‘吉府图书’朱文方印”^{[12]499}。此本在明刻诸本中最为精善。民国十八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据此重印,世称《四部丛刊初编》本。

何孟春本。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年)刊于云南,故也称滇本,题《订注贾太傅新书》。是书十卷,前九卷为《新书》,第十卷收贾谊的赋五篇以及有关贾谊的人物传记。书前附张志淳《订注贾太傅新书序》、何孟春自序,后附周延用《刻贾太傅新书叙》。

除上述几种版本以外,明万历年间还出现了胡维新所刻《两京遗编》本、程荣本、何允中本以及《子汇》本等,对《新书》的流传与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3 清刻本

清代也出现了较多刻本,如《四库全书》本、《贾子次诂》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等,其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当属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此本刻于乾隆皇帝六巡江浙之岁,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卢氏校勘时,曾“据两宋本”即以宋建本、潭本为底本,又参以沈颀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程荣本、何允中本。此版本前附卢文弨《重刻贾谊新书序》、李梦阳《贾子序》、黄宝《新书序》、胡价的跋及录自慈溪黄震《日抄》的跋文、《新书》雠校所据旧本,书末附《贾谊传》,正文有注。此版本对后世影响较大,并多次重刻,如光绪元年(1875年)浙江书局所辑《二十二子》本;民国甲子年(1924年)隆文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四部备要》本等。另外,《四库全书》本版本价值也较高,学者李申曾拿其与《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版阎振益校本作过细致的比较,通过比较后认为:“库

本(《四库全书》本)是做了认真校勘的,不失为古代一个好版本,甚至是最好的版本。”^[16]

总之,《新书》版本众多,版本渊源错综复杂,而这正说明了后世学者颇为重视该书。因《新书》宋刻本已佚,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该书最早的版本为明刻本。由于清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是仿宋本刻的,我们也仅能了解宋本之大概。尽管由明至清出现了众多的刻本,书名也有变化,或称《贾太傅新书》,或称《贾子》《新书》《贾长沙集》等,但内容没有太大的出入,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存《新书》五十八篇,有三十二篇题下标有“事势”的字样,有十八篇题下标有“连语”的字样,有八篇题下标有“杂事”的字样。由此可知,其五十八篇文章可分为“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这在不同的版本中也基本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出现了多种校注、译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吴云、李春台的《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增订版),阎振益、钟夏的《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王洲明、徐超的《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夏汉宁的《贾谊文赋全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王智荣的《贾谊新书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其中阎振益、钟夏的《新书校注》是校注者花费五年之力,以吉府本为底本,参校流传的六类版本而成,书末附多种贾谊研究资料及各种序跋、集评等,学术价值极高,是目前研究贾谊及《新书》非常重要的版本。

注释:

- ① 见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贾谊集整理小组:《关于贾谊〈新书〉版本的初步调查》,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1年第3期,第20页。此文文末附录一表:《贾谊〈新书〉各种重要版本关系表(初稿)》。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J].文学遗产,1982(2):21-22.
 [3] 吴松庚.贾谊[M].长沙:岳麓书社,2008.
 [4]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28.
 [6] 汪耀明.贾谊和西汉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 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第三卷[M]//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618.
 [8] 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10] 孙诒让.札迻[M].雪克,陈野,点校.济南:齐鲁书社,1989:220-221.
- [11] 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M].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2]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3] 李书玮.贾谊《新书》版本流变述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2):90.
- [14] 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5]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0.
- [16] 李申.从贾谊《新书》看《四库全书》版本优劣——认识《四库全书》版本价值一例[C]//中国哲学史文献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441.

作者简介: 陈功文(1971—),男,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文学博士,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18-03-16

(上接第37页)

- [6] 张智雄,吴振新,刘建华,等.Digital Curation和Digital Preservation之概念辨析[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4(1):4-13.
- [7] LORD P,MACDONALD A,LYON L,et al.From Data Deluge to Data Curation[EB/OL].[2018-03-10].<http://www.vkoln.ac.uk/ukoln/staff/e.j.lyon/150.pdf>.
- [8] Digital Curation Centre.What is Digital Curation[EB/OL].[2018-03-10].<http://www.dcc.ac.uk/digital-curation/what-digital-curation>.
- [9] 秦健.e-Science图书馆服务前沿:学术图书馆的新创举[EB/OL].[2017-06-22].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3NTE4MTMy.html.
- [10] 时婉璐,任树怀.数据策管:图书馆服务的新创举[J].图书馆杂志,2012(10):24-27.
- [11] 杨鹤林.数据监护: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新探索[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1,29(2):18-21.
- [12] 谭榕,亓靖涛.新时代新角色:数字保存的监管[J].图书与情报,2011(3):45-48.
- [13] 丁培.数据策展与图书馆[J].图书馆学研究,2013(6):94-98.
- [14] 孟祥保,钱鹏.国外数据管理专业教育实践与研究现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6):63-74.
- [15] 唐义,肖希明.国外数字监控(Digital Curation)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以DigCCurr项目为例[J].图书与情报,2013(6):41-46.
- [16] Digital Curation Centre.DCC Curation Lifecycle[EB/OL].[2018-03-10].<http://www.dcc.ac.uk/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DCCLifecycle.pdf>.
- [17] 任树怀,时婉璐.论数据策管环境下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J].图书馆杂志,2014(9):48-53.
- [18] ICPSR.Guide to Social Science Data Preparation and Archiving[EB/OL].[2018-03-10].<http://www.icpsr.umich.edu/icpsrweb/content/deposit/guide/>.
- [19] JISC.Implementing a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EB/OL].[2018-03-10].<https://www.jisc.ac.uk/guides/implementing-a-virtual-research-environment-vre>.
- [20] JISC.How Jisc is Helping Researchers[EB/OL].[2018-03-10].<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40702225057/http://www.jisc.ac.uk/whatwedo/campaigns/res3/jisohelp.aspx>.

作者简介: 周满英(1982—),女,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讲师,研究方向为数据管理和用户教育;付禄(1988—),男,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采编和数据管理。

收稿日期: 2018-06-01

· 文献学研究 ·

刘承幹刻单疏本《春秋正义》所附《校勘记》得失考述

樊宁¹ 谷玲玲²

(1.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2.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单疏本《春秋正义》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勘价值,清末刘承幹嘉业堂曾据日本抄本刻十二卷,并附有《校勘记》上下卷。文章从创新、继承与不足三个方面的分析考述,认为刘氏校勘之得有六:首次以单疏本《春秋正义》校阮刻十行本;记录单疏本《春秋正义》另一传本异文;暗示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校所据八行本之关系;未全采阮校之考订结论;赞同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校文字相同者;即使二者不同,亦择善而从。其失亦有三:所参阮校本是后刊合刻本,而非初刻单行本;摘录阮本校记时多有错误;单疏本与阮本异文出校多有遗漏,尚不足体现单疏本蕴藏之价值。

关键词:刘承幹;《春秋正义》;《校勘记》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Review on the Gains and Loses of *Collating Notes* Attached to the Edition of the Single Copy of Annotation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Carved by Liu Chenggan

Abstract The edition of the single copy of annotation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is of great value. Liu Chenggan carved twelve volumes based on Japanese transcripts and wrote attached *Collating Note* I, II. The author now thinks there are 6 gains of *Collating Notes* after resear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innovation, inheritance and shortage: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10 volumes carved by Ruan Yuan to be proofread according to the edition of the single copy of annotation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the Attached Notes record part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writte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they sugg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ition and Ruan's 8 reference books, the notes do not blindly copy the conclusion made by Ruan Yuan, they affirm the same part in Ruan's version and the edition, when there is contradiction, Liu made his choice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book. There are also 3 loses of Liu's notes: Ruan's version, which Liu refers to, is a collected annotation published later, but not a separate edition originally carved by Ruan Yuan, there are mistakes when recording Ruan's version, many parts are missed in both Liu and Ruan's version, therefore the value of the edition of the single copy of annotation of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cannot be present clearly.

Key words Liu Chenggan; *Justice in Spring and Autumn*; *Collating Notes*

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经学文献是其知识载体和表现形式,而《十三经注疏》又是整个经学文献的核心。五代两宋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府、私家与坊间刊刻儒家经典进入繁盛时期,产生了经注、单疏、注疏合刻等多种形式的文本成果,后世递相传刻,影响深远。至清嘉庆年间,阮元组织学者

校刊《十三经注疏》,汇集众本,精审严校,堪称集大成之作,享誉学界两百余年,至今不衰。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阮刻本已经不能适应今日学术之需,必须重新整理,然此项工作十分艰难繁重。近年来,多种整理工作已陆续展开,如点校本《十三经注疏》《儒藏》《十三经注疏汇校》等。与此同时,全面总结检讨前

辈学者经书校勘之得失,亦当视为整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鉴于此,笔者近来清理关于《春秋左传注疏》前人校勘遗产,发现刘承幹嘉业堂刊单疏本《春秋正义》后附《校勘记》上下卷尤为重要,至今未见相关研究成果,故不揣樛昧,试对刘氏《校勘记》之得失进行讨论,以求正于方家。

单疏本《春秋正义》为孔颖达《五经正义》之一,该书国内亡佚已久,日本有一抄本传世,《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曰:“《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影旧抄本,求古楼藏。”^[1]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四部丛刊续编》据之影印。而国人最早得见此书,是清末刘承幹嘉业堂所刊《春秋正义》,书末有刘氏《跋》云:“唐孔颖达撰《正义》三十六卷,今存一之九,又三十四至三十六,共十二卷。……先得二册于日本,后罗叔言学部复得二册,一并刻之,以贻学者。”^[2]刘氏刊本仅十二卷,并非足本,且与日本抄本完全一致^[3],价值不如《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然刘氏于1919年所作的《校勘记》则有独特之处(附于此刻本后),刘氏《跋》云:“此本为阮文达公所未见,今以阮校本校异,作札记一卷。”^[4]单疏本早于合刻本,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宋版原貌,且更接近孔氏原文,其校勘价值已为学界所共识。而刘氏第一次以单疏本进行校勘,虽非通校,仍起到校正阮本讹误、提供古本信息的作用,有其一定的校勘学意义。

刘氏刻单疏本《春秋正义》附《校勘记》共974条,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

1 创新

此方面是指刘氏《校勘记》在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可分以下4种情况。

1.1 首次以单疏本校阮刻十行本

此又可分4种类型:

(1) 指出体式差异例。如:

上五经正义表 表文末标“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扬州都督上柱国赵国公等上”,此表阮本未载^[5]。

(2) 仅列异文例。如:

受命之法 阮本“法”作“王”^[6]。

(3) 列异文并有判定语例。如:

古者贱皆执笏 阮本“贱”上有“贵”字。按,“者”疑

“贵”误^[7]。

(4) 列异文并加以分析解释例。如:

传惠公名弗皇 谥法爱人好与曰惠 其子隐公让国之君之妃芳非反 传曰嘉耦曰妃 适本又作嫡 同丁历反 此四十二字以阮本校,系陆氏《释文》,查此本乃单疏,但载《正义》,无《释文》,此疑系误入者,存以俟考^[8]。

五索而易一紫 阮本“索”作“素”。按,古索、素通用^[9]。

按:此类校记共567条,已占刘氏《校勘记》总数的过半。刘氏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单疏本《春秋正义》校阮刻十行本,得出阮本遗漏异文数量如此之多,并有相应的分析与解释,可谓其最大贡献与价值。虽然刘校本多数只列异文,有分析者较少,又非通校,尚不足以体现出单疏本所蕴藏的校勘价值,然毕竟有其开创之功,亦可视为对阮本的补充,有一定的意义与影响,不失为一家之言。

1.2 记录单疏本另一传本异文

刘氏所据单疏本《春秋正义》卷四至卷六(隐六年至桓六年)有两个传本,刘氏云:“今于两本全同阮校本者不注,其或同或否者注之。”^[10]这部分异文非常重要,刘氏所刻单疏本《春秋正义》正文仅据一种抄本,《四部丛刊续编》所收《春秋正义》影印本与刘刊本同,张丽娟亦云:“唯此转抄本为《春秋正义》单疏仅存之本,弥足珍贵。”^[11]以上皆未提到单疏本《春秋正义》有两种,唯刘氏《校勘记》中记录单疏本《春秋正义》另一传本异文,可谓罕见。试举一例:

志不在于歃血也 阮本同,又一本“志”作“忘”^[12]。

此条校记阮本作:

志不在于歃血也 诸本“忘”作“志”,是也。纂图本、闽本、监本、毛本“血”下衍“也”字^[13]。

按:《春秋左传注疏》此年《经》云:“壬申,及郑伯盟,歃如忘。”杜《注》云:“忘不在于歃血。”《正义》云:“……故注云‘志不在于歃血也’。”^[14]《中华再造善本》中两种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①注文皆作“忘”,日藏金泽文库抄本、南宋兴国军学本^[7]注文皆作“志”,单疏本《春秋正义》则一本作“忘”、一本作“志”。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八行本^②、北京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行本^③、闽本、监本、毛本注文与疏文皆作“志”。而阮刻十行本注文作“忘”,疏文作“志”。

由上,宋刻经注本与单疏本已出现混乱,“忘”与“志”二字并存,而注疏八行合刻本则整齐划一,注

与疏文一致，皆作“志”，后世合刻本亦相同，唯阮刻十行本注文与疏文不一致。可见，合刻本注文与疏文来源可能并不一致，或据疏文改注文，或据注文改疏文。据此异文可分析经书注疏刊刻的版本系统与源流。此类异文共116条，其价值不可估量。

1.3 暗示单疏本与阮校所据八行本之关系

宋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阮元《校勘记》的重要参校本，然阮本所据八行本却有许多与今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文字不一致的情况。张元济^[3]^[4]^[13]与赵万里^[7]等前辈学者多认为阮元所见多为补版，故有不同也，将两者差异归因于不同印本与补版之不同。而近来张丽娟将阮校所据八行本、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过录段玉裁《春秋左传注疏》校本三者进行详细比勘，提出新观点，认为阮校所据八行本既非南宋庆元间原刻本，亦非据原刻本影抄本，而是一部类似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段玉裁过录的校本，此校本之底本为毛氏汲古阁本，无校字之处皆默认八行本同毛本，故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误校^[8]。此观点甚有见地，而刘氏《校勘记》就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本所据八行本之关系已有暗示。

如“夫子始然（隐元年）”条：

刘校本作：阮本“始然”作“始改”^[2]^[25]。

阮校本作：宋本、监本、毛本“然”作“改”^[5]^[47]。

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作“夫子始然”。

“杨雄《方言》（桓五年）”条：

刘校本作：“杨”字阮本同^[2]^[63]。

阮校本作：宋本、毛本“杨”作“扬”，非也^[5]^[115]。

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作“杨雄”。

“陆机《毛诗疏》（桓五年）”条：

刘校本作：阮本亦作“陆机”^[2]^[64]。

阮校本作：宋本“机”作“玑”，非^[5]^[115]。

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作“陆机”。

按：此例共11条。八行本疏文来源单疏本，理论上文字应一致。而通过此类校记可知，单疏本文字同国家图书馆藏八行本，却不同于阮校所据八行本（阮校称“宋本”）。而阮校所据八行本文字不同于单疏本与国家图书馆八行本者，却多与毛本同。故阮校所据八行本很可能并不是刻本，而是一部以毛本为底本的校本。可见，据此蛛丝马迹亦可追寻版本源流，探究版刻关系。

1.4 未全采阮校本考订结论

针对阮校本的考订按语，刘氏亦有不赞同者。如：

不须辟孟子也 阮本“孟子”作“仲子”^[2]^[32]。

此条校记阮本作：

不须辟孟子也 毛本“孟”作“仲”，不误^[5]^[64]。

再如，刘校本作：

同盟于虚柯 阮本“柯”作“打”，下同^[2]^[92]。

而阮本作：

虚柯 宋本、闽本、监本、毛本“柯”作“打”，是也^[5]^[167]。

按：以上两条校记，单疏本与阮校本判定语并不一致。刘氏既没有接受阮校本的判断，也没有吸收阮校本的信息，仅列异文，可见刘氏据单疏本《春秋正义》，出校谨慎，并不直接赞同阮校本之结论。此类校记共计39条。

2 继承

此方面是指刘氏《校勘记》参照单疏本《春秋正义》，对阮校本加以肯定与继承，主要有2种情况。

2.1 赞同单疏本与阮校本文字相同者

颍氏说以为鲁十二公 阮本“颍”作“颜”，云：“宋本‘颜’作‘颍’。按，颍容之颍，《后汉书》亦作颍，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同。不得因《广韵》颍水字下不言姓而疑之也。”^[2]^[23]

杨雄《方言》云“杨”字阮本同，云：“宋本、毛本‘杨’作‘扬’，非也。按，《广韵》‘扬’字下不言姓，‘杨’字注云‘姓出弘农、天水二望’。《汉书》本传云‘其先食采于杨，因氏焉’。”^[2]^[63]

按：此类共336条，阮元等人并未见过单疏本《春秋正义》，然校正之字与单疏本相同者如此之多，足见阮本校勘水准之高，更说明单疏本《春秋正义》校勘价值之大。刘校本既可证阮本之确论，又可补阮本之不足，其价值可见一斑，自不待言。

2.2 文字不同者，择善而从

下言凡例 阮本“下”作“不”，云：“毛本‘下’作‘不’字。按，作‘不’是也。言凡例、不言凡例，犹云合凡例、不合凡例。”^[2]^[42]

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 “旱”字阮本同，云：“诸本作‘五月’，惠栋校本作‘三月’。按，依《月令》注作‘三’是也，‘秋三月’三字连读谓夏正之五月、六月、七月。”^[2]^[67]

按：此类校记有16例。单疏本《春秋正义》价值

虽高,然亦不免有错讹之处,这就使得校勘者不仅要进行版本比勘,还要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异文,遇到难以决断的,还要参考大量前人著作观点,进行取舍。段玉裁曾感叹“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9]。阮校本不仅广集宋元以来各种版本进行对校,还大量增加了参考诸家的数量,如浦镗、臧琳、钱大昕、段玉裁、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孙志祖、梁履绳、彭元瑞等人,征引内容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深,包含许多有按语或结论的条目,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堪称上乘之作。刘氏亦服膺阮校之精深,虽多取单疏本,但又不囿于此,对阮本择善而从,亦是对其肯定与继承。

3 不足

3.1 所用阮校本是后刊合刻本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有两个版本:嘉庆十三年(1808年)文选楼初刻单行本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南昌府学后刊合刻本。相对而言,文选楼本是初刻,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貌,而南昌府学本是后刊,经过了卢宣旬等人的删改,两个版本存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文选楼初刻单行本明显优于后刊合刻本^[10]。诸多迹象表明,刘氏所参照的阮刻本是后刊合刻本。

3.1.1 所引校记与合刻本同,不同于初刻本

刘校本: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 阮校本“承”作“奉”,云:“闽本、监本、毛本同○补:十行本初刻‘承’,后改作‘奉’。”^{[2]20}

阮校初刻本: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 闽本、监本、毛本“承”作“奉”。^[11]

阮校合刻本:王者不奉天以制号令 闽本、监本、毛本同○补:十行本初刻“承”,后改作“奉”。^{[5]44}

按:阮校初刻本作“承”,而后刊合刻本作“奉”,刘氏却认为阮校本作“奉”。此类校记共6例。这里涉及到阮校初刻本与合刻本之底本异同,合刻本中经常提到“十行本初刻”与“后改”问题,到底是否存在两个十行本,学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据此,刘氏使用的是阮校合刻本,并未参照初刻本。

再如刘校本:霍伯旧季等卒 阮校本“旧”作“白”,云:“监本‘白’作‘白’。”^{[2]19}

阮校初刻本:霍伯旧季等卒 监本“白”误“白”^{[11]320}。

阮校合刻本:霍伯旧季等卒 监本“白”作“白”^{[5]44}。

按:阮校合刻本用“作”字,初刻本用“误”字,刘氏所引与合刻本同。

3.1.2 未参考合刻本删去的校记

刘校本:以历家一日分为九百四十分 “一日”,阮校本作“一度”。^{[2]29}

阮校初刻本:以历家一日分为九百四十分 宋本“日”作“度”,是也。^{[11]326}

按:合刻本据阮校初刻本的肯定意见直接迳改阮刻十行本正文,并删去校记。此类共16条,亦可证刘氏并未参考阮校初刻本。

3.1.3 直录合刻本后增的条目

友徙其民于虢郟 “友徙”,阮校本作“方迁”,云:“宋本、闽本、监本、毛本‘方’作‘友’,宋本‘迁’作‘徙’,《释例》同。○补:十行本初刻‘方’,后改作‘友’。”^{[2]21}

按:此条校记○后语为后刊合刻本之补增,初刻单行本无。

则邓析不为私作刑书而杀 阮校本“为”作“当”,云:“补各本当作‘为’。”^{[2]110}

按:此条校记为阮校合刻本补增条目,初刻本无。此类校记共14条。

3.2 摘录阮本校记时多有错误

刘校本:其父娶之 阮本“娶”作“爱”,云:“宋本‘娶’作‘爱’,是也。”^{[2]19}

阮校本:其父娶之 宋本“爱”作“娶”,是也。^{[5]44}。

按:刘氏将“娶”与“爱”误倒。

刘校本:或用先人所为之谥因将为族 阮本作“或使即先人之谥称以为族”,云:“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便’,是也。”^{[2]45}

阮校本:或使即先人之谥称以为族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便”,是也。^{[5]85}。

按:阮本此句为注文出校,刘校本却误当作疏文出校,单疏本此句与阮本疏文一致,不需要出校。以上此类校记共42条。

3.3 未出校阮本遗漏的异文

刘校本:此下三日有会盟之事 阮本“三”作“二”,云:“《考文》云‘二作三’,与宋本合。”^{[2]19}

阮校本: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 《考文》云:“二作三”,与宋本合。^{[5]44}。

按:刘氏仅指出阮本已出校异文“三”与“二”,并没有出校“日”与“月”。此类校记共13条。

4 结语

综上,刘氏《校勘记》之得有六:首次以单疏本《春秋正义》校阮刻本,得颇多阮本遗漏异文;记录有单疏本《春秋正义》另一传本诸多有价值的异文,有助于分析经书版本系统与源流;暗示单疏本《春秋正义》与阮校所据八行本之关系;未全采阮校之考订结论;多赞同单疏本与阮校文字相同者;即使二者不同,亦服膺阮本校勘之精深,择善而从。而其失亦有三:所参照阮校本是摘录后刊合刻本,而非初刻单行

本;摘录阮本校记时有错误;单疏本与阮本之异文多有遗漏,并未出校,尚不足体现单疏本蕴藏之价值。总体而言,刘氏校勘得大于失,尤其是首次以单疏本《春秋正义》校阮刻十行本,开拓之功,不可泯灭。王锸谈到整理《十三经注疏》时亦提出:“阮刻本中所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吸收,阮刻本没有用到的版本我们可以补校,校勘的版本比他多,也能吸收嘉庆以后学者研究《十三经注疏》的成果。”^[12]总结前人校勘经书之得失对今日整理工作十分必要,有助于我们扬长避短,并在经学史、校勘学史、出版史等方面亦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 ①《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南宋光宗刻本和南宋孝宗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 ②《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庆元六年沈作宾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
- ③《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行本《春秋左传注疏》。

参考文献:

- [1] 涇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1.
- [2] 刘承幹.春秋正义校勘记[M]//嘉业堂丛书.刻本.吴兴:刘氏嘉业堂,1918.
- [3] 张人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4]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2-254.
- [5] 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M]//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
- [6] 阮元.春秋左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2009:3761.
- [7] 赵万里.中国版刻图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21.
- [8] 张丽娟.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与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C]//北京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心、东亚古典研究会.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春秋》学新视野与新方法论文集,2017:171-188.
- [9] 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2.
- [10] 樊宁.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版本考述[J].澳门文献信息学刊,2018(1):8-15.
- [11] 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2] 王锸.整理《十三经注疏》刍议[C]//漆永祥,王锸.斯文不坠在人间——李庆善教授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32.

作者简介: 樊宁(1992—),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经学史、版本校勘学;谷玲玲(1992—),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18-06-20

· 文献学研究 ·

舟山古籍现状调查及研究*

许魁义

(舟山市图书馆 浙江舟山 316021)

摘要: 古籍文献记载了地方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地方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由于历史原因,舟山公共藏书机构内收藏的古籍存量较少,更有相当数量的涉舟古籍散失海内外各地。文章阐述了舟山古籍文献的历史规模,通过实地走访舟山各家藏书单位、检索国内外数据库等手段对舟山古籍现状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并对舟山古籍散佚原因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舟山古籍数据库建设打下基础。

关键词: 舟山; 古籍文献; 调查; 散佚

中图分类号: G255.1 **文献标识码:** A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cient Books in Zhoushan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which records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piritual wealth.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stored in Zhoushan public library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about Zhoushan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scale of ancient books in Zhoushan,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Zhoushan by visiting the local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searching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databases in order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of ancient books of Zhoushan.

Key words Zhoushan; ancient books; investigation; scattered literature

近年来,古籍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舟山作为海洋文化名城,市内各级机构及藏书单位内收藏的古籍文献数量稀少,涉及舟山的古籍更是少之又少。舟山古籍历史情况不清、现存状况不明,已成为制约古籍保护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因素。2015年始,笔者通过走访舟山市内文化、教育、卫生、文保等各个藏书单位以及检索国内外图书馆、藏书楼、研究所古籍目录,对历史上舟山古籍的规模、现存数量及保存状况、海内外流播情况、散佚原因进行了初步调查与研究。本次古籍调查的对象包括:①传统古籍。1912年以前形成的具有传统装帧形式的汉文典籍。②民国古籍。1912—1949年形成的具

有传统装帧形式的汉文典籍。③形成于1949年以前的舟山家谱。对于涉及舟山的古籍文献,因其数量相对较少,我们采取了比较宽泛的标准,只要是形成于1949年之前的纸质舟山文献,我们都尽可能将其收入目录。

1 舟山古籍文献规模

舟山地处东海一隅,历来与中原文化交流不便,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翁山县,自此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历代舟山古籍主要有邑人著述、方志、普陀山志书经书三大类,期间虽经历两次海禁的文化

* 本文系舟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立项课题“舟山古籍文献普查报告”(课题编号:201416)的研究成果。

断层,但仍然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

1.1 邑人著述

宋代之前,历代方志仅记载了两位邑人著述。一位是东汉任奕的《任子》,原书十卷,今仅存380字,张寿镛所辑《四明丛书》将其收录为丛书第一篇。另一位是唐代徐浩。宝庆《昌国县志》记载,徐浩著有《广孝经》十卷、《书谱》《古迹记》各一卷,但仅载其题名,不知其详,其流传见世的著述尚有《论书》一卷等^{[1]588}。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为躲避金兵逃至昌国县。北宋政权南迁,裹挟着大批北方士人来到舟山避乱,同时也给舟山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参知政事余天锡创立舟山第一家书院——虹桥书院;嘉熙四年(1240年),参知政事应繇建翁洲书院;咸淳五年(1273年),士子魏渠建岱山书院,这就是南宋舟山三大书院。人文教育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舟山文化繁荣。宋朝一代,昌国共考取进士三十四名,其中三十三名在南宋时期。宋元明三代,舟山邑人著述浩繁,但大多数散佚,未能流传后世。书目存于光绪《定海厅志·艺文》的邑人著述仅有二十六种,一百数十卷^{[1]588-603}。

清至民国,得益于年代较近,邑人著述记载较为详细,其中尤以黄式三、黄以周父子著述最多。定海紫薇庄墩头黄氏家族历经数代经学传承,以儒为业,在定海开创出一个重要的浙东儒家学派——傲居学派,吸引内地士子纷纷求学海岛^[2]。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的黄氏父子刊印本和手稿尚有39种。除黄氏父子以外,著述存世的还有其族人黄以恭、黄以愚、黄家岱、黄家诚以及弟子胡夔等。民国年间,舟山作为濒海重镇,涌现了众多文学之士。例如,岱山诗人厉志著有《白华山人诗抄》、金石学家方若著有《校碑随笔》、国闻报主编胡以鲁著有《国语学草创》、士人王昌科著有《读史纪要》。民国《定海县志》记载的邑人著述有近一百三十种,八百多卷^[3]。

1.2 地方志

舟山方志始修于宋绍熙元年(1190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修志十四次,成志十次。由于战争及海禁等各种原因,大多散佚。目前仅存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明天启《舟山志》、清康熙《定海县志》、光绪《定海厅志》、民国《定海县志》五部。此外,昌国

县在宋时先后隶属于明州和庆远府,故而宋乾道《四明图经》、宋宝庆《四明志》中将昌国县志辟为其中一部分,各存一卷。还有一部分方志,因为各种原因或已散佚,或著而未刊。明正统《昌国县志》,书目为《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类》著录,作者不详,已佚。明正德《昌国县志》和隆庆《昌国县志》分别为邑人陶恭、陶积祖孙俩纂修,且为私人修志,但均已散佚。乾隆《定海续志》的书目见于光绪《定海厅志》,但未见传本。民国《定海厅志校补》《定海厅志续志》《定海县新志》受困于当时的条件,著而未刊。

1.3 普陀山山志等古籍

普陀山自唐咸通年间日本僧慧锷留下“不肯去观音”以来,佛教文化日渐繁荣,至今已逾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龟兹(今新疆)僧盛熙明编撰了普陀山第一部山志《补陀洛迦山志》始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王亨彦编撰《普陀洛迦新志》止,共有系统性山志八部。另外还有一部普陀山空法师编纂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普陀山小志》,共计九十五卷七篇。得益于普陀山重要的佛教地位和观音信仰,虽屡经劫难,但普陀山方志得以全部流传后世。

除山志外,普陀山历代高僧辈出,留下了众多佛教经典。真歇禅师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住持补陀山宝陀禅寺,著有《真歇清了禅师语录》二卷;大川普济禅师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住持宝陀寺,著有《大川普济禅师语录》一卷;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一山一宁开法于昌国祖印寺,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移住普陀山,著有《一山一宁国师语录》。宋代至清代,民国《普陀洛迦新志·艺文卷》记载的普陀山高僧著述共计二十七种。

此外,普陀山作为重要的佛教圣地,受历朝历代皇亲贵胄供奉。明万历年,明神宗五赐龙藏,其中前寺三次、后寺二次。清康熙年间,康熙三赐御书经书于普陀山寺庙。历代帝王及达官显贵的馈赠,使普陀山寺院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佛经古籍文献。至文革前,三大寺历代皇帝御赐龙藏及经典古籍大约有三万四千余卷。

2 舟山古籍文献保存情况

2.1 市内古籍

从2012年开始,我们走访了涉及古籍保管的多家单位,包括普陀山管委会、舟山市档案局、舟山市科

技局、舟山市教育局、舟山市民宗局、舟山市博物馆、舟山市文化馆以及舟山市各级图书馆。经实地走访,发现本市政府机构内所藏古籍数量相对较少,仅有舟山市图书馆、舟山市博物馆、舟山市档案局、舟山市文化馆以及普陀山佛教博物馆收藏有部分古籍,其中涉及舟山的古籍文献数量尤为稀少。五家藏书单位古籍总藏量约为327部,3 097册(见表1),其中仅普陀山佛教博物馆收藏的《佛说佛名经》一种为善本古籍,其余均为普通古籍。五家藏书单位中,舟山市文化馆是目前舟山市古籍藏量最多的单位,其收藏的一套民国版《四部备要》共计1 881册;普陀山佛教博物馆收藏的明永乐十五年《佛说佛名经》是舟山市内保存年代最为久远的古籍。

目前,上述五家古籍藏书单位,仅有博物馆配备有恒温恒湿库房,可供古籍长久存放,其余四家单位均没有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其中市文化馆本身并不具有藏书功能,没有较好的藏书空间,该馆古籍目前存放于文化馆杂物间内。调查发现,各单位古籍藏书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由于舟山市古籍存量较少,各单位都缺少专业的古籍保护人员,没有能力对古籍进行修复。

2.2 国内分布情况及海外流播情况

囿于人力、财力的限制,我们未能到国内外各个

收藏有舟山古籍文献的藏书单位实地查看,仅通过互联网对这些藏书机构(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古籍藏量比较大的藏书单位)进行目录检索。海外舟山古籍信息则是通过检索“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信息网”和“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获得。前者收录了海内外四十二家图书馆的古籍信息,后者为日本国内汉文古籍联合目录,参与单位几乎囊括了日本国内所有收藏有汉文古籍的藏书机构。此外我们还通过浙江省古籍普查平台,对参与浙江省古籍普查工作的各个地市藏书单位进行了检索,形成了“舟山古籍文献国内分布目录”和“舟山古籍文献海外分布目录”。由于各地古籍目录著录方式不统一,部分信息有所缺失,且各馆古籍工作人员录入信息时难免出现偏差。

3 舟山古籍文献散佚原因分析

古籍作为纸质文献,其保存时间的长久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水火之灾、虫蛀鼠咬、风蚀霉烂等都极易使古籍消亡。目前舟山市内古籍存量极少,并且在历史上散佚颇多,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3.1 海禁迁民

表1 五家藏书单位藏书数量及其主要收藏情况表

藏书单位	古籍数量	涉舟古籍数量	主要古籍收藏情况
舟山市图书馆	44部 367册		志书:光绪《定海厅志》三十卷两套,共计19册,其中一套缺册首;民国张氏约园版《昌国典咏》十卷,共7册;民国《普陀洛迦山志》十二卷,共4册;《岱山镇志》二十卷仅存卷三,1册;民国《普陀山小志》不分卷,1册。 邑人著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印本《论语后案》二十卷,共10册;黄氏家刻本《尚书启蒙》五卷4册;民国十一年珂罗版《白华山人书画集》不分卷,1册;民国《校碑随笔》两种,10册;黄以周著述两种(其注释的《扬子法言》1册、校对的《黄帝内经灵枢》三种,5册)。
舟山市档案馆	75部约160册	8部约29册	方志:光绪《定海厅志》三十卷首一卷一套;民国《定海县志》十六卷首一卷若干套;《岱山镇志》二十卷(存3册,缺卷67);《普陀洛迦山志》十二卷和《普陀洛迦新志》十二卷各一套。 邑人著述:《蓬山两寓贤诗钞》不分卷1册;《定海乡土教科书不分卷》2册;《三寿合编》不分卷一套3册(收录了当时舟山众多本地寓贤的自述文章,对研究本地文化有较高价值。)医书古籍:光绪《御纂医宗金鉴内科》七十四卷卷首一卷、民国《临证指南医案》口口卷、光绪《注图喉科指掌》四卷等。
舟山市博物馆	156部 498册	7部 53册	方志:光绪《定海厅志》三十卷首一卷一套10册;《普陀洛迦山志》十二卷一套4册。 邑人著述:《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两套(一为清版,13册;另一为民国版,20册);《白华山人诗集》4册;民国《白华山人诗画真迹》1册;清《蓬山两寓贤诗钞》1册。 佛经:经书《观无量寿佛经·圆颂》《楞严经》《水陆仪轨志》《大方广佛华严经》等。
普陀山佛教博物馆	12部		收藏包括圣旨、书画、题字等纸质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明永乐十五年《佛说佛名经》和钦赐《大藏经》。《佛说佛名经》原缺书画,1979年请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校订修补完善。《大藏经》绝大多数毁于文革十年,目前仅存残书30多函,存于普济寺藏经阁中 ^[4] 。
舟山市文化馆	1部 1 881册		《四部备要》一部,共计1 881册,现存249种,书籍品相较为完好,且仍旧保存在原装书柜中。

明清两季,舟山两次废县徙民,造成直接的文化断层。第一次海禁为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命征南将军汤和经略海上,遣46岛居民3万余人入内地;第二次海禁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宁海大将军伊尔库德攻占舟山。次年,以舟山不可守,实行海禁,将居民尽迁内地。清光绪《定海厅志》载:“舟山城垣尽毁,废于一旦。”^[1]⁷⁷⁰⁻⁷⁷¹废县徙民后,舟山坚壁清野、文教中断,造成了长达数百年时间的文化断层,可以想见,大量的本地古籍文献都在废县徙民的过程中遭到损毁。普陀山在明清两季历经三次衰败,均与海禁直接相关,期间废县迁僧,寺庙遭火,自唐朝以来积累于普陀山的佛教典籍亦尽数散失。

3.2 战争及灾害

舟山地处东海要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发。自唐宝应元年(762年)袁晁占翁山起义,历代均有战事发生,其中尤以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兵攻占舟山最为惨烈,明将士臣民殉难者万余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定海作为抗击英军入侵的军事重镇,两次沦陷。战乱造成了大量舟山本地古籍文献的破坏和毁灭。

此外,舟山地处东海之滨,亦是灾害多发之地,每年夏季都有台风、大潮、水涝,并伴有饥荒、瘟疫。舟山市志记载,宋淳熙四年(1177年)狂风大潮淹没民居^[5]⁶;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二十日,飓风大潮,禾黍一空,翌年大饥,瘟疫,死者甚众^[5]⁹。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日,暴风疾雨,坏各埠舟,溺死兵民无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初二,定海城大火,毁店铺、民宅3 000栋,万余人流离失所^[5]¹³。自然灾害频发是舟山历史上古籍文献难以保存的一个

重要原因。

3.3 文革

文革毁书是造成舟山目前市内古籍存量极少的直接原因。“破四旧”运动期间,不仅收藏于舟山各个机构内的古籍文献遭到销毁,舟山民间藏书也遭到极大破坏,许多珍贵古籍或被焚毁,或者化为纸浆。期间,普陀山佛事停止,寺院荒废,三大寺历代帝王御赐龙藏及经典古籍三万四千余卷数次遭到焚毁,仅存少许残函现收藏于普济寺藏书楼。2000年后,普陀山管委会重新印制历代普陀山志,古籍底稿尽数影印自国内各地图书馆。文革毁书直接造成普陀山大量珍贵古籍文献被毁,现在有关普陀山的古籍文献全部需要到国内外各地寻访。

4 结语

通过此次古籍现状调查,我们基本摸清了舟山市内馆藏古籍的数量与种类,并通过互联网检索,对舟山古籍在外地的分布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古籍文献是记录一个地方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舟山历经两次海禁、多次战争以及文革毁书,市内古籍藏量已经很少,相当一部分舟山方志古籍、普陀山古籍、邑人著述古籍在本市藏书机构内已经找不到存本。鉴于这一现状,保护好舟山市现存的古籍,并积极开展舟山古籍文献的寻访、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此次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查访舟山古籍文献,做好文本整理工作,为今后舟山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史致训,黄以周,等.定海厅志[M].柳和勇,詹亚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 程继红.近代黄式三黄以周家族与浙东海岛儒学之崛起[J].浙江海洋大学(人文科学版),2014(31):57.
- [3] 陈训正,马涯民.民国定海县志[M].影印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24.
- [4] 王连胜.普陀洛迦山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40.
- [5] 舟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舟山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许魁义(1971—),男,舟山市图书馆副馆长,馆员,研究方向为舟山地方文献。

收稿日期: 2018-01-14